

欢迎订阅

《黄埔》杂志增刊

百年黄埔

——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

1924年6月16日，在广州黄埔的长洲岛上，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从此，中国第一所新型军事政治学校诞生，中华大地上不但有了革命党的奋斗，更有了革命军的奋斗。

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致力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为国家建设、促进祖国统一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黄埔》杂志出版增刊以示纪念。增刊再现黄埔军校创建背景和过程，彰显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功绩，重温黄埔师生为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而团结一致浴血抗战的烽火岁月，展现百岁黄埔老人老骥伏枥、心系国家统一事业的爱国精神，以激励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后代亲属秉承黄埔建校初衷，践行“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精装彩印，定价 385 元，2024 年 10 月出版。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汇款方式】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政编码：100075

收款人：《黄埔》杂志社

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铁匠营支行

开户户名：《黄埔》杂志社

账号：0200000409200014061

【注意事项】

为避免差错，望订户在汇款时注意：

一、订户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必须详细，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二、在汇款单上须注明所订增刊书名、数量。

三、由经办人（汇款人）代多人征订并需要本社直接寄给订户时，请在汇款时另函告

订户姓名、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四、个人订户最好邮局汇款，并写清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邮编。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电话：010-58336326 010-58336357

传真：010-58336326

联系人：常红 闫子玉

ISSN 1002-7289



9 771002 728254

03>

HUANGPU

黄埔

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

|为黄埔同学立言 为祖国统一尽力|

双月刊 总第221期

20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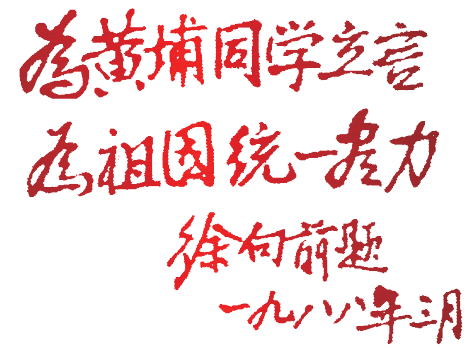
黄埔一期生赵子俊人生标签的五个“第一”

关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片段回忆

黄埔军校史发微

誓扫倭奴不顾身 异域扬威黄埔人





名誉顾问
林上元
郑建邦 徐小岩 陈知庶
刘 凡 汪纪戎(女) 黄志贤
解思忠 胡葆琳(女)

编委会主任委员
许友滋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许友滋 孙明霞 刘舒凌
陈 宇 李瑞虹 欧阳旦霓
欧阳维 庞明慧 郑 剑

主办单位
编辑出版
总编辑、副社长
编辑部主任
编辑部副主任
美术编辑
发行部主任
发行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 传真

电子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海外发行代号
国内发行
国外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
印刷

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杂志社
李瑞虹
陆东红
曹燕
刘燕
常红
闫子玉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
赵公口 20 号
100075
010-58336325 (编辑部)
010-58336326 (发行部)
hpzzs88@sina.com
ISSN 1002-7289
CN 11-1727 / D
BMI077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京丰工商广字第 0070 号
中印翰墨轩(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 投稿邮箱:hpzzs88@sina.com

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超星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未经授权,不得擅自转载本刊文章。

建议作者投稿使用电子版文件。如无特殊说明,纸质投稿及照片,本刊不负责寄回。如有疑问请与本刊联系。

黄埔军校同学会 网址、公众号
http://www.huangpu.org.cn/

定价: RMB25.00元
订购电话: 010-58336357

电子杂志: 中国知网 超星期刊

特别策划

誓扫倭奴不顾身 异域扬威黄埔人

- 4 中国远征军概述 / 贾伟龙
- 11 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师生 / 林云伟
- 19 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人和事 / 姚新婧
- 24 中国远征军里的黄埔华侨生 / 王加册
- 29 学伟大安澜精神 做爱国担当新人 / 李子珩 段思宇

时政

黄埔之声

- 31 弘扬黄埔精神 推进祖国统一
-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
- 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贺信精神 / 覃珊 鲁延鸣 李立

两岸纵横

- 37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 月 / 吴亚明

军事天地

- 41 战斗机经典战例评析 / 石稼

人物

人物春秋

- 47 黄埔一期生赵子俊人生标签的五个“第一”(下) / 陈宇
- 52 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选》的黄埔同学高放 / 蒲元 耿小乔

我的黄埔前辈

- 59 峥嵘岁月里的本色人生
- 纪念我的父亲李济 / 李瑞湘

海内外公开发行 综合性双月刊

2025 年《黄埔》杂志征订启事

《黄埔》杂志自 1988 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办刊宗旨,把为海内外黄埔同学提供一份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作为办刊人不懈的追求。2025 年,《黄埔》杂志将在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创新,以更鲜明的主题和丰富的内容满足读者需求。

《黄埔》杂志 2025 年征订工作继续进行。

全年 6 册,定价(人民币):中国大陆 /150 元(单册 25 元);台湾、香港、澳门 /300 元(含邮资);国外 500 元(航空)。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75

收 款 人:《黄埔》杂志社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铁匠营支行

开户户名:《黄埔》杂志社

账 号: 0200000409200014061

为避免差错,望订户在汇款时注意:

- 一、订户姓名、联系电话、详细地址、邮编,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 二、在汇款单上必须注上“订 2025 年杂志”字样。
- 三、由经办人(汇款人)代多人征订并需要本社直接寄给订户时,请在汇款时另函告订户姓名、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 四、个人订户最好邮局汇款,并写清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邮编。
-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电话:010-58336326 010-58336357 联系人:常红 闫子玉

订户报销凭证

收 款 单 位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 编	100075
订户单位或姓名	收款单位盖章 《黄埔》杂志 财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订 数					
金 额					
汇 款 方 式	银 行		邮 局		

说明:此凭证必须与汇款凭证合并,金额相符方能作为报销凭证,否则无效。

历史

口述历史

61 关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片段回忆 / 金声

黄埔研究

66 黄埔军校史发微 / 曾庆榴

黄埔收藏

74 我珍藏的黄埔军校《野外实施参考》 / 单补生

文化

文化黄埔

82 “换上了戎装”

——黄埔诗人臧克家的抗战诗 / 方西峰

锦绣中华

85 若问古今兴废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办学地洛阳 / 刘伯欣 刘增强

黄埔连载

92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十三） / 熊子杰



双月刊单月1日出版
2025年第2期总第221期



2 誓扫倭奴不顾身 异域扬威黄埔人



47 黄埔一期生赵子俊人生标签的五个“第一”



61 关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片段回忆



66 黄埔军校史发微

誓扫倭奴不顾身 异域扬威黄埔人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忍情斩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气吹太白入昴月，力挽长矢射天狼。”这是战歌，也是誓言，更是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爱国主义与抗敌意志的生动诠释。

1942年2月16日，应英方请求，中国远征军10个师10万余人入缅援英作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仅确保了滇缅国际公路畅通，而且增强了中缅印战区盟军力量，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借道印度、会师中东的企图，策应了盟军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行动。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全部打通，标志着中国入缅作战取得胜利。入缅作战的胜利，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必胜的信心，更促进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合作精神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年多时间里，几十万中国远征军两次出兵缅甸，东吁（同古）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密支那攻克战……从最高指挥官到中下级军官，甚至从事通讯、侦察和服务的士兵，处处都有黄埔师生的身影，他们成为中国远征军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热血洒在了印缅战场，将忠骨留在了异国他乡。如今，硝烟已散，英雄远去，但他们的精神不朽。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度回顾历史，祭奠和缅怀那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远征悲歌的将士，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将士，以此激励后人奋勇向前，赓续黄埔精神，续写黄埔荣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贾伟龙

中国远征军概述

□ 贾伟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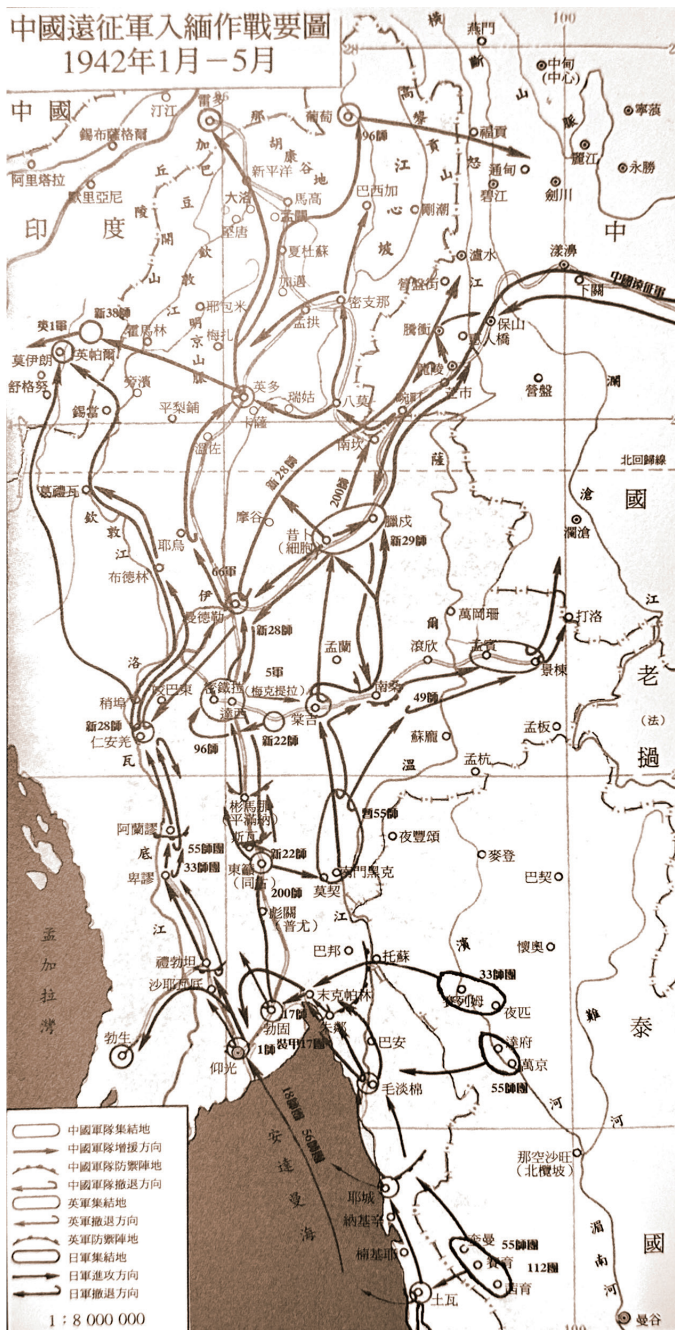
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需要，中国在1941年与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组建中国远征军支援盟国。自1942年仰光危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到完全取得胜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历时近半年，虽给日军以重创，但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一部撤回云南，一部撤至印度；第二阶段，1942年8月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负责中国驻印部队的整训，并于1943年2月重建中国远征军（本文称之为滇西中国远征军）进行整训，中国驻印军、滇西中国远征军在整训的同时，开始了反攻计划。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在芒友胜利会师。

第一阶段

组建中国远征军与入缅援英作战

滇缅公路是中国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开辟的一条重要国际交通干线，东起昆明，西至缅甸腊戍，与仰（光）曼（德勒）铁路连接，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行动即围绕滇缅公路展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决定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卫立煌（未就职）任司令长官，准备入缅援英作战。

1942年1月，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指挥第33、第55师团突破泰缅边境，



/ 中国远征军1942年1—5月入缅作战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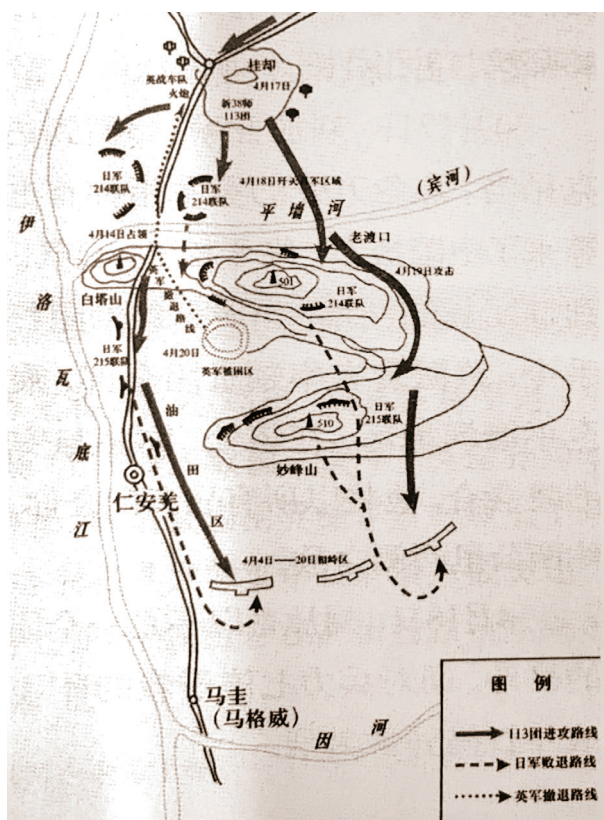
31日占领毛淡棉，2月4日占领拔安。2月16日，仰光形势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第5、第6、第66军共10万余人入缅作战。3月7日，日军南方军将第18、第56师团划拨给第15军，并令其向缅甸全境实施作战。3月8日，仰光沦陷，日军遂以第33师团由仰光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进犯，以第55师团由勃固地区向曼德勒进犯，以即将在仰光登陆的第56师团向东进攻，经莫契、垒固、东枝（棠吉）、雷列姆直插腊戍，妄图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路线，以第18师团进攻曼德勒。

中国远征军在曼德勒地区浴血奋战

中国远征军在日军分路北进时赶到前线，以第5军担任曼德勒正面作战；以第6军担任东路莫契、雷列姆方向作战；以第66军集结于曼德勒地区待机歼敌。西路伊洛瓦底江沿岸作战，由英缅第1师担任。1942年3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第200师进抵东吁（东瓜、同古），接收英缅军防务。东吁踞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要冲，它西衔普罗美、东接毛奇，成为阻止日军北进的重要屏障，亦可作为反攻的基地。因此，一场恶战就在这里展开。师长戴安澜率领第200师于3月19日拂晓开始争夺东吁的战斗，持续四天四夜，打退日军20多次进攻。25日，日军第55师团向东吁市区发起总攻，与守军第200师展开巷战，双方均伤亡惨重，原计划驰援守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却迟迟不能到位。27日至28日，日军继续猛攻东吁，并施放毒气。29日，日军第56师团也赶到东吁加入围攻，使东吁守军陷于苦战。但新编第22师进展缓慢仍然没有到位，第96师在运输途中又被阻于彬文那（平满纳）附近。杜聿明鉴于已经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东吁之围，而第200师伤亡过大，且弹药将尽，为保全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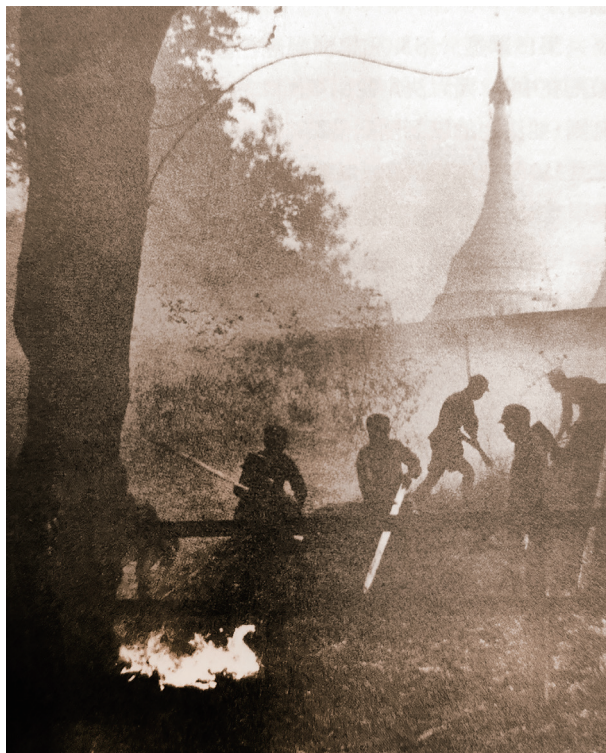


/ 在东吁（同古）战场上作战的第200师战士。



/ 仁安羌作战示意图。

遂令第200师撤出战斗。晚间，第200师主力突围至耶达谢归建。在东吁保卫战中，中国远征军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4月



/ 被日军轰炸的彬文那（平满纳）。

1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乘车到中国远征军第5军司令部所在地漂贝，会见杜聿明，赞扬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对中国军队在东吁掩护英缅第1师安全撤退表示感谢。

4月2日，罗卓英接替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4月3日，日军第15军确定其曼德勒会战计划：“以精锐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军的退路；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公路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敌军主力的两翼，在曼德勒以西、伊洛瓦底江地区压倒并歼灭该敌；然后，在腊戍、八莫、杰沙一线以西捕捉歼灭残敌，同时，不失时机地以精锐一部向怒江一线追击。”据此，日军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轴线实施进攻，以东西两翼进攻为策应。4月5日起，日军派第55师团依次向耶达谢、斯瓦等阵地实施猛烈攻击。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于4月9日制定彬文

那附近会战计划：以新编第22师为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北岸，依次阻击消耗进犯之敌；以第96师为固守兵团，坚守彬文那地区；以第200师为机动兵团，待机采取攻势，夹击围歼日军于彬文那地区。11日，日军第18师团到达战场，加入攻击。新22师逐次抵抗，日军伤亡惨重，不敢冒进。激战至16日，守军安全进入彬文那既设阵地。正当第5军彬文那会战准备大体就绪的关键时刻，东西两翼遭到日军威胁。在此情况下，史迪威、罗卓英于18日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北撤，准备曼德勒会战。

在援助西路英军作战中，英军全然不顾与中国远征军达成的作战计划和配合作战，私自决意放弃缅甸，全线退守印度。4月1日，英军放弃卑谬。5日放弃阿兰庙，并要求中国远征军到沙斯瓦、马圭接防，掩护其撤退。14日，进攻仁安羌的日军击溃宾河（平墙河）南岸英缅军，夺取了沙斯瓦、东敦枝等地。陷于危机的英军紧急要求援助，远征军长官部即令第66军新编第38师副师长齐学启率第113团赴皎勃东地区增援。17日，日军攻占马圭，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公路，英缅军第1师全部及坦克营一部被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惊恐万状的英缅军不断向中国远征军呼救。远征军长官部遂令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率主力增援。18日拂晓，第113团进至宾河北岸，向该地日军展开攻击，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击溃。此时，被围的英缅军第1师师长报告：“本师饮水及食粮断绝已经两日，困难万分，官兵无法维持，势将瓦解。”为解救英军危急，已抵前线的新编第38师立即调整部署，于19日拂晓向敌人实施猛烈攻击，直至下午终将日军击溃，收复油田区，救出被围的英军7000余人及被俘的英美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此举轰动英伦三岛，伦敦方面称为“暴风雨

前暂时沉寂中之一道清流”。

仁安羌援英之战，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以少胜多，击溃优势日军，解救出被围困数日的英军第1师，战果卓著，受到同盟国的赞誉。役后，孙立人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反攻当面日军，但英军违背共同防御计划，单方面向印度方向撤退，致使日军重新占领仁安羌，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结果付诸东流。

中国远征军作战失利被迫撤退

东吁失陷后，日军以第56师团向东进攻，经莫契、垒固、东枝、雷列姆直插腊戍，准备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路线。日军首先以坦克、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向垒固方面突进，守军未能有效阻敌前进。1942年4月20日垒固失陷后，日军第56师团分两路向北挺进，一路由和榜以西指向东枝，一路由和榜以东指向雷列姆。为应付危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于21日下令由第6军军长甘丽初率该军在雷列姆、和榜附近阻击向该方面攻击之敌；由杜聿明率第200师及军直属部队立即由敏铁拉乘汽车向东枝增援。23日第5军部队抵达时，日军已攻占东枝，第5军立即展开攻击，战至25日收复东枝。第5军决定集结兵力继续巩固东枝，向雷列姆攻击前进，以切断北犯腊戍之敌的后路。但史迪威、罗卓英下令除留第200师向雷列姆发起攻击外，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枝集结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折向曼德勒，准备曼德勒会战。杜聿明遵令率部西移。26日，东枝再度失陷。史迪威和罗卓英仍执意要在曼德勒会战，没有调集主力增援腊戍，致使守卫腊戍的兵力仅有新28师一小部。28日，日军攻占西保，29日侵占腊戍，并迅速向中国滇西进犯。由于驻守滇缅公路沿线的第66军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抵抗不力，致使日军在5月初接连侵占滇西边界的畹町、芒

市、龙陵等地，并推进至怒江惠通桥西侧。中国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奉命从滇西和昆明抽调部队前往怒江前线阻击，在惠通桥一带与日军激战3天，依托怒江天险挡住日军，与日军隔江对峙。同时，日军第56师团主力一部于3日攻占八莫，8日攻占密支那，切断了中国远征军主力的回国退路。

中国远征军艰难撤退腊戍失守后，史迪威和罗卓英急忙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各部队均东渡伊洛瓦底江，沿八莫、密支那大道撤向国内。后因回国退路被截断，遂改令全军向印度境内撤退。1942年4月30日至5月下旬，史迪威、罗卓英率长官部由瑞姑辗转进入印度。但杜聿明不愿入印，经请示决定率部经密支那向中国境内的片马、腾冲方面撤退。5月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13日开始徒步向北，取道孟关、大洛、葡萄之线返国。5月至7月，第5军各部均在撤退途中。新编第38师18日抵达曼西后，孙立人奉史迪威命令向西折往印度英帕尔。杜聿明率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向胡康河谷的大洛和新背洋撤退。行军途中，时值雨季，连日暴雨，山洪暴发，部队粮尽药绝，官兵饥病交加，损失惨重，仅新编第22师就因饥病死亡2000余人。5月31日，第5军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奉命改道入印，在美军空投粮药的支持下，7月25日抵达印度利多。第96师和炮兵、工兵各一部，奉命经孟拱、孟关、葡萄返回滇西，于6月14日到达葡萄转进野人山区，部队粮药断绝，历经千辛万苦，翻过高黎贡山，于8月17日抵达滇西剑川。

第200师自4月下旬东枝战斗后，奉命向北转移，沿八莫、南坎线撤退。在穿越西保、摩谷公路封锁线时，遭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率部奋战中身负重伤。5月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殉国。第200



/ 向印度撤退的远征军。

师官兵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扶棺向云南前进，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29日转到云龙时，全师官兵仅余2600余人。秋季，国内为戴安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高度赞颂了戴安澜的英雄气概和不朽功绩。7月20日，美国总统授予戴安澜军团功勋章，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卓著战绩。第66军（欠新编第38师）在腊戍失守后，主力沿滇缅公路逐次在维新、贵街、畹町、芒市等地拒止日军，并向龙陵、惠通桥方向撤退，在国内部队接应下，辗转至永平。退至景栋一带的第6军于4月30日获悉腊戍失守，遂向景栋附近的缅甸、泰国、老挝边境转移，分别撤回国内。

中国远征军第一阶段在中缅战场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戴安澜将军所说：“缅甸防卫之战，因我军

赶到太晚，建筑工事极感困难；前线‘缅甸’出没，耗我力量不少；又因英方军队不能配合，致某师在缅被围；又没有空军配合作战，制空权为敌人获得，使我军未能达成预期之战果。”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虽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的支援，可惜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

第二阶段

中国驻印军、滇西中国远征军积极整训准备反攻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失利后，一部撤回云南，一部撤到印度。为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提出由美国军官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和在云南装备训练30个师的计划得到批准。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撤销，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负责中国驻印部队的整训。自9月以后，中国方面开始陆续向印度空运士兵以接受训练，并学习使用美械装备。至1944年春，中国驻印军共装备、训练了3个师。经过整训，中国驻印军官兵的体质、装备火力、战斗技能都得到了明显提高。同时，驻守滇西的中国军队也进行了整训。1943年2月重建远征军，陈诚为司令长官（后由卫立煌接任），负责第二批远征军的筹组与整训。4月，陈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辖第11、第20集团军，计有第2、第6、第8、第53、第54、第71军。为使部队尽快掌握美械装备，先后举办了步兵、炮兵、工兵等训练班，培训部队下级军官，以提高作战指挥能力。中高级军官则空运至印度接受训练。在统一编制、充实员额的基础上，远征军开始陆续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中国驻印军、滇西中国远征军在进行整训的同时，积极筹

划反攻缅甸、滇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与此同时，日军也不断调整在缅甸的兵力部署，加强缅甸的防务，并企图进攻印度，以摧毁中印空运基地和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基地。为此，日军大本营于1943年3月设立了缅甸方面军，统一指挥缅甸的作战。随后，日军又向缅甸陆续增派了近5个师团的兵力。

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发起对日反攻作战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日军展开全面反攻作战。驻守在缅北胡康河谷的日军第18师团各部在中国驻印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驻印军迅速向南推进。在英、美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中国驻印军于1944年3月肃清了胡康河谷的日军，并攻占杰布山隘，打开了通向孟拱河谷的门户。4月初，中国驻印军开始向孟拱河谷推进。中国驻印军为求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在恶劣的雨季气候条件下继续南下作战。此时，中国远征军也在滇西向日军发起了反攻。6月，中国驻印军攻占孟拱城，全歼了孟拱河谷的日军。8月，中国驻印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防守密支那的日军大部被歼，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战败自杀。攻克密支那后，反攻缅北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完成，中国驻印军利用雨季进行休整。

滇西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发起对日反攻作战

1944年5月11日，滇西中国远征军在美军第14航空队配合下向滇西日军发起反攻，据守滇西的主要是日军第33军第56师团。第20、第11集团军第一线攻击部队陆续渡过怒江，向预定目标推进。至5月下旬，滇西中国远征军基本完成了强渡怒江和进攻高黎贡山的战斗任务。不久，滇西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令第20集团军攻击腾冲，第11集团军攻击龙陵、芒市。随后，滇西中国远征军全部渡过怒江，投入战斗。经过几个月鏖战，滇



/ 在胡康河谷中行进的中国士兵。



/ 在云南训练的中国士兵。

西中国远征军于9月相继收复松山、腾冲和平戛等地。滇西残余日军退守龙陵、芒市等地顽抗。滇西中国远征军逐步集中兵力攻击驻守龙陵的日军，歼其大部，于11月上旬收复龙陵。

中国驻印军、滇西中国远征军 完成反攻任务胜利会师

滇西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龙陵后，一鼓作气攻克芒市、遮放。日军第56师团残部及第2、第49师团各一部退至畹町附近占领阵地，企图作持久抵抗。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滇西中国远征军乘胜沿滇缅公路及其两侧



/ 滇西反攻胜利后部队举行胜利大游行。

攻击前进，并于1945年1月攻占畹町。1月27日，滇西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全部打通。次日，两军在芒友和畹町分别举行了会师典礼和中印公路通车典礼。中国驻印军和滇西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歼灭日军4.9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万人。

结语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支援了国内

战场的反攻作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此外，还沉重打击了侵缅日军，为盟军收复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减轻了盟军在印缅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压力，有力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对日作战及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胜利，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必胜信心，更促进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合作精神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总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并取得胜利，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

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师生

□ 林云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远征军即宣告成立。从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到1945年4月番号撤销，中国远征军在中国西南边陲和异国他乡组建、训练、作战，创造了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远征军将领中许多都是黄埔军校出身，对此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但是，已有研究通常只针对中国远征军的军事将领，而很少提及战前筹划、物资运输、交通建设等战争幕后的黄埔英雄。为了让他们的名字不被忘记，本文拟以两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为重点，同时覆盖滇缅公路的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梳理部分来自黄埔军校师级以上（除特别说明外）黄埔师生。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的黄埔师生

1941年12月，根据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由第5、第6、第66军组成，准备开赴缅甸与

英军联合作战，抗击日军对缅甸的侵略。

第5军中的黄埔师生

1933年2月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革命军第5军的编号一直空缺。

1937年4月，陆军交辎学校战车营与交2团装甲汽车连合编为陆军装甲兵团，直属国民政府军政部，杜聿明任团长，在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惨重。

1938年1月，装甲兵团在湖南湘潭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0师，为当时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11月，第200师在湖南湘潭扩编为新编第11军。

1939年8月，新11军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12月底至1940年初，第5军担任昆仑关战役的主力部队，虽损失惨重，但成功阻击并迟滞了日军进攻。

1942年初，应英国之请，蒋介石命令第5军由昆明驻地出发，于滇西集中，入缅甸作战。此时，第5军下辖第200师、新编第22师、第96师。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第5



/ 杜聿明。

军大部分开始撤回云南，之后一直留在后方整训。新编第22师后来改道撤往印度，后编入中国驻印军参与反攻作战。

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陕西米脂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并崭露头角。1936年，蒋介石派人考察欧美军队的现代化装备，致力于推动中国军队的机械化建设。杜聿明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筹建。1938年装甲兵团在湖南湘潭整训，先后扩编为第200师、新



/ 第11集团军攻打龙陵。

编第11军，后又改番号为第5军，杜聿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1939年桂南会战期间，杜聿明率领第5军正面迎击日军，沉重打击了敌人，取得昆仑关大捷。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地作军事考察。1942年初，中国派出远征军，以卫立煌（未到任，后改为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

戴安澜（1904—1942），字衍功，安徽无为县人。1922年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任校长的南京安徽公学高中部。1923年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第3期学习。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连长、中央军校少校区队长、教导第

2师迫击炮连长等职。抗战爆发后，戴安澜率部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多次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1月，杜聿明不再兼任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晋升为第5军第200师少将师长。此后，戴安澜率部先后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屡立战功，获颁四等宝鼎勋章（一说青天白日勋章），国民政府赞扬他为“当代标准之青年将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2月，第5军奉命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戴安澜率第200师开往缅甸的东吁（同古、东瓜），指挥了著名的东吁保卫战。第200师同来犯的敌人鏖战近半个月。达成战略目标后，蒋介石下令第200师北撤回云南。但是由于缅甸战场上英军

的溃败，导致日军已形成封锁线，撤退极其艰难。5月18日，第200师在朗科遭遇敌人埋伏，戴安澜身受重伤，于26日壮烈殉国。7月14日，戴安澜的灵柩运回昆明，各地纷纷举行公祭大会。10月6日，国民政府追授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后又发布戴安澜入祀首都忠烈祠和入省、县忠烈祠的命令。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纷纷敬献挽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安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对其家属颇为关心，并要求有关部门修缮其陵墓。2009年9月10日，戴安澜被授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廖耀湘（1906—1968），字建楚，湖南新邵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后赴法国机械化骑兵专业学习，成绩优异，1936年回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担任第200师少将参谋长。第200师扩编为新11军，任新编第22师副师长。后来新11军改番号为第5军，廖耀湘仍任新编第22师副师长。1939年率部参加

桂南会战。1940年5月晋升为新编第22师少将师长。1942年初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3月下旬，廖耀湘率部增援正在东吁阻敌的第200师，解了第200师被围之困。后又率部掩护第5军和盟军部队撤退，并进入印度地区整训。1943年10月，为打通中印交通线，廖耀湘受命率部由印度进入缅甸作战，战绩斐然，于1944年8月晋升为新编第6军军长。1944年12月，廖耀湘率新编第6军回国作战。

第6军中的黄埔师生

1938年8月，原属国民革命军第5军的第93师扩编为第6军，甘丽初任军长，先后参加武汉会战、桂南会战。1940年11月，第6军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在贵州兴仁、安龙、兴义附近整训，此时下辖第49师、第93师及第8补训处，后为适应战争形势，第8补训处改编为暂编第55师。1941年12月，第6军开始调度兵力向滇西集合，为入缅作战做准备。1942年2月入缅作战。1945年6月撤销番号。

甘丽初（1901—1950），字日如，广西容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1期，先后参加过东征、北伐战争等。1935年接任第93

师师长。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8月南京国民政府将第93师扩编为第6军，甘丽初升任军长，率部先后参加武汉会战、桂南会战。1942年2月，第6军编入中国远征军，甘丽初率部开赴缅甸，对日作战。甘丽初的第6军负责在缅甸东部的莫契、雷列姆等地抗击日军，因调度不力、情报工作滞后等原因，第6军不断溃退。4月，雷列姆、腊戍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第6军损失惨重，甘丽初被免去第6军军长职务，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兼任西南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

吕国铨（1903—1983），字保全，广西陆川县人，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淞沪会战、桂南会战，1939年擢升为第6军93师师长。1941年11月，第6军奉命进驻滇南开远，后第93师进驻佛海（今云南勐海县），其中第277团驻扎车里（今云南景洪市境内）一带。1942年初，率部入缅作战，以景栋为据点，扼守湄公河以北至景栋一带，相继与日军、泰国军队交锋。5月15日后放弃景栋，撤回云南佛海，以车里、佛海、南峇一带为主要防区。驻防佛海时，第93师



/ 甘丽初。

还与来犯的泰国军队交战多次，均成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945年，吕国铨奉命前往老挝处理日军投降事宜。

彭璧生（1907—1983），湖南蓝山县人，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曾任国民党第5军200师副师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后升任第6军49师师长，率部在贵州安龙县进行整训。1941年任滇缅公路西段警备司令，指挥部队依次由黔入滇，开往中缅边界待命。1942年2月入缅作战，负责景栋以西至萨尔温江地区。4月，缅甸作战失利，第6军开始撤回国内。第49师经景栋、孟连等地回到佛海后，驻防南峇县一带后又开往思茅。1943年秋，彭璧生调任第5军副军长兼湖南军管区零道师管区司令。

陈勉吾(1895—1948)，广东丰顺县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骑兵教官，参加过北伐战争。1939年初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中央补训处副处长，后调第8补训处。1941年，第8补训处改编为暂第55师，陈勉吾任师长。1942年2月，暂第55师从云南宜良县至昆明，后开往芒市休整，不久进驻缅甸腊戍。4月，暂55师与日军多次交锋。由于防线过长，日军对暂55师实施引诱深入、迂回包抄、切断萨尔温后撤路线的策略，暂55师溃败。5月15日后撤回车里布防，不久开往思茅，后转往昆明整补。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陈勉吾被撤职受审。

第66军中的黄埔师生

1941年12月底，在重庆的军政部第二补训总处改编为第66军，下辖3个师（新28师、新29师、新38师），军长张轸。后开赴贵州普安、兴义一带整训。1942年初编入中国远征军，从贵州出发，经云南进入缅甸作战。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新28师编入第71军，新29师番号被撤销，新38师转为中国驻印军主力，后改编为新1军。

张轸(1894—1981)，字翼三，河南罗山县人。早年参加过二次革命。1925年任黄埔军

校第4期战术总教官，后参加北伐战争。抗战时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随枣战役等。1941年任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6军军长。1942年4月，率部入缅作战。4月14日率部到达腊戍，曾指挥旗下新38师解救英国军队仁安羌被围之困。第66军负责驻防曼德勒至腊戍一带，战线拉得过长，部队相继在东枝、腊戍、畹町等地与日军交战，战况惨烈。5月率部撤退回云南惠通桥。缅甸作战失利后，率部在云南祥龙进行部队整训，后调任第14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

刘伯龙(1899—1949)，贵州龙里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1939年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别行动总队编为新28师、新29师，刘伯龙任新28师师长。1940年新28师驻贵州黄平、兴仁整训，后编入新成立的第66军。1942年1月，奉命率部由贵州兴仁出发，经贵州兴义，云南师宗、罗平、保山等地进入缅甸。4月，新28师进驻腊戍。根据命令，新28师驻防于曼德勒，后又调部分兵力驻守腊戍、梅苗等地。5月，新28师在腊戍、梅苗等地阻敌，坚守阵地。后因敌军重兵围攻，腊戍等地相



/ 张轸。

继失陷，新28师撤回云南，在畹町、芒市等地阻击敌人。刘伯龙后调任黄埔军校教育处处长。

马维骥(1904—?)，四川新都人，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曾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侍从副官，后长期任职于特别行动总队。1939年，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别行动总队编为新28师、新29师，马维骥任新29师师长。1942年4月28日至5月1日，新29师在腊戍等地阻敌，损失惨重。5月5日，新29师撤回云南境内，后经镇康转保山休整。由于此次入缅作战失利，新29师番号被撤销，马维骥调往他处。

中缅运输总局中的黄埔师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争的深入，中国物资的进口



/ 缅甸沦陷前，滇缅公路的繁忙景象。

基本依靠西南地区的交通线。1937年10月，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不久改称西南运输公司，负责办理从香港、越南、缅甸进口的国际援华物资，以及中国用以换取外汇的出口产品在国内外接转运输工作。1938年9月，西南运输公司迁驻云南昆明。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及太平洋局势的

变化，日军对东南亚地区侵略愈紧，西南地区物资运输面临较大困难。为适应形势变化，国民政府于1941年11月在昆明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中缅运输总局，对外称中缅运输公司，接管西南运输公司在滇缅地区的物资转运工作，俞飞鹏任局长，陈体诚任副局长。下设昆明、楚雄、下关、保山、遮放等5个总站，分别

由任润田、余啸南、薛文蔚、李承恩、陈安润负责。1942年5月，滇缅国际运输线被日军切断，中缅运输总局业务基本停止。

俞飞鹏（1884—1966），字樵峰，浙江奉化人。1924年，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后历任黄埔军校军需部临时主任、副主任，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交通部次长、交通部部

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在国民政府西迁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后任中缅运输总局局长，负责滇缅公路的修建与物资运输等。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俞飞鹏主持下的中缅运输总局为入缅作战的部队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后因作战失利，滇缅公路上的重要物资转运与存放点腊戍、畹町等地被日军相继攻占，俞飞鹏亲抵畹町主持撤退事宜，但大量物资来不及转运，只能下令烧毁。至5月5日惠通桥被炸断，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基本中断。之后，俞飞鹏调回重庆，中缅运输总局撤销，成立新的滇缅公路运输局，但滇缅公路的交通线直至1945年1月畹町收复才得到恢复。

任润田（1900—？），河北大名县人，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1939年5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将编制不一的运输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辎重汽车兵团或直辖大队，任润田任位于湖南邵阳的辎重汽车兵1团团长。1941年11月，中缅运输总局成立后，任润田任昆明总站总管。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滇缅公路被切断，任润田调任川滇公路线区司令，司令部设在云南曲靖。抗

战胜利后因病去世。

缅北反攻时期中国驻印军中的黄埔师生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新38师和新22师转移到印度休整，由美国方面的军事将领对他们进行整训。因整训地点在印度，因此这些部队被统称为中国驻印军。新22师（师长廖耀湘）、新38师（师长孙立人）和后来由国内调到印度参加整训的新30师（师长胡素）组成新1军，郑洞国任军长。1944年8月，攻下密支那后，已是雨季，中国驻印军开始就地休整，并完成扩编。原有的新1军扩编为两个军：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辖新编第38师（师长李鸿）、新编第30师（师长唐守治）；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辖新编第22师（师长李涛）、第14师（师长龙天武）、第50师（师长潘裕昆）。10月，缅北雨季结束，休整完毕的中国驻印军继续反攻作战。至1945年初收复芒市、遮放等地，中印公路全线通车，中国驻印军、滇西驻军和盟军胜利会师，缅北反攻作战取得胜利。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湖南石门县人。1924年考

入黄埔军校第1期。参加过东征、北伐战争。抗战时期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枣宜会战等，战功赫赫。1943年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后升为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指挥部队开展缅北反攻战役。在攻克密支那的战役中，郑洞国指挥部队以对壕作业向前推进，与日军争夺一路一屋，终于彻底打退了密支那的日军。攻克密支那后，郑洞国指挥部队克复八莫、南坎等地，并于1945年1月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芒友，打通中印公路。后又率部继续作战，收复腊戍、皎梅等地，至此缅北作战基本结束。

胡素（1899—1978），字白凡，江西清江县（现樟树市）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参加过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44年春任新编第30师师长加入中国驻印军，参加反攻作战。5月率部参加密支那战役，根据战场形势和环境制定了“坑道战”作战方法，成功打破僵局，促使胜利的天平向盟军倾斜。1944年7月晋升为新编第1军副军长。

潘裕昆（1906—1982），字孔希，湖南浏阳人。1925年考入黄埔第4期。参加过淞沪会



/ 远征军占领密支那机场。

战、武汉会战。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率部在仁安羌地区解救过英国军队，得到英国皇室嘉奖。1944年率部参加缅北反攻作战，后任第50师师长，率部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1945年奉命到香港负责接受日军投降。

唐守治（1907—1975），字浩泉，湖南零陵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参加过淞沪会战。1941年任新38师副师长，后率军入印度整训。1944年继胡素接任新30师师长，率部参加克复南坎、攻占腊戍等战役，直到中国远征军最后胜利。

李鸿（1904—1988），字健飞，湖南湘阴县人。1926年考

入黄埔军校第5期。1942年任新编第38师114团团长，率部参加仁安羌战役，后率部入印度整训。1944年擢升为新38师师长，12月率部攻克缅北水陆交通枢纽八莫，受到英国政府和盟军嘉奖，将八莫市区一条马路命名为“李鸿路”。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驻滇远征军在芒友会师，李鸿担任会师庆典指挥官，尔后率部参加克复腊戍的战斗。6月率部回国，赴广州负责接受日军投降事宜。

龙天武（1906—1983），湖南石门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抗战爆发后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1944年任第14师师长，参加

缅北反攻作战。第14师在此次作战中担任总预备队，同时以一部担任侧翼掩护及警戒任务。12月中旬，第14师与新22师一道奉调回国参战。

李涛（1901—1957），湖南邵阳人。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抗战爆发后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昆仑关战役等。1944年下半年缅北反攻作战时期升任新22师师长，后率部渡过伊洛瓦底江，参加进攻瑞姑、南坎等地的战斗，并奉命截击由腊戍方面的来援之敌。12月中旬，新22师奉调回国参战。

滇西反攻时期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师生

中国驻印军发动缅北反攻作战之际，集结在滇西地区整训的中国远征军也计划着反攻作战。中美两国元首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滇西的中国远征军部队于1944年5月按照拟定的作战计划开始反攻作战。

滇西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负责指挥的主要有第11集团军与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副总司令黄杰）下辖第2、第6、第71军及军直属部队。其中，第2军（军长王凌云）辖第9、新33和

第76师，第6军（军长由黄杰兼任）辖预备第2师和新39师。第71军（军长钟彬）辖第87、88师和新28师。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副总司令方天）下辖第53、54两军。第53军（军长周福成）辖第116、130师。第54军（军长由方天兼任）辖第14、50、198师。1944年4月，第14、50师空运印度，第11集团军直辖的第36师拨归第54军。此次滇西反攻作战参战部队众多，在此简要对参战部队军长级以上（含军长）黄埔师生作一概述。

宋希濂（1907—1993），字荫国，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等。1941年，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撤退时，率部驰援远征军，成功阻击日军于惠通桥畔。1944年5月，为策应远征军反攻，指挥第11集团军强渡怒江，先后攻克平戛、芒市等战略要地，为第二次入缅作战打通了交通要道。

黄杰（1902—1995），字达云，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1943年中国远征军重组，出任

第11集团军副军长兼第6军军长。1944年率部到保山强渡怒江参加反攻作战，9月接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组织对龙陵的第三次围攻作战，根据战场形势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夺回了龙陵这个战略要地，奠定了中国远征军反攻胜利的基础。

霍揆彰（1901—1953），字嵩山，湖南酃县（今属湖南衡阳）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1942年，升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滇西反攻开始，第20集团军率先强渡怒江，向腾冲的日军发起攻击。腾冲一役，霍揆彰指挥部队采取穿插与重点围攻的作战战术，将据守腾冲的日军全部消灭，获南京国民政府和美国盟军双重嘉奖。

方天（1902—1991）：字天逸，江西赣县人，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参加过长沙会战、宜昌保卫战等。1944年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4军军长，5月率部参加滇西反攻作战。其间，指挥第54军主力部队在栗柴坝至双虹桥之间渡过怒江后，沿冷水沟至北斋公房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经一个月血战，6月将日军残部压缩

至腾冲。54军之后连续攻克飞凤山、宝凤山，并协同其他部队与腾冲日军激战，直至收复腾冲。

钟彬（1900—1949），字中兵，广东兴宁县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1942年任第71军军长，参加中国远征军，隶属第11集团军，负责怒江东岸的防守任务。1944年滇西反攻作战期间，率部向龙陵、松山等地进攻，多次打退日军对龙陵的驰援，最终成功收复龙陵。

史宏烈（1903—1970），字剑峰，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44年9月接替黄杰任第6军军长，率部从龙陵出发，沿滇缅公路向芒市、畹町等地进攻，至1945年1月收复畹町，将日军彻底逐出中国西南国门。

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从军队指挥人员构成来看，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师生。同时，负责滇缅公路物资运输、后援补给的相关机构官员也大多是黄埔军校师生。他们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用行动生动诠释了黄埔精神，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人和事

□ 姚新婧

在中国远征军中，众多黄埔军人秉承黄埔军校校训，发扬黄埔精神，在中缅印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彰显了中国军人本色，为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戴安澜与柳树人：战场上并肩作战

1924年，20岁的戴安澜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队，1926年毕业。同年，21岁的柳树人南下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之后在烽火硝烟中，戴安澜与柳树人结识，二人以师兄弟相称，结下了亲如兄弟的感情。

从1932年开始，柳树人就跟随师兄戴安澜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初，戴安澜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第200师师长。12月，第5军开赴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第5师团激战，取得昆仑关大捷。柳树人在此战中立下大功，被提升为第200师599团团团长，从此成为戴安澜的得力助手。



/ 戴安澜。



/ 柳树人。

1942年2月，缅甸仰光告急，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作战。3月8日，作为远征军第5军先遣部队，第200师入缅作战，接收英缅军在东吁（同古、东瓜）防线的防务。3月19日，第200师在东吁与日军展开激战，拉开了东吁保卫战序幕。在长达12个昼夜的苦战中，戴安澜与柳树人并肩作战，率领部队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有力支援了英缅军的安全撤退。4月，日军集中军队攻打腊戍，盟军全线撤退。4月下旬，第200师结束东枝（棠吉）战斗后，

奉命向八莫、南坎方向转移。5月18日，第200师到达朗科地区，遭到了日军第56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突袭。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被日军机枪击中，身负重伤。柳树人奉命率第599团从右翼侧击敌人，掩护全师撤退。柳树人听闻戴安澜身负重伤，便带领数名战士前往营救，在冲杀间中弹阵亡（一说是跌落山崖后被日军抓获杀死），长眠于异国他乡。之后，戴安澜由士兵用担架抬着随部队一起撤退。因雨季行军，缺乏药品，戴安澜的伤口开始感染化脓，26日下午，在缅甸

北部茅邦村牺牲，年仅38岁。6月，戴安澜的灵柩经过安顺，柳树人的父亲柳惠希对众人道：“余盛年时，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剧之秋，未能执戈卫国，抱憾无穷。每以此意训子，冀能成我之志。吾子树人幸得为志士戴安澜将军之部属，共将军异域捐躯，成我未成之志，我何悲痛哉？”

1942年，戴安澜被迫晋为陆军中将。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2009年，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入选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抗战胜利后，柳树人被追赠为陆军少将，2015年入选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刘放吾：仁安羌大捷功臣

1899年，刘放吾出生于湖南桂阳仁义镇下元村，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6年9月，刘放吾中学毕业后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步兵科，1929年毕业。1941年12月，税警总团奉令将下属第2、第3、第4团依例改编为第112、第113、第114步兵团，加上直属部队合编为第66军新编第38



/ 刘放吾。

师，刘放吾任新编第38师113团上校团长。1942年4月，新编第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奉命入缅作战。

与此同时，日军占领缅甸仰光后，兵分三路追击英军，将英军第1师包围在仁安羌地区。仁安羌，缅语意为“油河”，是当时缅甸最大的油田，位于缅甸中部偏西，气候干热。被包围的英军缺粮少水，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英军请求中国远征军救援，远征军指挥部立即命令新编第38师113团前去救援。4月18日，刘放吾率领全团到达宾河北岸，将日军击退。19日，第113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从正面突破日军501高地，最终攻克了整个仁安羌油田区域，救出被围的英军

7000余人、汽车100余辆、战马1000余匹，及被俘的英美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在第113团的掩护下，英军安全撤离。英军在见到第113团时，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

仁安羌大捷，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以少胜多，战果卓著，受到同盟国赞誉。然而刘放吾却没有获得应得的奖励，只有一张奖章证书，奖章证书上核准的甲种一等奖章，迟迟没有拿到实物。刘放吾性情敦厚，淡泊名利，也不太对家人提起当年的事情经过。这导致所有功劳被一个“假冒将军”林彦章冒名顶替，仁安羌大捷的历史真相长期被扭曲篡改，而真正指挥这场战斗的第113团团团长刘放吾一度无人知晓。直到1963年，轰动港台的“真假将军案”发生，刘放吾与第113团的英勇事迹才被众人知晓。

1992年4月，正值仁安羌战役50周年之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到美国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向93岁高龄的刘放吾致谢，再三感谢他50年前的壮举。美国总统布什、英国国防大臣等也都纷纷来函致意。面对种种殊荣，刘放吾只是淡然一笑，说道：“那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遇危难，援救是



/ 仁安羌战斗实况。

应该的，不能列为战果。”

2013年1月13日，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在缅甸仁安羌当年战地501高地落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缅甸所建造的第一座纪念中国远征军战绩的纪念碑。2020年9月，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张祖武：炸毁惠通桥 成功阻击日军

1901年，张祖武出生于湖

南长沙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了贴补家用，张祖武曾做过学徒。1929年5月，张祖武从黄埔军校第6期第1总队工兵大队第1中队毕业。1933年，张祖武考入军政部陆军工兵学校学员班第3期受训。1936年2月11日，张祖武调任黄埔军校第11期第1总队工兵队少校区队长。1938年，张祖武任江西“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中校筑城教官，先后培训了战干3团第1和第2期学员。1939年，战干

3团第3期并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列为成都分校第16期政训总队，张祖武在政训总队继续担任筑城教官。冬季，军政部在全国各地成立了35个独立工兵营，张祖武出任独立工兵第24营中校营长。

1941年春，张祖武率领独立工兵第24营从湖南出发赶赴滇南前线，与日军隔红河对峙。1942年4月底，张祖武奉命率部从滇南红河前线转往滇西赴缅作战。5月3日，中缅边境畹町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云南

遮放、芒市和龙陵相继被日军占领。日军涌向了横跨在怒江上的滇缅公路惠通桥段，该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也是进攻中国怒江防线的唯一通道，战略意义非同寻常。张祖武率部于5月5日上午9时到达怒江天堑惠通桥东岸桥头。没过多久，中国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参谋长萧毅肃、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一行来到惠通桥，张祖武上前相见。马崇六听到张祖武携带着爆破器材后，一个劲儿地说：“好，好。”马崇六为什么听到张祖武带着爆破器材之后说好呢？张祖武后来跟别人解释：“工兵营到昆明的时候，工兵指挥部让第24营把旧装备卸下来，到缅甸去领新装备。可是我觉得军情变化难测，得以防万一，就请求带着原装备到缅甸，然后再换新装备。指挥部就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想到这时候还真派上了大用场。”

四人商量后，马崇六用信纸写下手令。随后，远征军参谋团车队匆匆离去。手令写了3条内容：第一，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头原地待命；第二，如果敌人强行占领惠通桥，马上炸桥；第三，完成任务后给部里发电报。张祖



/ 张祖武。

武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这项临时紧急命令，拿出炸桥方案大家一起研究后，便立即行动。9时40分左右，日军占领西岸制高点，开始猛烈炮轰东岸。10时50分左右，从西岸扑向桥头的日军出现在张祖武的望远镜里，张祖武高喊：“点火！”并用力按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桥身断裂，沉入江底，成功阻止日军前进。

炸桥任务完成后，张祖武率领全营准备撤回保山。因日军轰炸，公路被破坏严重，造成车辆堵塞。张祖武率部徒步20多个小时，于5月6日上午到达保山。随后，张祖武奉命率部赶赴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布防。6月，独立工兵营第24营结束任务，回到昆明。张祖武

为纪念1942年5月5日炸毁惠通桥阻止日军于怒江西岸之事，专门制作了“惠通桥五五纪念章”。

1944年，中国军队收复滇西时复建惠通桥。1987年，惠通桥被云南省政府认定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滇缅公路惠通桥被评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滇缅公路惠通桥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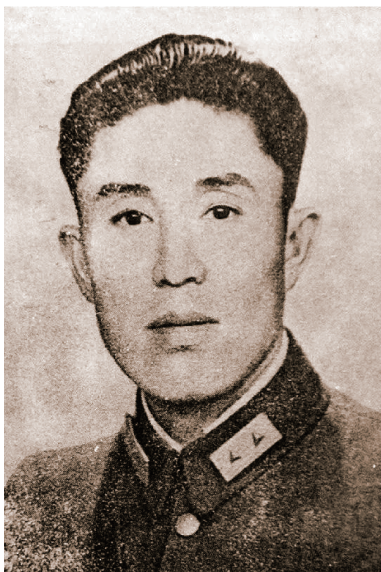
郑洞国：受命赴印 肩负重任

1903年，郑洞国出生于湖南石门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4年春，郑洞国听说广东要创办黄埔军校，正在招收学生，便与同学、同乡一起前往广州报名，通过考试后成为黄埔第1期生。

中国远征军1942年入缅甸援英作战失利后，一部分撤回云南，一部分撤到印度，其中撤至印度的部分主要来自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驻扎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伽营地。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负责

中国驻印部队的整训。但史迪威和罗卓英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史迪威坚决要求撤销罗卓英的职务。之后，罗卓英被调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不再设立副职，并将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合并为新编第1军。而在决定新编第1军军长人选的时候，最终觉得温文尔雅的郑洞国更为合适。

1943年春，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和中国官兵的关系，维护中美英盟国间共同对日作战的大局，同时又要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还要维护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士气。对于郑洞国来说，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郑洞国到任后，自然受到史迪威等美国将领的排挤和猜疑，权力较小，只有管理军风军纪等权限。好在郑洞国对他在中国驻印军的使命非常清楚，虽然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但仍然没有怨言。他深明大义，决心用真诚和能力赢得史迪威的理解和信任。而且他也了解到中国驻印军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对美国人的不满情绪。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期各师中下级军官，以及总部各直



/ 郑洞国。

属部队的部队长，大都牢骚满腹，经常跑到军部诉苦。”他以不破坏中美联盟为基础，对中国官兵进行思想教育，晓之以理，并以尽快“打回祖国去”为最终目标，鼓励大家努力训练备战。

根据郑洞国当时的作战参谋、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回忆，即便是性情温和、处事稳重的郑洞国也忍受不了美国人的欺负，曾两次请调回国，但都被强令阻止了。他只能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下去，最终以自己的真心诚意和军事才能赢得了史迪威的信任和部属的拥戴。史迪威对中国将领的态度也有了改变，放权让他们指挥部队作战。

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1943年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向缅北日军发起进攻，缅北反攻作战由此展开。10月24日，在缅甸新平洋和于邦大战中，新1军击败号称“常胜师团”的日军第18师团。1944年4月底至8月初，在缅甸密支那攻坚战中，新1军歼敌数千人。攻克密支那后，反攻缅北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完成。中国驻印军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编成2个军，即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事紧张，新6军奉命回国，新1军则继续作战，先后攻克了八莫、南坎、芒友等地，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远征军在芒友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等地，于3月30日与英军会师乔梅，至此，缅北反攻战役结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远征军里的黄埔华侨生

□ 王加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团结奋战、同仇敌忾的精神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在广大海外侨胞中也涌现了一大批矢志报国、归国从军的爱国青年，成百上千的华侨青年积极报考黄埔军校，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中国政府为了使这些华侨青年有一个正当的报国途径，也为了补充抗日队伍，便在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组建华侨总队，黄百强将军担任总队长。在驻各国侨务机构的协助下，先后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欧美各地，招收了1000多名生员。这些华侨青年虽然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不同的地区，但都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

战斗在一线的李英才

李英才，祖籍广东恩平，黄埔15期毕业。1918年，李英才出生于泰国曼谷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是摄像师，母亲是裁缝，家中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泰国中华总商会号召青年华侨回国参军，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此时，李英才已经取得了泰国教育部华校教师任职资格，但抗日救国的热情让他毅然放弃了心爱的教师职业，转而参军报国。一开始，李英才并未将这个决定告诉父母，当父亲看到他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时，默默地帮他叠衣服，支持他的



/ 李英才。

爱国之举。

李英才和第一批由泰国返回祖国参军的其他青年来到新加坡，在驻新加坡领事馆与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回国参军的华侨青年汇合后，经香港来到广州。第一次见到祖国的模样，李英才和同学感到十分痛心，广州与繁华的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到处都是惊慌逃难的人群，城市街道满目疮痍，李英才和同学纷纷将自己的衣物、食物分给难民。而后，李英才和同学从广西梧州来到柳州，报考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成为黄埔15期学生。

李英才回忆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的情景：“学校分步、骑、炮、工、辎重五科，我学步兵科。学校军训很累，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同学病倒了，还有人半途退学。几个月后，学校搬到桂林，学员们背着枪和背包行军4天，我第一次走这么多路，两条大腿疼得肿起来，不过消肿后就不疼了。说来



/ 中国远征军在进攻来凤山战斗中首次使用火焰喷射器。

也奇怪，以后打仗经常行军，我的腿再没疼过。”黄埔军校的纪律十分严明，在校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内务不整洁、枪械保养不到位或者对长官态度不好，都会受到处分，积累几次处分之后，就会令其退学。李英才在黄埔学习的两年期间，也曾受到过一次处分。那次，他因为过于疲惫，躲在宿舍里没有参加早操，为此被关了一天禁闭。

1940年，李英才顺利毕业，被分派到广西的一个训练补充团任排长，负责训练新兵。1943年，调任第6军新39师上尉连长，参加中国远征军，后来还参加了著名的松山战役。当时，日军据守松山高地和滩头阵地，李英才所在部队从上游渡江登陆，迂回到松山侧面进攻，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战士们趴在地上很难前进。于是，师长洪行命人连夜用铁皮制作盾牌，战士用盾牌挡在头上，

起到些许防护作用，但进攻的效果仍然不佳。直到后来用上了美国的火焰喷射器，再加上空军支援，才将日军的火力压制住。战斗中的一个夜晚，李英才和几个战士巡逻时，发现了几名日本士兵，李英才率先冲上去，用刺刀杀死了一个敌人。攻克松山后，李英才又带连队参加了芒市收复战，直至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国土。

不怕远征难的陈英波

陈英波，祖籍广东潮州，黄埔17期毕业。陈英波从小和家人一起在泰国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英波同其他爱国华侨一起返回中国，抱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奔赴抗日救亡的最前线。1939年，回到祖国的陈英波考入黄埔军校。由于各省之间的往来交通经常被阻断，陈英波和其他



/ 陈英波(右)与四分校 16 期步科林盛传(左)的合影。

100 多名同期考入黄埔军校的学生，只能从广西境内徒步行军，经过贵州、重庆、甘肃等七个省，最终抵达陕西，入读军校。

入学后，陈英波被编入第七分校第 10 总队（特科总队）步兵科第 1 队接受军事训练。由于各地生源抵达军校的时间不同，陈英波所在的第 10 总队到 1940 年春天才开始正式训练。1943 年，陈英波从军校毕业并被分派至赴缅甸远征军所属的第 5 军服役。

此时，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远征军已经回到国内，并在云南重新整编。在盟军的支援下，部队已经换上了更加先进的美式装备。为了增强士兵的战斗力，军部专门成立了军士教导队，由军长邱清泉亲自领导，在全军进行选拔，每个连队选拔 1 至 2 名班长参加集中训练，陈英波名列其中。集训结束后，陈英波被派遣到第 49 师 145 团 1 连担任排长。同时，盟军也派遣了顾问团协助远征军进行训练。顾问团教官结合滇缅一带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设置训练课程，以森林战、山地战、夜间战斗、肉搏战、防空、防毒等项目为主，对士兵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1943 年 11 月，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驻印军和

英美盟军从印度反攻缅甸，卫立煌接替陈诚率领远征军准备配合史迪威由滇西强渡怒江，向松山、龙陵、芒市等地进攻，形成东西夹击，力求一举歼灭盘踞在缅甸的日本侵略者。由于滇西地区山路崎岖、气候恶劣、毒物蚊虫极多，远征军战士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许多先期抵达的远征军战士患上痢疾、疟疾等疾病，死亡率非常高。所幸，盟军派遣的医疗队及时赶到，为远征军将士制作防蚊罩，分发药品和防蚊油等，并对部队的饮用水处进行消毒，帮助远征军战胜了瘴气和毒虫，极大地保持了远征军的战斗力。

1944 年夏季，远征军向滇西的日本侵略者发起进攻，第 71 军新 28 师和第 6 军新 39 师先后强



/ 中国士兵接受美国军官训练。

渡怒江，并向据守松山的敌人发起进攻。敌军凭借坚固的阵地进行顽强抵抗，远征军久久不能攻下。松山战役打响后，陈英波所在的第145团奉命增援攻击松山的友军，在沿滇缅公路向保山行进的过程中，所乘汽车遭到了日本战机的空袭。战士们立即弃车向公路两旁的树林疏散掩蔽，部分士兵来不及躲避，或被机枪扫中，或被爆炸的炮弹波及，伤亡很大。一些战士不甘心白白挨打，用机枪、步枪向敌机反击。

陈英波看到日军的空袭怒火中烧，抬起一挺轻机枪准备反击，另外一名姓黄的班长见状立即抓住轻机枪的两个脚架，两人互相协助跟随敌机行进的方向转动机枪，试图在敌机俯冲的时候将敌机打下来，为战友报仇。可惜数次都未能命中，两人反而被敌机投掷的炸弹所产生的热浪掀倒在地，黄班长中弹不幸牺牲，陈英波的腰部也被击伤。所幸盟军飞虎队机群及时赶到，与日军战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敌军溃败。陈英波回忆：“我团被炸后，公路上、树林中到处是伤亡的官兵，更有阵亡官兵肢体飞挂树枝，惨不忍睹。军部救护车紧急前来抢救，全团官兵死伤200多人，其中连长1人，排长3人，我连士兵死伤20多人。一时人人愤恨，决心为死难弟兄报仇。其后部队重新编组，我轻伤不下火线，随部队继续前进。”

部队抵达松山战场后，由于日军的防守火力过于猛烈，强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于是改用坑道作战方式，逐步向敌人的阵地靠近。经过10多天的艰苦作业，部队成功将坑道挖掘至日军松山主阵地的下方，并将大量炸药、爆破筒装填于敌人主阵地之下。总攻命令发起后，伴随着炮兵团15门榴弹炮的猛烈射击，攻击部队也引燃了日军主阵地下方的爆炸物，日军主阵地完全被炸毁，其残部试图突围。陈英波带领本排十几名战士，手

提冲锋枪冲进敌人的阵地，对残余的日军进行逐个清剿，部分执迷于武士道精神的敌人垂死挣扎，试图与远征军战士同归于尽，被逐一消灭。陈英波在检查日军的死尸时发现，大多数日军都被爆炸中巨大的气浪所震击导致口鼻出血。3名被陈英波连队俘虏的日军也被大爆炸震得耳聋口哑，神情呆滞。

拳拳赤子心的陈晶生

陈晶生，祖籍广东大埔，黄埔17期毕业。陈晶生原是马来西亚柔佛丰盛港一家洋货店的少东家，家境殷实，在吉隆坡尊孔中学毕业后，南下新加坡学习英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洋华侨陈嘉庚领导的星华筹赈会成立，通过开展卖花、售旗等方式筹款救国，陈晶生积极投身运动，支援抗日战争。

1939年，为进一步扩充抗日力量，黄埔军校再次来到南洋招收华侨青年，陈晶生毅然报名参加。黄埔军校计划在新加坡、吉隆坡和檳城三地招生120人，报名非常踊跃，仅新加坡一地就有超400人报名。报名者当中有些是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成年人，有些是十八九岁的热血青年，大家都抱着抗日救亡的决心，毅然返回祖国。

当时，广州已经沦陷，黄埔军校已经化整为零撤退到后方。陈晶生等侨生来到广西宜山的一个荒芜地区，缺少衣食住所，只好住到猪牛搬迁后留下的猪圈和牛圈里，用稻草作为铺盖，饮食及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尽管如此，大家都抱着为国牺牲的决心，咬紧牙关适应战时生活。

进入军校学习的前3个月是劳动生活，学生们用镰刀、斧头砍下树干、竹子作建筑材料，兴建校舍和宿舍。然后就是军事训练，每名侨生配发1支步枪和100发子弹，同时还接受肉搏战训

练。学习结束后，陈晶生等爱国华侨获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毕业证书及徽章。毕业后的陈晶生留校继续任教，负责教导新入学的学生。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偷袭美国位于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日军侵占缅甸，滇缅公路被切断，国际社会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境内运送军事及救援物资受到了极大影响。为了应对新的战争局面，中国政府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协助英军撤出缅甸，身处广西的陈晶生前往昆明准备上前线。

由于陈晶生通晓汉、英两种语言，被分派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英军从缅甸撤退到印度。在缅甸的战斗十分艰苦，当时的局势是敌强我弱，且正处于雨季，道路泥泞、气候恶劣，日军飞机随时会出现在中国军队撤退道路的上空，进行轰炸和扫射。还有许多缅甸奸细向日军泄露中国军队所在位置，使部队的撤退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只要听到飞机的马达声，战士们就立刻钻入附近的沟渠进行躲避。几经艰险，陈晶生等人才完成保护英军撤退的工作，返回昆明休养两个月后奉派到重庆。

除上述黄埔侨生外，还有许许多多华侨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例如祖籍福建、幼年随祖父移居荷属爪哇巴达维亚的老战士陈锡銓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慰问团”来到昆明。得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后，陈锡銓再也无法按捺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第一时间报考了西迁到成都的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17期学生，矢志以一腔热血抗击日本侵略者。军校毕业后，陈锡銓随部队南下昆明，后来加入杜聿明率领的缅甸远征军，



/ 陈锡銓。

被编入新29师。在之后的战斗中，陈锡銓所在的新29师牺牲巨大，全师8000多名战士所剩无几，战场上铺满被炮弹炸飞的残肢断臂的场景让陈锡銓一生难以忘怀。又如，1943年为准备反攻南洋，国民政府专门到黄埔军校征调南洋华侨毕业生到南洋各国专门从事军事渗透。其中黄际平、黄绿峰、罗汉、陈景云等华侨青年奉命潜入泰国曼谷，负责情报收集的电讯作业，还有部分学员被派往印度盟军总部工作，配合盟军参与战斗。这些华侨青年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今，当我们回望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依然会为这些爱国华侨青年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他们的事迹，不仅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古训的最好诠释，更是对新时代青年的一种鞭策和激励。他们让我们明白，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身份如何，只要心中有国、有家，就能成为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一分子。

让我们共同铭记这段历史，铭记那些为国家 and 民族英勇献身的华侨青年。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学伟大安澜精神 做爱国担当新人

□ 芜湖市第二中学高中二年级 李子珩 段思宇

在芜湖，有一所学校与戴安澜将军有着不解之缘。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在缅甸壮烈牺牲。戴安澜夫人王荷馨捐出全部抚恤金和戴安澜生前藏书，于1943年在广西创立了安澜职业学校，1947年迁址芜湖，这便是芜湖二中的前身。2021年增挂“安澜中学”校名。学校以“明德、致知、磨砺、许国”为校训，弘扬抗日英雄爱国精神，立德树人，厚植家国情怀。近年来，学校积极发掘校史文化，以“寻访英雄足迹，弘扬安澜精神”为主题，组织学生探访戴安澜纪念馆、戴安澜故居，校庆80周年（2022年）时还排演了话剧《将军赋采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部分话剧参演学生写下了他们的体会以示纪念。

李子珩（戴安澜扮演者）

我是芜湖二中（安澜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我的母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学校，创立于1943年，是为了纪念著名抗日将领戴安澜将军而建的。在校庆80周年（2022年）活动中，我有幸参加了话剧《将军赋采薇》的演出，并在其中扮演主角戴安澜将军。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极为宝贵且难忘的经历，不仅让我对戴安澜将军的生平事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家国情怀、英雄主义以及责任担当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在准备角色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关于戴安澜将军的资料，从他的军事生涯到他的个人品格，都进行了深入了解。戴安澜将军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屡建战功，入缅作战时义无反顾、英

勇坚韧，最后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让我深深震撼。他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爱国精神让我深感敬佩。

戴安澜将军还是一个热爱学习、重视教育的人。即使在行军打仗间隙，他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读书计划，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详细记载。在担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期间，他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英语。他还经常在家信中关心孩子的学习。

话剧演出中，当我在台上怀着悲壮的心情说出戴将军家书中的那句台词“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已孤军奋战，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台下的观众面色庄重。当话剧演到戴将军留之际依然望向祖国的方向时，观众们热泪盈眶。

扮演戴安澜将军，对我而言是一次心灵的洗涤，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责任与担当的重要性，激励我要在学习和生活中勇于承担责任，积极面对挑战。同时，这部话剧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角色的演绎，我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艰辛与不易。戴安澜将军的英勇事迹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的集体英雄主义的写照。这使我对爱国主义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学习戴安澜将军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学习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履行责任、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话剧《将军赋采薇》剧照。

段思宇（王荷馨扮演者）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很荣幸能够参演芜湖二中（安澜中学）校庆 80 周年的话剧《将军赋采薇》，并在剧中扮演戴安澜将军的夫人——王荷馨女士。我的学校就是 1943 年戴安澜将军的夫人王荷馨女士捐出将军的抚恤金建成的。因此，当我得知自己被选中成为王荷馨女士的扮演者时，一股自豪感和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我开始深入了解王荷馨女士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和戴安澜将军的生活经历，发现她是一个既温柔贤惠又坚忍不拔的女子。在他们刚结婚时，王荷馨女士目不识丁，戴安澜将军教她文化、为她取名，通过不断努力，她很快便能给远在战场的丈夫写信，讲述家中发生的事。戴安澜将军在缅北战场牺牲时，他们的长子覆东年仅 14 岁，幼子澄东仅仅 2 岁。王荷馨女士却选择将抚恤金全部捐出，办了安澜学校，自己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尽管如此，王荷馨依然悉心培养自己的四个子女，

并使他们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大儿子戴覆东 1999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二儿子戴靖东成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三儿子戴澄东成为中国水利事业的人才；小女儿长大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后加入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为祖国统一事业作贡献。

我的台词里有这样一句话：“你希望我们有文化、有知识，希望我们能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希望我们的子孙能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时

代！”这是戴安澜将军的愿望，也是王荷馨女士创办安澜学校的初衷，他们都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建设献出绵薄之力，他们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当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从广西迁至芜湖复校时，王荷馨女士在校园里种了两棵刺槐树，表达自己对已故丈夫的思念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期望。如今刺槐树栉风沐雨，安澜学校不断发展，桃李满天下，我想戴安澜夫妇看到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当我把自己带入王荷馨这个角色中，满怀对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期望说出最后一句台词时，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看到有的观众眼含热泪向我微笑，有的同学眼里充满着热切的希望。

这次的话剧演出于我而言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在学习如何演好王荷馨女士的过程中，我对历史增加了了解，对爱国、责任、担当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恰恰是安澜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今后前进努力的方向！

弘扬黄埔精神 推进祖国统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贺信精神

□ 覃珊 鲁延鸣 李立

习近平总书记致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贺信，为做好新时代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秉持初心使命，前赴后继、传承接力，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国家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站在黄埔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新使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的丰富内涵，把握贺信精神实质，可以使我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反“独”促统事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黄埔军校的创建不是偶然

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因种种原因，革命未能完成历史任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为维护民主共和进行不懈斗争，做过许多尝试，也走过不少弯路。

1922 年 6 月，陈炯明部发动的“六一六兵变”，使孙中山遭受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陷入绝望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及时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李大钊、林伯渠等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1922 年 8 月，苏联特使越飞来华，先后与孙中山、廖仲恺举行多次会谈，并进一步商讨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最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通过深刻反思，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

孙中山晚年思想、政治上的转变，同共产党人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是相向而行的。1923

年春，大元帅府重建，中共中央随之从上海迁到广州，于 6 月间召开中共三大，确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1924 年 1 月 20 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宣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并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24 年 1 月 24 日，孙中山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李济深（邓演达代）、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 7 人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申府参加筹备工作。

由于当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的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黄埔军校招生期间，中共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

革命青年报考。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共产党区委，分别遴选和介绍了一批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黄埔军校。据统计，黄埔1期的中共党员有103人，其中学生88人，教职员15人。以后各期师生中，共产党员人数又有增加。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炼，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从黄埔军校筹创背景来看，黄埔军校的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蒋介石曾表示：“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校。”毛泽东指出：“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

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培

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

晚清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较为先进的近代枪炮、舰船被使用于作战中，由此带来了中国军校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开办的军校主要有：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年）、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年）、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85年）、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6年）、山东威海水师学堂（1889年）、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烟台海军学堂（1894年）等，主要培养适应枪炮战和海战的军事人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全国兴起编练新军的热潮，军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竞相开办。著名的有袁世凯主持编练新军的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主办的江南陆军学堂等。各省为培养地方势力，先后建立“武备学堂”或“讲武堂”。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考试，开始重用军事学堂毕业生，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制度的重大转折。1904年，清廷颁布《陆军学堂办法》，各地陆续开办武备学堂。比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1903年）、陆军宪兵学堂（1906年）、北洋陆军讲武堂（1906年）、陆军贵胄

学堂（1906年）、京师陆军小学堂（1906年）、东三省讲武堂（1907年）、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年）等。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了清朝末年的军事教育体系。北洋政府准许各地相继开办军校，1912年，陆军部主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这是北洋政府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军事学校。保定军校在1923年8月第9期学生毕业后宣告停办，此时黄埔军校正在筹办中，距开学相差10个月。至此，中国之前开办的所有军校都称为旧式军校，其办校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或军阀服务。而自黄埔军校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军校，而黄埔军校就成为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

与以往旧式军校相比，黄埔军校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

以革命目标建校。黄埔军校教学大纲规定教育的目标 and 目的是“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了解本党党部组织与对于农工运动之态度”，懂得“只有藉政治工作阐明本党的学说和主义，养成士兵确定的革命观念，方可保证军队统一与为主义奋勇作

战的革命精神”。1926年9月《军人周报》第5期发表军校学生文章《革命军人的精神》写道：“升官发财不是我们的目的，拿薪饷糊口不是我们当兵的原因。我们做革命军人要有五种精神：爱国、爱民、服从党令、为主义而牺牲、服从国家命令而不服从私人命令。有了这五种精神，就算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黄埔师生树立了革命目标，其士气与战斗力是旧式军校所无法比拟的。

以校建军。黄埔军校的创办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是一所为创建真正属于革命党的军队而办的学校。这与旧式军校有本质不同。旧式军校主要由统治阶级或地方军阀创办，是用来维护封建统治和军阀利益的。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第1期开学典礼上说，开办黄埔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设置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教育课程，开创了中国政党办学校、办军校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军事教育史的新篇章。后来以黄埔师生组建国民革命军，成立教导团，并在教导团基础上扩

充为第1军，也就是后来的“党军”，实现了孙中山以校建军、以党领军的蓝图。

重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黄埔军校创建时，孙中山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仿效苏联红军建制，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军校的党代表，任命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为副主任。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设党代表和政治部，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设政治部以主持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是黄埔军校的首创。政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军人正确的政治意识，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黄埔军校对旧式军校的超越。黄埔军校教导团成立后，政治教育从课堂进入军营。通过在军队中设党代表、政治部、党部，构建革命党掌握、引领军队的制度，提升了部队政治素质，提高了军队作战能力。

以政治信仰立校。一支军队只有有了正确的政治信仰，才能攻坚克难，无往不胜。旧军队是建立在雇佣制基础之上的，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为生计才去当兵吃粮，若有目的也是为了升官发财。黄埔军校之前，鲜有军事院校能够对学生

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的授课。而黄埔军校的学生除了有丰富的军事知识、技能之外，还有属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孙中山要求黄埔学生要有革命的志气，树立革命的理想，要“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地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正是这种革命信仰，支撑着他们在北伐、抗战等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创造了一次次胜利。黄埔军校建立在政治信仰之上的军事教育，是对旧军校、旧军队训练思想的重大突破。

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黄埔军校实施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旧式军校仅仅侧重于军事教育，要求学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不问政治为高尚”，把学生培养成机械执行命令的驯服工具。而在黄埔军校，除了重视军事教育外，也重视政治教育，专门设有传播革命思想的政治教育课，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传授革命的基本政治理论，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提高学生反帝反封建的自觉性和斗志。从黄埔军校安排的课程看，

其人才培养模式较旧式军校有很大不同，军校为学生安排了许多政治思想理论的学习，并经常邀请著名的进步人士到校讲演。由此可见，相较于晚清政府组建的“新军”和其他军事学校，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教育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国民革命。这是黄埔军校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开创中国新式军事教育的先河。

以战场为课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黄埔军校创办后，经历过平定商团、第一次东征、回师广州、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教官、学生同上战场，亲历真枪实弹的战争。战场不但让课堂、操场所学得以实际应用，而且让学生学到大量课堂、操场学不到的东西。战场又是黄埔军校的考场，让教官、学生经受了实战锻炼和考验。总之，战场是黄埔军校的一个“特色课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黄埔军校办学的又一特色。

投身工农运动。在革命潮流推动下，黄埔教官、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参加实际工作，投身工农运动，或担任广东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讲习所、省港罢工纠察队、各大学中

学的军事教练，或被派赴全省各地，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军校教官、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不但密切了黄埔军校与社会民众的联系，而且丰富、活跃了军校的教学，为学员培养开拓了新的路径。与此同时，黄埔教官、学生也得到许多机会与场合施展自己的智慧与才能。出自黄埔军校的一些名人、名将，当年都参加过援助省港罢工、支援农民运动的实践。他们在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过程中，迈出自己军旅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积极作用。黄埔军校自创办之日起，即有共产党人到校工作或学习。第1期学生入校前已加入共产党者，共有30多人；中山舰事件时，该校有中共党员500多人；至大革命失败时，在校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共达千人以上，目前能查到姓名者，有780多人。共产党人积极参加黄埔建校、建军，在课堂、操场和战场上，起着先锋、表率作用。上述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和战时政治工作，是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结合中国实际而开拓的崭新领域。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学校增设“政治科”，贯彻“军事与政治打成一

片”“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的方针，致力于培养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干部；同时在讲坛上推出了大量政治、理论课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引领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升黄埔军校的办学水平。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共产党人沉着应对，成立中共黄埔党团，大力加强党内教育，从而稳定、巩固了共产党组织，维护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同学会反“独”促统的积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同学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爱国群众团体，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为扩大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分裂、推进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创会宗旨，发挥黄埔同学群体作用，汇聚力量、搭建平台、

开辟渠道，扩大和深化与岛内黄埔组织以及基层民众的交流交往，广泛宣传中央各项政策和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当“台独”分裂势力散布分裂言论、破坏两岸关系时，黄埔同学勇立潮头、针锋相对，坚定开展反“独”促统斗争，协力推进和维护国家统一。

新时代，新征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两岸关系面临的新挑战，黄埔军校同学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创新工作方式。借助新媒体新渠道扩大宣传覆盖面，加深两岸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交流，积极推动台湾年轻一代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引导广大黄埔同学及其亲属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代黄埔精神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新征程上，黄埔军校同学会要牢记建会宗旨和政治使命，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包括爱国、革命、牺牲、团结、负责、担当、奋

斗、奉献、包容等内容。最早提出黄埔精神的是黄埔政治教官安体诚。1926年，他在《黄埔日刊》撰文《什么是黄埔精神？》，文中首次提出“黄埔精神”这个概念。后来，黄埔军校学生队总队长张治中、黄埔军校代教育长方鼎英等先后阐释过黄埔精神。黄埔军校建校4周年时对黄埔精神的概括，即“牺牲、团结、负责”（为总理而负责、为主义而团结、为革命而牺牲），这里面既蕴含孙中山向往的“天下为公”大境界，也包含东征时形成的“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的“两爱两不”精神，还有北伐中形成的“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台湾至今沿用这一提法；祖国大陆的提法是“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爱国、革命”解决的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牺牲、团结、负责”解决的则是“怎样扛枪、怎样打仗”的问题。前者是灵魂、是方向，后者是方法、是途径。两个层面的内容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共同存在于黄埔精神之中。

黄埔精神的核心内涵是“爱国、革命”。新时代，两岸黄埔人最大的“爱国”，就是勠力同心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革命”，就是革“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命。黄埔师生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年，黄埔师生东征、北伐，实现了广东的统一和全国的统一；如今，两岸没有统一，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痛，要结束这种隔离的民族悲剧，实现国家统一，需要两岸黄埔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黄埔精神作为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如同人类一切优秀精神遗产一样，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要传承弘扬黄埔精神，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排除种种阻力，从对立、隔绝走向交流、交心，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行。今天，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共同传承和弘扬黄埔精神，不仅是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两岸共同价值理念的锤炼和强化，更有助于将两岸的文化认同引向新的境界，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跃升，共同致力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发挥黄埔军校同学会和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特色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新征程上，黄埔军校同学会要发挥特色优势，坚定反“独”促统，为同心共圆中国梦广泛凝心聚力。

黄埔军校同学会作为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桥梁和纽带，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作用，积极践行黄埔军校同学会创会宗旨，守好政治阵地，讲好黄埔故事。要提升黄埔品牌，用好黄埔资源，打造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两岸交流平台和项目，服务两岸黄埔同学及其亲属，深化交流交往，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努力成为广大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知心人、引路人。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强队伍活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工作水平。

“天下黄埔是一家”。黄埔同学及其亲属是沟通两岸的天然桥梁，也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强力黏合剂，在凝聚两岸人心、推进反“独”促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大有作为。

当前，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美国大打“台湾牌”，妄图利用台湾问题遏制、打压中国发展；台湾当局妄图“倚美谋独”“以武拒统”。美台相互勾连，

升高了台海风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他的“520”讲话和“双十”讲话继续贩卖“台独”言论，鼓吹“新两国论”，持续对立对抗。对这种背离岛内主流民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制造台海冲突的顽固“台独”分子，祖国大陆绝不会姑息容忍。海内外黄埔人要向岛内民众宣传“台独”的危害性，让更多台湾同胞明白“台独”是绝路，统一有好处，不管“台独”分子气焰如何嚣张，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不忘先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希望广大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不忘先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新征程上，广大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要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聚焦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历史使命，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要不忘先烈

遗志，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传承黄埔精神，发扬优良传统，坚定反“独”促统，为同心共圆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呼吁台湾岛内黄埔同学及其亲属，把握历史大势，坚持正确史观，认清利与害、辨别真与伪，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申明大义、奉义而行，坚定反“独”促统，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百年奋斗筚路蓝缕，伟大征程任重道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无比光明，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一道，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覃珊为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鲁延鸣为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李立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4年12月—2025年1月

□ 吴亚明

2024年12月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境”美国答记者问

外交部发言人1日就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境”美国答记者问。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中方对美方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部际协调机制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台办、国家发改委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福建省，3日在北京召开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部际协调机制工作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福建省提请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支持的政策（事项），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落实落细。

作家琼瑶去世

知名作家琼瑶4日在台湾新北淡水家中去世，享年86岁。

第二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在深圳开幕

以“青春力量 幸福家园”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暨第五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开幕式5日在深圳举行。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少年3000余人相聚鹏城，叙亲情、话融合、谋发展。

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召开，王沪宁致信祝贺

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9日在厦门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向两岸企业家峰会理事会发贺信，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对年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峰会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问候。

“跟着悟空走晋来”——台青台胞品游山西历史文化瑰宝

10日，“跟着悟空走晋来”台青台胞品游山西文化探访之旅启动仪式暨精品线路产品发布推介会在山西太原举办，来自海峡两岸文化、旅游、教育、网络等领域的100多位嘉宾和300余位高校师生相聚山西，共襄晋台交流融合盛举。

“贪”字当选台湾2024年度代表字

台湾2024代表字票选结果10日公布，“贪”字以8736票高居第一，获选为2024年的年度代表字；“斗”字和“骗”字分列二、三名。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在台北举行

以“智慧治理 永续未来”为主题的“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17日在台北举行。“双城论坛”自2010年开始由上海市与台北市轮流举办，已成为上海与台北两市之间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两市深入探讨和交流城市发展经验，巩固和拓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福建东山关帝金身结束金门巡安

16日下午2时30分，福建漳州东山关帝庙关帝金身搭乘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顺利抵达厦门五通码头，标志着东山关帝金身赴金门巡安活动圆满结束。这是时隔6年，东山关帝金身再赴金门巡安。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台胞权益保障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19日发布4个人民法院台胞权益保障典型案例，更好发挥涉台司法典型案例在指导涉台审判、及时回应台胞企司法关切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人民法院涉台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宋涛会见马英九及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台湾嘉宾代表

18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哈尔滨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及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的部分台湾嘉宾代表，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在黑龙江举办

以“燃情冰雪·携手同行”为主题的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启动仪式19日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仪式后举办了两岸青年短视频大赛优秀作品展播暨颁奖活动。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共约1300人参加活动。

国台办发言人对台湾台中火灾伤亡事故死伤同胞表达哀悼和慰问

19日下午，台中市大肚区全联仓储发生火灾，造成9死8伤。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向不幸遇难的同胞表达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同胞表达诚挚的慰问。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应为两岸旅游恢复常态化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障碍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5日表示，我们乐见包括上

海居民在内的大陆居民早日恢复赴台旅游，将积极研究扩大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民进党当局应为两岸旅游恢复常态化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障碍。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检方起诉求刑

台北地检署26日宣布侦查终结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涉京华城土地违法容积奖励、政治献金公益侵占等案，以“涉嫌违背职务收贿、图利、公益侵占、背信”等4项罪名起诉柯文哲，求处总计28年6个月徒刑。

湘台师生岳麓书院共论“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三届湖南大学与台湾大学“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周”开幕式及师生学术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来自湖南大学和台湾大学的30余名师生进行分组专题讨论，分享对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进学术情谊。

台湾2024年平均气温再创新高

2024年成为台湾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台湾气象部门31日介绍，统计至12月29日止，2024年全台年均气温为24.97摄氏度，超过2020年的24.91摄氏度，再创新高。

2025年1月

宋涛发表新年寄语：同心同向 奋楫笃行

中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在2025年第1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题为《同心同向 奋楫笃行》的新年寄语，向广大台湾同胞致以新年祝福和诚挚问候。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发表新年寄语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2025年第1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题为《赓续使命 扬帆远航》的新年寄语，代表海协会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问候和祝福。

国台办：对台湾各界和民众向定日地震灾区表达关心慰问表示感谢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1月7日上午9时许，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有关方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台湾各界和民众通过多种形式向灾区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2024年台湾地区人口再现负增长，新生儿数量再创新低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displays，2024年年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400220人，较2023年年底减少20222人，再度出现负增长，新生儿数也再创有统计以来新低。

台湾各界集会抗议司法不公，反对民进党“绿色威权”

台湾民众党11日在台北发起大型集会游行，抗议民进党当局“绿色威权”、司法不公。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劳动党、统一联盟党等团体到场支持，呼吁台湾社会反对民进党当局制造“绿色恐怖”、迫害要求和支持两岸和平的民众。

福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实现设区市全覆盖

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消息，2024年福建新获批8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实现全省9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全覆盖。

全国台联第三十一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在北京开营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三十一届台胞青年冬令营14日在北京开营，约300名台青营员参加开幕式及两岸青年联欢晚会，祖国大陆多地分营线上

同步收看。本届台胞青年冬令营以“青春相融 筑梦同行”为主题，在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重庆、甘肃、宁夏、新疆等17个省区市，开展冰雪运动、年俗风情、历史文化等主题特色分营活动。

国台办：2024年同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加强交流交往，取得积极成果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答问表示，2024年，我们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同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代表性人士保持良性互动，巩固增进互信，加强交流交往，取得积极成果。

祖国大陆将于近期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
文化和旅游部17日宣布，将于近期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公告表示，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中，希望两岸旅游业界加强沟通对接，为祖国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游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

台湾旅游业界欢迎大陆方面恢复闽沪居民赴台团队游

文化和旅游部17日宣布将于近期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台湾旅游业界对此热烈欢迎，着手准备迎接闽沪游客，同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积极回应大陆方面的善意，尽早解除不得人心的“禁团令”，让两岸旅游交流尽速恢复正常。

国台办：两岸旅游问题的症结和障碍在民进党当局，不在“小两会”是否沟通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7日答记者问表示，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各项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中。两岸旅游问题的症结和障碍在民进党当局，不在“小两会”是否沟通。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单方面全面禁止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禁止岛内

旅行社经营到大陆团队游业务，也没有通过“小两会”与大陆方面沟通。

郑建邦：民革全党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持续汇聚海内外爱国力量

民革中央17日在北京举行2025年迎春茶话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在讲话中表示，民革全党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持续汇聚海内外爱国力量。

国防部：台湾当归 归来天地宽

17日上午，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赖清德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已经成为破坏台海乃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正告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子，“以武谋独”，不过是螳臂当车，完全是自掘坟墓。搞“台独”绝不会有好下场，解放军打“独”促统绝不会有一丁点手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台湾当归，归来天地宽。

“2025‘年’在一起两岸春联年画漫画展”在台北开展

“2025‘年’在一起两岸春联年画漫画展”18日在台北“江山如此多娇”艺术馆开幕，共展出50位台湾艺术家、10位祖国大陆艺术家的150余幅作品。其中，既有两岸艺术家撰写的春联，也有台湾中华漫画家协会艺术家以生肖“蛇”为主题专门创作的漫画，更有主办方精选的明清时期传统年画。

国台办：对台湾地震灾情深表关切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1月21日台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对地震灾情深表关切，向受灾民众表示

慰问，衷心希望受灾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赴广东、福建看望慰问台商台胞

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赴广东省深圳市、福建省厦门市走访调研台资企业，看望慰问台商台胞。

国台办：台湾居民有选择来大陆定居落户的自由和权利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4日答问表示，台湾居民有选择来大陆定居落户的自由和权利。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台胞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定居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大空间。

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创复航以来单日客流量新高

25日，随着当天最后一班厦金“小三通”客船“新五缘”轮缓缓靠泊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运送旅客6297人次，突破6000人次大关，创下该客运航线自2023年1月复航以来单日旅客人数新高。

外交部：所谓台湾当局人员获美方“高规格礼遇”不过是自娱自乐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说，所谓台湾当局人员“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时获美方‘高规格礼遇’”明显是虚假信息，不过是台湾当局自吹自擂、自娱自乐而已。

两马“小三通”迎来春节客流高峰

一衣带水的两岸、1小时20分钟航程、23海里距离，随着春节到来，“马尾—马祖”航线迎来两岸同胞返乡、探亲、旅游热潮。

战斗机经典战例评析

□ 石稼

现代战争中，先进战斗机无疑是空中作战的先锋力量。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长空博弈中，战斗机要消灭敌人，更要确保自身安全。面对对空武器的快速发展，战斗机的自保手段也在不断升级。对战斗机问世以来经典战例的回顾与点评，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战斗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每一款战斗机都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卓越的战绩，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让历史记住。

问世初期的战斗机战例

随着战斗机的出现，空战日趋频繁和激烈，“王牌飞行员”的称号至此诞生。最著名的当属有“红男爵”之称的德国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他于1918年4月21日在索姆河上空阵亡，年仅25岁。这位传奇人物先后驾驶信天翁 D.III 和福克 Dr.I 等两型战斗机，取得了击落80架敌机的辉煌战绩，是整个一战中最具影响力的空中英雄。由于其驾驶全身涂满



/ 福克 Dr.I 三翼战斗机登上电影荧幕。

火红色的福克 Dr.I 三翼战斗机横扫整个西部战场，使得“红男爵”的绰号在参战双方广为流传。

1917年8月末，第一批两架福克 Dr.I 三翼战斗机送往前线接受实战测试。9月1日，曼弗雷德就亲自驾驶一架福克 Dr.I 三翼战斗机取得该型机的第一个战果。该机凭借灵活的爬升性能和极小的转弯半径，成为空中近距离格斗的霸主，在其短暂的服役期内为德国赢得了明显的空中优势，对协约国空军造成了重创，一度成为协约国飞行员的噩梦。



/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

分析点评：战斗机问世初期，由于技术和装备上的局限



/ 不列颠空战。

性，人的因素占比很大，需要飞行员兼顾搜索目标、操控飞机、瞄准射击、防备偷袭等所有环节，精力分散、犹豫迟疑、忙中出错、甚至视力欠佳等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曼弗雷德同样没有逃脱这个命运，最终在追击一架敌机时因过于专注，而被另一架敌机从后方突袭身亡。

二战中的战斗机战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斗机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空战的作战规模、飞机密度、惨烈程度均是史无前例的。

不列颠空战是1940至1941年德国对英国发动的大规模空战，亦是二战中规模最大、持

续时间最长的空战。战争以德国失败告终，迫使德国不得不放弃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转而开辟东线战场，准备入侵苏联。不列颠空战是历史上首次纯粹的空中战争，双方空军隔着英吉利海峡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战，证明了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战役进程的巨大影响。

这场空战中，双方投入的著名战斗机主要是英国的“飓风”“喷火”战斗机和德国的Bf-109、Bf-110战斗机。双方战斗机主要围绕轰炸机编队展开护航与截击战斗，前期以德国轰炸机群空袭英国本土目标为主，后期英国轰炸机也开始对德国前线机场和后方城市等目标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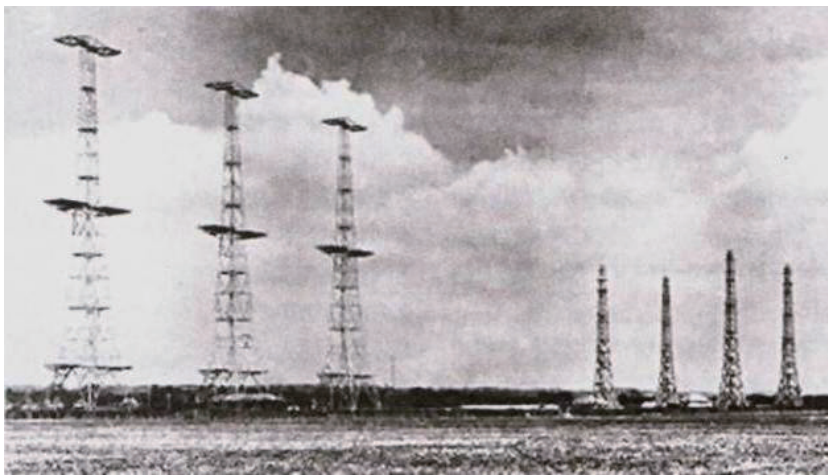
起零星反击。德国空军在进攻期间，平均每日出动飞机1000架次左右，在1940年8月15日甚至出动了2000架次以上飞机参加作战。英国则以逸待劳，通过提升单架战斗机的出动频率进行抵抗。双方500架次以上的大机群空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战斗异常惨烈。

分析点评：空战方式始终是根据双方战斗机性能决定的，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克制敌方特长，才能达到最优的作战效能。需要指出的是，以轰炸机为骨干的大机群对决与战斗机小编队格斗存在明显区别，会极大限制战斗机飞行员的个人作用，以往积累的空中格斗经验也没有太大借鉴意义。

当作战空域内存在极高的飞机密度和火力密度时，空战往往会演变成“绞肉机”一般的空中混战，任何王牌飞行员都随时可能面对突然出现的背后一击而丢掉性命。除了战斗机性能、空战指导思想和飞行员素质等差异因素外，英国首次投入实战的雷达系统也功不可没，基本掌握了德国空军的一举一动，使得德军的任何偷袭和夜袭都变成了泡影。雷达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二战空中力量的对比计算方式，再次证明创新军事技术能够为战争形态带来革命性影响。

朝鲜战争中的战斗机战例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随后，苏联派出一批经历二战洗礼的精锐飞行员，作为志愿军空军主力秘密进驻中国丹东的浪头机场和大东港机场，并建立了地面预警雷达站。苏联空军在参战前，为防止暴露参战事实，制定了一系列保密措施和限制规定。例如，参战飞行员统一穿着志愿军军服，上缴所有带有苏联特征的个人物品，所有参战武器装备全部改涂志愿军空军标识，在作战空域上划定明确的交战界线，



/ 二战时期的英国雷达站。



/ 志愿军的米格-15战斗机。

在作战规模上限定每次派出的战斗机数量必须在60架以内，甚至要求飞行员在作战时的无线电通话中必须使用朝鲜语或汉语。美国为了避免战事扩大，与苏联保持了难得的“默契”，明确规定参战飞行员不得越界攻击中国境内的机场、雷达站等目标，不得越过中朝边境追

击志愿军飞机，不得对外泄露苏军参战的情报，甚至在空战中遇到不利情况可尽快撤至苏联空军交战界线之外。因此，两个超级大国在朝鲜战场上空展开了一场颇为克制的有限较量。1951年9月开始，稚嫩的中国空军米格-15战斗机也加入了这场喷气时代的空中较量，



/ 以色列 F-16 战斗机群。

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崭露头角、成长壮大。

1950 年 11 月 8 日，苏联与美国在中国丹东地区上空爆发首次交战，苏联米格 -15 战斗机击落美军 P-51 战斗机 1 架。随后，苏联米格 -15 战斗机在鸭绿江南岸至黄海入海口附近空域频繁出击，以极小的代价先后击落美国 F-80 战斗机、F-84 战斗机、P-47 战斗机以及 B-29 轰炸机等型号的数十架飞机。苏联空军凭借米格 -15 的先进性能在参战初期获得了碾压性的空中优势，特别是 1951 年 4 月 12 日，美苏两国空军爆发了一次最大规模的空战，美国派出 72 架 B-29 轰炸机和 32 架 F-80 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企图空袭鸭绿江大桥、丰满水电站及周边军事目标。苏

联空军按照出动上限派出了 60 架米格 -15 战斗机前出截击，在持续 40 分钟的战斗中，米格 -15 战斗机以零损失的绝对优势，击落 16 架 B-29 轰炸机和 14 架 F-80 战斗机。苏联空军飞行员将这一天称为“苏联空军最得意之日”，美国空军则将这一天称为“美国空军的黑色星期四”。由于鸭绿江南岸至黄海入海口的这个狭小空域属于苏军战斗机划定的防空作战空域，朝鲜战争中的大多数空战均发生在这个空域，因此该空域被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称为“米格走廊”。

战争中后期，苏联空军采取轮战方式，始终保持 2—3 个歼击航空师和 1—2 个夜航团的参战规模，加之轮战的飞行员作战经验参差不齐，因此，整个

志愿军空军在战斗机数量受限、航程受限、区域受限的情况下，只能用于在“米格走廊”内执行伏击和截击任务，以保卫后方机场、雷达站、指挥所、发电站和运输补给线等地面目标为主，没有余力为志愿军前线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和火力支援，更无法争夺战场上空的制空权。必须指出，志愿军空军凭借大无畏的勇气和坚韧的意志，捍卫了中朝边境的空中安全，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除“米格走廊”之外的整个朝鲜战场上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数量和技术优势，始终掌握着制空权。

分析点评：由于美苏两国在“默契”下制定的一系列交战规则，使得“米格走廊”成为了一个巨型“擂台”，双方飞机在“擂台”之内可以无所顾忌、全力决斗，而在“擂台”之外则相安无事。美军战斗机飞行员在鸭绿江附近空域巡逻时，只能远远看着中国境内机场的志愿军战斗机从容列队起飞、编队集结、爬升高度，然后浩浩荡荡进攻过来。苏军战斗机飞行员也常常眼睁睁看着美国飞机撤出到交战界线之外，得以摆脱被咬尾追击的命运。

朝鲜战争时期的第一代喷

气式战斗机没有安装机载雷达，空战战术的核心思想与二战时期无明显区别，仍是追求高度和速度优势。双方喷气式战斗机的参战，使得朝鲜战场成为世界上第一次喷气式战斗机的对决之地。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已接近音速，在近距离空中格斗中，战况更加瞬息万变，甚至出现了高速撞下敌方战斗机的战例。这种高速格斗模式，对战斗机飞行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对执行战斗纪律的要求更严格，对编队战术的有效性和协同性要求更复杂。由于双方战斗机的空战胜负更多取决于先敌发现能力、编队协同战术和战斗机数量优势，因此空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残酷性却更加突出。

中东战争中的战斗机战例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先后在中东地区进行了五次战争，最著名的一次空战是第五次中东战争中的贝卡谷地空战。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以驻英国大使遇刺为借口，突然入侵黎巴嫩。此后，叙利亚军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特别是部署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叙利亚驻军，更是处于24小时高度戒备状态。6月9日，蓄谋已久的以色列



/ 叙利亚空军米格-23战斗机。

空军对贝卡谷地内的叙利亚萨姆-6防空导弹阵地发起突袭。首先，以军依靠无人机前出侦察，引诱叙利亚防空雷达开机暴露位置并发射防空导弹。然后，以军利用空对地反辐射导弹和短程地对地导弹对叙利亚防空雷达发起毁灭性打击，将叙利亚苦心经营10年，耗资20亿美元打造的19个萨姆-6导弹连全部摧毁。以色列奇袭贝卡谷地后，叙利亚连续多次派出战斗机编队发起反扑，并重新部署了7个萨姆-6导弹连，但均遭到以色列战斗机的毁灭性打击。战至6月13日，以色列空军的进攻编队再次摧毁了叙利亚3个萨姆-9导弹连和6个萨姆-8导弹连，使叙利亚彻底失去战斗意志。

在这场短短几日的空战中，双方投入的著名战斗机主要是

以色列的F-15、F-16战斗机和叙利亚的米格-21、米格-23战斗机。空战中，以色列将F-15战斗机、F-16战斗机、E-2C预警机和波音-707改装的电子战飞机进行混合编队，保持空中巡逻待战状态。当叙利亚战斗机滑跑起飞时，第一时间就会被以色列预警机发现，预警机在稳定跟踪和识别目标后，实时将叙利亚战斗机编队的航迹、类型、数量和运动要素等情报推送给混合编队内其他飞机。当叙利亚战斗机编队进入贝卡谷地作战空域时，以色列电子战飞机开始对其释放定向的强电磁干扰，致使叙方战斗机机载雷达、半自动引导装置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等相继失效或无法正常工作。随后，以色列战斗机在电子战飞机掩护和预警机引导下，从最有利的方向接敌占

位，凭借先进的红外制导格斗导弹，对叙方战斗机展开绞杀。

经过各方档案的比对，战果统计是以色列以 10 架战斗机的代价击落了叙利亚 60 架战斗机。

分析点评：黎巴嫩贝卡谷地的这场空战是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划时代空战，一面倒的战况使世人为之惊叹。西方战斗机的技术优势更加明显，混合编队的强大作战效能得到了实战检验。贝卡谷地空战标志着现代空战进入了高科技时代，制电磁权成为争夺制空权的前提条件之一，多机种编队制胜的空战理念开始得到各国空军的高度重视。这次空战也证明了一个战争真理：现代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款武器装备能够单独决定战争的胜负。

海湾战争中的战斗机战例

1991 年的海湾战争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沙漠风暴”空袭行动。行动中，美国联合 33 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集结了 9 艘航空母舰和 1700 多架各型飞机，凭借巨大的空中优势瞬间击垮号称中东最强的伊拉克军队，令全世界为之震惊。在连续 37 天的空袭



/ 美国海军 F-18 舰载战斗机群。

作战过程中，多国部队共计出动 10 万架次飞机参加对地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套苏制装备的伊拉克陆、海、空三军。整个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以损失 49 架飞机、20 余辆装甲车辆和伤亡 800 余人的极小代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伊拉克军队损失飞机 300 余架、坦克 3700 余辆、装甲车 1400 余辆、大炮 2900 余门、作战舰艇 60 余艘，伤亡 10 万余人，被俘 8 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2000 亿美元。

海湾战争正值苏联国内动荡濒临解体的前夕，名存实亡的苏联已无力为伊拉克提供帮助和支援。美军主导的这场大规模高技术战争以惊人的战损比成为了终结冷战的一记重拳，

对冷战后期的国际秩序、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基本格局。

分析点评：“沙漠风暴”行动再一次证明和发展了杜黑制空权理论，即“制空权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意义，是赢得战争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技术决定战术，美军通过这次空中行动，将高科技武器装备带来的全新使用方式，充分融入空战战术思想和组织实施过程中，将信息优势、电磁优势、精确打击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等作为夺取制空权的关键要素进一步加以突出。伊拉克方面没有意识到，在信息化时代体系作战优势能够带来的“质变”，失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黄埔一期生赵子俊人生标签的五个“第一”

(下)

□ 陈宇

参加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赵子俊入党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在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等人的教育和指导下，他的革命觉悟日益提高。他每天精神饱满，奔走于汉口和武昌各个工厂，了解工人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散发工运宣传品，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赵子俊与郑凯卿以及武昌模范大工厂工人项英、江岸机床车辆修理厂工人林祥谦等，都成为了工人运动的骨干。这时汉口和武昌的大小工厂，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游行时，赵子俊经常手举旗帜走在队伍前面，“劳工神圣”“增加工资，反对压迫”“强权无公理，工人要自由”的口号声响彻武汉三镇大街小巷。

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昌徐家棚机车处1000余名工人举行大罢工，最终迫使政府和铁路当局妥协让步，增加了工人工资。这年秋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12月1日，郑凯卿、赵子俊和武汉



/ 赵子俊。

分部的同志一起，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迫使法国租界当局和车行老板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胜利后，在汉口公安路诞生了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

1922年1月，赵子俊作为湖北工人代表，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由陈独秀亲自提名派遣的37名代表之一。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资

料《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中，有赵子俊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填写的一张调查表，表中记载：“出生年月：1886年3月23日；受过几年教育：三年；职业：运输工人；社会位置：平民；现有什么委任状：陈独秀……”这次国际性的会议代表身份，锚定了赵子俊作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

莫斯科大会结束后，赵子俊回国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昌分部事务员，直接参与领导武汉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赵子俊参与发动并领导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武汉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中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共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怒潮，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决定用武力镇压。2月7日，著名的“二七”惨案发生，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

法律顾问施洋等随后惨遭杀害。军警满城搜捕工运骨干分子，白色恐怖笼罩江城，党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武汉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2月，赵子俊在武昌由廖乾吾、包惠僧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北省筹委会工运委员等职。年底，赵子俊由包惠僧介绍到广州从事军事工作，结识了廖仲恺，有了直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先机。

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

1923年，鉴于以往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孙中山决心创办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军官学校，造就一支服从革命政府领导的军队。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后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国共合作创立革命军校奠定了组织基础。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28日，孙中山指定广州黄埔长洲岛为军校校址；30日，国民党一大闭幕，出席大会的国

共两党成员受托回原籍选拔革命青年到广州报考军校，确保第1期录取的学生为优秀的革命青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国共两党的地方组织开始积极发动、推荐优秀青年报考军校。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创办，先后两次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培养党的武装骨干”。《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称：望各地速速多选学校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国民党左派同学前往广州投考，“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校总理孙中山、校党代表廖仲恺对军校招生一事尤为重视。为了招收优秀青年入学，国共两党领导人都都倾力推荐、介绍身边的优秀青年积极报考。

从黄埔1期学生的入校名单来看，赵子俊可能没有参加统考，是由廖仲恺直接保荐到学生第4队，后再分配到第2队任分队长，因为各队的分队长属于特招，他们都是有过当兵经历的优秀下级军官。

军校筹备委员会在召集教官的同时，就考虑学生队的管

理官佐人员配备，拟特招一批有部队管理经验的下级军官，作为分队长以上基层管理人员。

2月中旬，广州《民国日报》连续几日登载《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布告》，公布了参加复试的50人姓名（陈宇著《中国黄埔军校》，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有任孙中山卫士的侯又生（又名侯爵）等人，但没有赵子俊的名字，说明赵子俊不在军校首批录取的下级军官（分队长）之列。

3月27日，黄埔军校第1期举行入学考试。4月28日，军校录取工作结束，第1期入学考试成绩正式放榜，总共录取470人，其中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5月5日，军校第1期学生入学，所有正取生编为3个学生队。5月7日，第1期备取生进校，编为第4队，与先期入校的第1、第2、第3队合称第1总队，总计学生470人，学习科目单设步兵一科。

第4队学生原为备取生，多来自各方面保送的学生，保送这些学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与孙中山革命主张有联系的部队，如谭延闿、李济深、邓演达、沈应时、陈铭枢、熊克武等，他们向孙中山保荐自己的部属，这部分约有80多人，如

何绍周(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侄儿,后留第4队)、孙常卿(后到第2队)、王文彦(后到第3队)等人。二是因军校复试2月底特招50名下级军官后仍缺少分队长人选,于是又从有关部队中挑选优秀班长以上职务的军人充任,总共实招30多人,后来特招的这批下级军官中有赵子俊(后到第2队)、余海滨(后到第2队)、王慧生(后到第3队)等。(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这些已经明确职务是分队长或副分队长的军校下级军官,同时为第1期学生,因是推荐和择优而来,也就没有参加统考或仅是象征性的面试通过。

赵子俊在入校时亲自填写的《调查表》职别一栏中,写有“本校分队长”的职务,也就表明他的第1期身份不同于一般的学生。因为第1期的各位“分队长”属于军校下级干部,多数是特招保荐而来。40多年前,笔者采访黄埔第1期曾任分队长的侯又生时,他特别强调“分队长”的身份是学员,而非学生,学员的身份就是进校前已经有军人身份和军队职务,再进军校是深造,而非像学生一样是从老百姓转变为军

人。因此,赵子俊显然不是“报考”“考入”黄埔军校,而是如同他在《调查表》中所写,是由廖仲恺保荐入校,也表明他在黄埔第1期中的职位和声望要高于大多数同学。此后黄埔军校的各期分队长一职,多由上期毕业生担任。

第1期学生入校不久,军校给每人发了一张《陆军军官学校详细调查表》,表后特别说明“(一)本表每人填写十张。(二)除成绩、备考二栏外,均需亲笔填写。”赵子俊在调查表“入校介绍人”一栏中填写由“本校党代表廖仲恺”介绍而来,在“受过教育”一栏中填写“受过陆军军事教育”,在“经过履历”一栏填写“赴俄国远东民族工人代表会议,回国在武汉作工人运动”。说明黄埔军校特招他为分队长时,即明确知道他当过兵和“受过陆军军事教育”的经历,他从入校开始就受到军校的重视。

黄埔1期开学时有4个学生队,队(营建制)下设分队(连建制)、区队(班、排建制)。共分10个分队,40个区队(第1、第2队各4个分队16个区队;第3、第4队各1个分队4个区队)。赵子俊分到第2队学习,任第8分队分队长。

陆军军官学校详细调查表	
姓名	趙子俊
年 齡	二十五
籍貫及住址	湖北武昌小東門內
通 信 處	武昌金家巷五十五號
家庭主要職業	無
家庭生活狀況	係工為業
專門技術或特長	無
有無烟酒嗜好	無
有無宗教信仰	無
備 註	入校介紹人 廖仲恺 本校黨代表 入校後在 粵軍中 曾任 粵軍 中 隊 長 人 子 俊 同 事 弟 弟

受過教育	
受過教育	赴俄國遠東民族工人代表會議 武漢作工人運動
經過履歷	
經過履歷	民國十二年一月入校 入校後在 粵軍中 曾任 粵軍 中 隊 長 人 子 俊 同 事 弟 弟
備 註	
備 註	入校介紹人 廖仲恺 本校黨代表 入校後在 粵軍中 曾任 粵軍 中 隊 長 人 子 俊 同 事 弟 弟

/ 军校调查表。

黄埔第1期苏联军事教官亚·伊·切列潘诺夫回忆说:“第一期毕业生中有三十九名共产党员,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学生。”(《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这个39人的数字显然不准确,同时也说明赵子俊等在黄埔军校并没有以中共党员政治面貌公开出现。

赵子俊是黄埔1期学生中进校前已经入党的中共党员之一,也是黄埔第1期中共党员中唯一一位在建党前加入中共早

期小组的党员、唯一参与了中共创建活动的黄埔第1期学生，还是黄埔第1期中参加中共党组织时间最早的学生。

赵子俊在入校后填写的一份调查表中，写下了他入读黄埔军校的志向：“学习军事学，并受革命军纪之训练，将来为党的主义奋斗！”他在军校中刻苦学习，努力训练，时时事事率先垂范，表现出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行、超群能力和先锋模范作用。

赵子俊入黄埔军校时38岁，但是在《陆军军官军校详细调查表》上填写的年龄是35岁，即出生于1889年。来自江苏东台县的丁璈报名时，也没有填写真实年龄38岁，填写的是25岁。赵子俊和丁璈两人都出生于1886年，是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中年龄最大者。由于不知道丁璈的出生月份，也就不知道两人谁年龄更大。但赵子俊出生于3月，大概率比丁璈大。如果此推论成立，赵子俊很可能是黄埔第1期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这应是赵子俊人生标签的第六个“第一”了。

黄埔军校第1期同学分两批毕业，第一批是1924年11月，赵子俊在其列。他毕业后留校，历任入伍生部见习、训育副官、

副连长、连长等职。1925年3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任连长，在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蒋介石在1925年4月23日撰写的《第一期同学录序》中记有：“出征两月……赵子俊、邓文仪诸子，折骨断臂，洞胸穿肠，伤势更剧，几至残废终身。”

两次东征，黄埔军校中的赵子俊等共产党员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久，刚刚伤愈的赵子俊又走上了北伐战场。

牺牲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参加北伐的第1军第1师和第2师骨干力量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这两个师由黄埔军校教导团发展而来，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赵子俊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4团（有说第2师第6团）第6连连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群众支援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进军湖南、湖北。8月下旬，分别向湘赣、粤赣边界进发。9月初，从萍乡、大余、修水等方向入赣作战。这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主力在江西地区对北洋军阀孙传芳部的一场进攻战役。孙传芳从苏、浙、皖三省集中11万兵力于江西，准

备从侧背进攻北伐军。为此，北伐军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

9月3日，北伐军调集约5万兵力，以第3军军长朱培德为总指挥，兵分3路向江西发起进攻。9月6日，江西战役打响。战役开始阶段，北伐军打得比较顺利，何应钦第1军连克赣州、萍乡、宜春、新余、清江、铜鼓，直指南昌。程潜的第6军主力攻克修水、高安，残敌向南昌溃退。程潜见第1军直指南昌，即令第1军第17师追击向南昌退却的敌军，并亲率第19师随后跟进。

这时的蒋介石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头脑，更改了原来的作战方案。他认为可以“一个星期攻下南昌，十日内到达九江，与鄂省联系一片，再会师中州”。加上当时在江西的各部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各军长、师长都想争立头功，速下南昌。程潜第6军及朱培德第3军之一部兵力1万多人，改变原夺取德安截断南浔路的计划，贪功冒进，分两路猛进南昌。第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等此时也是贪功冒进，放弃抢占南昌外围的重要据点牛行车站，率部于9月19日进入南昌。

撤出南昌的敌军虽然失去

了城区，但仍控制着交通枢纽牛行车站（现南昌火车北站），保持着与北线孙传芳主力的联系，而且南昌外围的大部分阵地都在敌手。北伐军除了在南昌城中的第1、第6军主力几个师，其他各部都远在上百里之外，明显成了一支孤军。

孙传芳虽然为南昌失守感到震惊，却也看出了北伐军的破绽，立即调兵遣将超过5万人，还用大炮助战，隔岸轰击南昌城。此时北伐军在南昌的战斗力很弱，难以阻挡敌人的进攻。炮声一响，第1师师长王柏龄竟然带着卫队逃出南昌，城防顿时乱了起来。北伐军的两个师又两个团共1万余人被敌人围困在南昌城内。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由于排挤共产党员而战斗力减弱，致使乐化至牛行车站的铁路被敌军抢占。9月21日，程潜第6军被迫撤出南昌，并命令抢占南昌城郊的交通要道牛行车站，掩护主力撤退。

北伐军在南昌与敌军围绕牛行车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牛行车站背靠赣江，当时是南昌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南昌与外界连接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9月22日，孙传芳命令各部发起总攻。守卫南昌城的北

伐军第6军第19师激战一天一夜，终因寡不敌众，溃不成军。23日夜，军长程潜下令全面放弃南昌，全军向西南方向突围。

敌军攻占南昌城，并追击北伐军。北伐军在牛行车站附近赶建简单的防守阵地，与敌激战三天三夜。这场战斗，双方互有攻退，打得昏天黑地。原黄埔教官、第1师师长王柏龄和黄埔1期同学孙元良等却率部临阵跑路，北伐军由于指挥不力，接连遭到挫败。9月24日，赵子俊在南昌牛行车站战斗中，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在前，英勇牺牲，时年40岁。同日同地牺牲的黄埔1期同队同学，还有第1军教导第1团党代表赵枬（湖南衡山人）。

江西战役打了一个多月，一直持续到11月初。11月2日，北伐军兵分3路同时向南浔铁路孙军各据点发起总攻，控制了南浔路北段和长江水道，孙传芳率残部逃回南京。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孙传芳部1万多人全部被俘。至此，孙传芳集中在江西战场的10余万军队绝大部分被歼灭。

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北伐军取得了江西战场的完全胜利，江西战役遂告结束。北伐军打扫战场，安葬烈士。此时

距离赵子俊烈士牺牲已经过去1个多月。关于赵子俊遗体的收敛安葬情况，没有任何信息记载。所以，《赵氏宗谱》言赵子俊“卒葬未详”。

南昌是赵子俊最后战斗的地方。当年的牛行车站如今已成为凤凰洲市民公园的一处景观，历经岁月侵蚀，仍可见保留至今锈迹斑斑的铁轨。

据1927年底的统计数字，第1至第5期黄埔学生在北伐战争中牺牲1751人，受伤707人。广州黄埔岛校园内的“北伐阵亡将校纪念碑”上留名的仅有350多人，其中就有赵子俊。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三章“先烈荣哀录”中，收录从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姓名，仅有113人，赵子俊的英名也在其中。

赵子俊牺牲后，国民政府给其家属送来荣誉证书，由赵子俊堂弟赵海珊签收并保存。1947年赵氏续修宗谱时，对赵子俊的记载即是按荣誉证书上的内容抄录。

赵子俊不幸英年早逝，但短暂的生命留下了多个“第一”的辉煌，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人运动史、黄埔军校史、北伐战争史等史册。

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选》的黄埔同学高放

□ 蒲元 耿小乔

2023年冬，在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笔者结识了八路军研究会太岳分会的高红光先生。高红光的父亲高放曾就读于黄埔军校11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只要谈起父亲，高红光的眼中便闪烁着奕奕光彩……

求学黄埔

高放，1914年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商人家庭，幼年丧母，幸得祖母照顾，7岁开始上学。然而，九一八的枪炮声把原本平静的生活击得粉碎。日寇铁蹄下，沈阳城再也没有了昔日的美丽模样。这时已17岁的高放不甘在日寇淫威之下生活，便和其他东北流亡学生一道入山海关，到北平继续求学。辗转3年，生活艰辛，学费也逐渐无以为继。

1934年秋，黄埔军校在



/ 青年高放（摄于辽宁沈阳）。



/ 南京时期的黄埔军校校门（本图由抗战史学者陈重阳提供）。

北平布告招生。仅从经济上看，上黄埔军校好处很多，不但不交学费，毕业还分配工作，这对普通贫困学生有很大吸引力。于高放这位失去故乡的东北学子而言，报考黄埔军校可以实现“学习救国、学成抗日”的理想。不久，他成功考取黄埔军校第11期。

此时的黄埔军校位于江苏南京紫金山侧太平门内，隔中山路与明故宫遗址相对，系旧军营改扩建而成，规模宏大。一入军校大门即为黄埔大道，大道左侧为马标营，右侧为炮标营，尽头是办公楼、教室和教官宿舍。办公楼后为硕大的练兵场，练兵场一端是军校礼堂，两侧的六幢二层楼房是学员宿

舍，即高放和同学们的“家”。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早期办学的培训时间很短，教育训练的内容和体量都受到很大限制。迁入南京后，军校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至高放入学时，学制已改为3年。校方重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教育，注意培养基层军事指挥员，学习内容也相对系统化。

据高放的同期同学黎原回忆：“军校训练极为严格，凡入伍生不能完成训练课程者，都要淘汰。训练目的就是严格地按照一名士兵的要求，通过一年的集训，将一个普通老百姓，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士兵。射击、刺杀、投手榴弹、器械体操等

都要掌握，其中最严格的是军姿和射击训练。军姿主要是在操场上练习立正、稍息、正步走……平时的日常起居，也要严格按照士兵的要求。听到命令或号声，必须跑步排队，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完毕。特别是夜间紧急集合，最初没有经验，也不知应该先穿什么，后穿什么，总是手忙脚乱。此外，内务卫生要求也很严，被褥必须叠得有棱有角，上级会随时检查。因此，训练结束后回到房间休息时，大家都是轻易不敢躺在床上。一个房间16个人，大都坐在地板上休息，生怕把被褥坐乱。”

入校的头一年是入伍生学习，通过考核后才能转为正式

学生，领章上才能佩戴学生符号。“转正”前后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教育目标的调整。入伍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将一个地方青年转化为有严格军人意识的士兵，而此后的教育目标，则指向基层军官的培养，毕竟黄埔军校教出来的是初级指挥员，而非普通战士。这一阶段，学生们被分在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讯兵等科，其中步兵科人数最多，高放就被分在步兵科。

步兵科主要开设的课程包括战术、地形、工程、交通、兵器、辎重等，教学内容明显比入伍生阶段增加。这些课程中，既有理论课，也有实践课。例如地形学，考核内容是测绘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形图，要求学生完全独立测绘，等高线都要一一标示清楚。通过这种训练，学生们识图用图能力得到显著提高，这也是初级指挥员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在进行野战演练科目训练时，教员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行进射击，还要学习在敌人炮火下如何跃进和构筑工事等技术，并特别强调掌握对班、排、连分队战斗攻防的指挥，每个学生都要轮流充当指挥员，锻炼指挥能力。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军校图书馆是高放常去的地方之一。高放儒雅内向，平时社会交往也不多，除了上课、训练和一些体育活动外，闲暇时间喜欢读书。他深知，只有好好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将来才能成为救国为民的有用人才。据高放夫人傅力回忆，高放所在的学生总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紧急内迁，他是在江西九江毕业的。这大约是1937年秋冬的事情。

晋中御寇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高放被分配到驻河南信阳的国民党军队某师任见习排长。高放曾说：“见习排长不是正式的职务，主要是看你的工作和成绩而定的，所以说是‘虚职’。”然而就是这个见习排长的“虚职”，却成为他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最高职务。

原来，在高放任职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他所在连队连续出现3名逃兵，上级命他必须抓回逃兵，否则不仅扣除军饷、赔偿三套军装钱，还面临纪律惩处。当时的征兵制度极不完善，不少部队的新兵都靠强征壮丁而来，有的甚至是用绳子捆绑着抓来的，而入营后的后

勤保障及教育训练则严重滞后，新兵们吃住条件都很差，训练脱离战场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几近于无，因此新兵逃跑事件时有发生。苦学3年，尚没有为国效力，就遇到这样的事，再加上一个月以来的所见所闻，高放对这支部队的作风和做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厌恶与不满。于是，在被迫抓捕逃兵之际，他毅然脱离了部队。但中国之大，救国道路又在何方呢？经过一番曲折，最终经人介绍辗转来到山西洪洞的河西区万安镇牺盟会。

牺盟会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山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团体。牺盟会不仅领导山西的各项抗战救亡工作，还参与创建革命武装力量，“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已有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卫旅，共24个团；3个政治保卫旅，共9个团及3个游击支队；3个保安司令部，共6个团……总计山西新军已发展到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余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张雪琴著《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革命武装的快速发展需要

大量优秀军事干部，像高放这样的黄埔毕业生，自然受到欢迎。牺盟会根据高放的经历和专业决定任命他为区决死大队大队长。

走马上任的高放很快发现，决死大队人员缺乏、装备也差。他动员了十几名东北留亡同学会的同学参军，再加上上级补充的人员，以此形成大队的骨干力量，并挑选素质较好、头脑灵活反应敏捷的队员，加强军事技能训练。同时，他报请上级完善编制：大队下设3个中队，每中队又设3个小队，每小队3个班。大队原本只有些老旧的杂牌枪械，弹药也很缺乏，用这样粗劣的武器对付日军是很难取胜的。对此，高放也有办法，他设法借了些钱，购进一批当地产的药材再转手卖出，由于经营有方，不久便挣了一大笔。有了经费后，他想办法从前线撤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手里买了一些枪支弹药，还通过在晋绥军部队任营长的一位黄埔同学，以药品换购了二十几支步枪、两挺机枪和一批子弹。如此一来，大队的实力有了显著提升，面貌焕然一新。

1938年4月，高放从当地商会得到一个约四五十人的日伪运输小队动向的情报。高放经



/ 高放画像（抗战时期）。

过研判，认为日伪运输小队途经之地易于设伏，大队有能力吃掉这股敌军。于是率150多人实施伏击，因设伏隐蔽、出击迅猛，仅用时30多分钟即将敌全歼，并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0多支，子弹上万发。这次胜利令大队官兵士气大增。

不久后，高放根据情报，又率部袭击了一支由前线撤下来的日军部队，战斗打得干脆利落：首先集中轻重火力，将全部弹药倾泻到敌人队伍中，接着在断定敌无增援后果断组织冲锋。此战中，大队攻击神速，火力猛烈，加之地形有利，一举歼灭日军一个炮兵小队约20人，缴获九二步炮3门、迫击炮1门、机枪6挺、步枪数十

支、炮弹约350发、子弹数万发，还有马车6辆。这种战绩，在正面战场大型会战中自然不算突出，但就实力十分有限的敌后武装而言，已是相当难得的战果。特别是缴获的3门步兵炮，对于八路军来说可是十分重要的装备。百团大战时，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参加关家垴攻坚战，主要使用的只有迫击炮。3门步兵炮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高放也戏称这次胜利是“发了洋财”。

至于那6辆日式胶轮大马车，大队行动多在山区，用处不大，而商会运货很是需要，经上级批准，高放将马租给商会使用，商会定时给大队缴租金，由此保障了部队的经费。

高放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事理论素养较好，也善于总结提高。他常说：“打仗打的就是气节，打的就是精神，打的就是武器装备；要在第一时间就集中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打仗神速，打仗要求集中火力歼敌，不能让日伪军有任何反应时间，如果一旦日军反应过来，他们枪一响，我们部队就要死人。”“打日军要集中优势兵力，没有制胜的把握不要轻易对日军作战。”“作为

一名有素质的优秀指挥员，不能盲目地拼杀，在战斗之前，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首先应考虑到的头号问题是部队退路，保住有生力量，否则战斗打响以后，一旦形势不利，撤不下来，首尾不顾，怎么收场？”一年多时间，高放率部参加大小战斗几十次，毙伤日军100多人、伪军数百人，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在三晋大地上，这位来自白山黑水的年轻军人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书写了抗日御侮的华彩篇章。1938年9月30日，高放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上级研究决定送高放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任参谋，后来，一直在第359旅工作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期间，高放先后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并随部一路南下，转战桂、滇一带，屡立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广西地区工作，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编辑文选

1960年3月初，高放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成立于1958年3月15日，叶剑英元帅为第一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调入军事科学院这一年，高放46岁，可以说是人生的最好年华，他精力旺盛，既有较好的军事文化素养，又具备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开展军事理论研究正逢其时。入职后，高放被安排在战争理论研究部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兵法研究工作。中国有着古老璀璨的文明，其中兵学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孙武、吴起、孙臆、司马穰苴等著名兵家，以及《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臆兵法》《司马法》等著名兵书，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高放参与编纂有关历代军事历史和思想的军事教材，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并反复对比、论证，红、蓝铅笔标记的记号在所阅之书随处可见。

“为了帮助全军广大干部真正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学到手，我们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中选出了29篇著作，编成这本《毛泽东军事文选》。全书是按著作发表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这段话出自军事科学院1961年10月刊行的《毛泽东军事文选》的出版说明。这部

文选是中国首次将毛泽东军事著作单独编辑成书，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推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和传播，也为后来《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本）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三卷本）的编辑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意义重大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其主要编辑人员之一就是高放。1960年6月，《毛泽东军事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的编辑出版任务下达至军事科学院后，学院领导与高放谈话，希望他参与此次文选的编辑工作。高放首先表态，作为军人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但考虑到这项工作责任重大，而自己水平有限，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由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同志来完成。最终，这项重任还是落在了高放的肩上。为了更好地完成编辑任务，上级还为他配备了两名年轻军官作为助手。

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到军事科学院接高放前往中南海，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高放。周恩来一见面就说：“你也是黄埔学生，咱们是校友呀。”高放顿时感到十分亲切，也不那么拘谨了。周恩来对文选编辑工作提出了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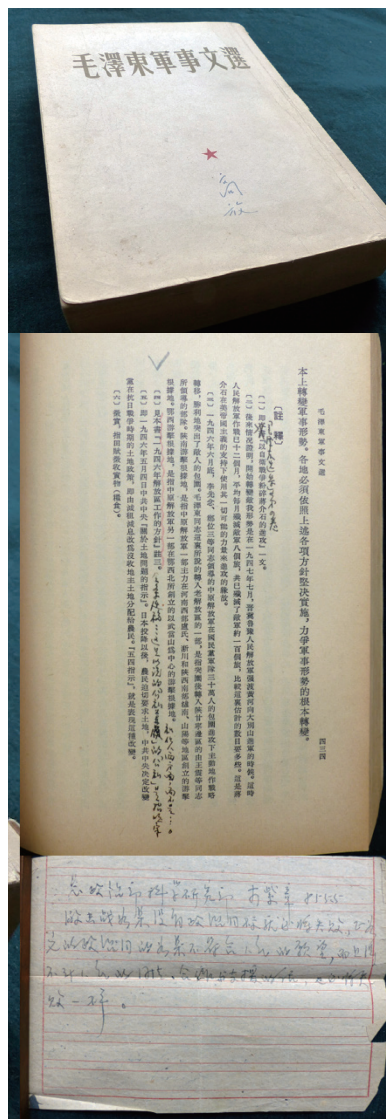
/ 高放之子高宏松保存的《毛泽东军事文选》稿本、定本、样本。

高要求，指出这项任务政治意义深远，务必做好工作，完成好任务。接着问高放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高放表示责任重大，时间紧迫，担心完成不好。周恩来鼓励他大胆细心地干，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

大约过了一周时间，总理办公室又派人来接高放。周恩来向高放宣布了编辑文选期间有关纪律，主要有三条：一、工作中毛主席接见时不能请主席签名、题字，不能提个人要求，不能要求同主席照相；二、工作中的情况严格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三、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有问题困难逐级请示。此次会见，罗瑞卿也参加了。周恩来说完后，罗瑞卿又就工作程序和内容等进行指示，要求文选中每一篇文章编辑完成后，都要经过逐级审批才能定稿；稿件高度保密，不得丢失，不得给无关人

员观看，全部稿件和批语（即领导同志的批示意见）最后全部上交回收。这些要求，高放都严格落实。在他的家里，书房成为了“禁区”，上班后一律锁门，任何人都不能进他的书房。这一阶段，军事科学院给高放发放了大量资料和工具书籍，还为他办好了工作中所需的各种证件，例如中南海通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入证和特别借书证等。

编辑工作中，高放遇到的主要难题是，尽管所选文章都已经编入《毛泽东选集》，但其第一、二、三卷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彼时编辑时间紧迫，各方面条件也不尽完善，故而此次编辑出版，绝非简单地复制粘贴，而是要对所选文章中提及的军史、战史、事件、人物等逐一核实校对，确保无一差错。特别是毛泽东的文章内容深邃、信息量大，涉及古今中外的军



/ 保留着高放编辑时所作标记的《毛泽东军事文选》样本。

事、历史、人物、政治、哲学、地理等方方面面，对这样的文章进行重新编辑，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编好这部文选，高放每天都要翻阅大量书籍史料，用红蓝铅笔做记录，晚上常常在灯下



/ 叶剑英接见高放。

工作到凌晨。在去中央党校、中央档案馆等处查阅资料时，由于没有复印设备，资料不允许拍照，有些重要资料也不能外借，只能手抄，工作相当艰苦。有些问题仅靠查资料难以解决，高放还到北京大学等学校向相关领域专家教授咨询请教。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两次引用了《孙子兵法》的内容，多次引用《左传》和《战国策》的内容，文章还提及楚汉战争、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等众多古代战例。关于这些内容的理解、注释及古代典籍的版本等问题，有些就需要专家的协助。还有一些军事方面的不确定

之处，由于保密的要求，不能对外进行讨论，高放只能在小范围内研究或逐级请示，有时苦思冥想也“不得要领”，以致陷入“僵局”，令他颇为苦恼。

由于工作量大，休息不好，尤其是压力巨大，高放逐渐患上了头痛、失眠的毛病，有时发作疼得厉害，他就吃点止痛药或用热毛巾捂着脑袋休息一会再接着干。一年多的时间，1.76米的高放，体重降到了只有110斤，但他始终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光荣的任务中，无怨无悔。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经中央领导同志审核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正式出版，篇幅由初定的《毛泽东军事著作》里的52篇缩减为29篇。这部书的出版，为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系统学习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1963年起，国家又组织力量将文选翻译成英、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发行。

高放曾经多次自豪地向妻子和孩子讲述请毛主席审阅样本时的情景：“毛主席审阅后十分满意，他把样本送给了我，并说‘样本你留下，做个纪念，将来会有用的’。”时至今日，在高放之子高宏松先生家中，还保存着《毛泽东军事文选》稿本、样本、定本各一册，其中的样本就是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后的那本。

2011年，高放在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老战友，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兵部原副部长、防化学院院长苗汝聘致信高放夫人傅力，文末的一首诗赞扬了高放追求进步、努力奉献的一生：

傅力修书事业光，奔腾笔墨
肆辉煌。

燕京负笈仇敌虏，钟岫磨刀
睨虎狼。

浴血裂肝征战史，涤污雪耻
奠国疆。

更喜归来修军策，傍随先哲
姓字香。

峥嵘岁月里的本色人生

——纪念我的父亲李济

□ 李瑞湘

父亲李济，又名渡平，1900年9月出生于江西萍乡善洲桥李氏旺族。自幼知书达理、志向远大、人品正直。

报考黄埔军校

20世纪初，全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地掀起了反军阀、反压迫的革命风潮，也激发了父亲的爱国情和革命热忱。1924年9月，他在湖南长沙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然而，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湖南军阀何键迫害和追捕革命人士和革命青年学生，父亲只得逃回到江西萍乡，躲在家族祠堂楼上，靠族人救济度日。即便如此，父亲也并未放弃革命理想，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培养国家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正在招收革命热血青年，他下定决心投考。

父亲找本家族的满叔公借了盘缠，便同一个表兄弟一起赶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离开萍乡时，他在善洲桥的河边丢了块石头，并立下誓言：“革命若



/ 李济。

未成功，若不建功立业，永誓不回家乡。”最终，他被录取进入黄埔军校第5期步兵科第1学生队。

黄埔军校第5期设步、炮、工、政治、经理五科，学生从1926年3月起陆续分批入校，分驻沙河燕塘等地。11月，经入伍生升学考试转为正式学生。年底，第5期炮、工、政治3科学员奉命随北伐军北上。炮科和工科的学生组成炮兵团、工兵营和迫击炮营，在湘、赣、鄂等省战斗中立下战功；政治科学生也参加战斗并沿途开展政

治宣传工作。

当时，周恩来还在黄埔军校，父亲对周恩来的人品、学识及其崇高品德十分敬仰。周恩来讲的课父亲很喜欢听。受周恩来影响，父亲在黄埔军校期间学习非常刻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父亲担任连长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战争。

1933年，父亲就任河南省保安第3团团附。当时的河南省主席刘峙对父亲的人品、学识比较欣赏，对他进行重点培养。我的母亲黄曰荃（又名谷香，其父为清代末期水师营将军，西北大学毕业）就是刘峙介绍给父亲的。

拒绝截肢

父亲历任第166师995团上校团长、军事委员会西北游击干训班教育副教官、第31集团军第29军参谋、第91师参谋处长、鲁苏豫皖边区总部少将高参、第19集团军少将参谋长、第51军第113师少将师长。

1938年3月至4月，父亲

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战争中，他的左大腿不幸被日军的炮弹片击中。因前线医疗条件差，被送到南京基督医院治疗。医生建议把他的腿锯掉，父亲坚决不同意：“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你们不能把我变成废人！”当时，宋美龄正好在医院慰问抗战伤员，了解到父亲的情况，她非常感动，马上奖励父亲100块大洋并送了一只勃朗宁手枪作为纪念，同时交待医院“要尽最大努力治疗其伤情，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截肢”。通过手术取出炮弹片后，父亲昏迷了3天3夜才醒来。

他的卫士李春生看到他醒来，泪流满面地说：“团长，你是为抗日而受的伤，是为民族受的伤，是我们军人心中的抗日英雄，更是我崇拜的榜样！”父亲伤势好转后，马上又回到了前线。父亲因此获得云麾勋章。

骨肉分离

1948年，蒋介石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发布一道密令要求父亲把部队和部分国民党财产



/ 1986年，李济与孩子们在香港海洋公园合影。

运到台湾，并清剿在台湾的部分日本人，做好台湾的治安管理工作。之后，父亲去了台湾，我们一家人从此两岸分离。

直到1983年，父亲请朋友从香港寄信回来，我们才又有了联系。通信几年后，1986年9月，父亲从台湾起程到香港同我们兄弟姐妹会面。1987年，父亲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和分别多年的亲人见面，我们兄弟姐妹5人及亲朋好友激动得

泪流满面，当地父老乡亲都来庆祝与父亲离别家乡35年后的重逢。可惜母亲1976年与世长辞，没见到久别的丈夫。父亲也只能在她墓碑前祭奠，哭诉久别分离的相思之苦，并感谢母亲含辛茹苦地把5个儿女抚养成人：“真不可思议，她竟把我五个儿女都保护下来一个都没失去，而都抚养长大并个个受到教育成才，真的无言以谢。”湖南省政协、衡阳市及常宁县政协及常宁县县委书记都出面接待欢迎，并组织父亲一行到南岳衡山参观抗日忠烈祠。

1995年8月26日，父亲在台湾与世长辞，终年95岁。我们兄弟姐妹及子孙等都去台湾送了他老人家最后一程。

抚今追昔，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唯有两岸尚未统一，两岸同胞仍然饱受分离之苦，作为黄埔后代，我们更要珍惜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坚定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无耻图谋，发挥黄埔同学亲属独特优势，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应有的力量！

关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片段回忆

□ 金声

1926年10月，北伐军克复武汉。11月，黄埔军校的一部分——政治大队、炮兵大队等，也随着广州革命政府迁移到武汉，并定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设在武昌张之洞路两湖书院，即今湖北医学院旧址。

全校学生2000余人，包括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入伍生总队、女生大队、还有学兵团。入伍生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及女生队是在克复武汉后招收的新生。这次招考比较严格，没有真正中等学校以上文化程度（指旧制中学、旧制师范）很难被录取，所以学生的文化程度与黄埔前几期的学生一致，甚至还更高一些。凡是没有考上入伍生的青年，编成了学兵团，受军事训练。团址在武昌南门外的南湖营房。该团隶属于分校，是分校的组成部分。

分校校长仍为蒋介石，不过只挂了一个名，实际的校长工作职责由邓演达以代校长名义代理。教育长为张治中，兼任了

学兵团团长。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入伍生总队长为蔡腾蛟。其余各大队长姓名，均难忆及。

所学课程分两大类，一类是军事课程，一类是政治课程。军事课程为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阵中要务令，以及战术、交通、地形、筑城等教程。政治课程有国际政治、各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等等。说到生活，既然是军事学校，当然按军队的纪律办事。每日天刚露白就得起床，接着跑步、早操。盥洗、用膳、就寝等日常生活，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分钟也拖拉不得。譬如用餐，规定是十分钟，听到口令“开动”，大家才能端起碗来吃饭，到了时间，一个口令“起立”，不管你吃饱吃不饱，必须放下饭碗，退出饭厅。饭厅内只听到碗筷声、杯盘声、咀嚼声，很难听到谈话或嬉笑声。又如正在如厕，一听到“上课”或“集合”号音，就得赶紧拉着裤子跑。

我们初进校时，对于这种

紧张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对于剪光头这件事，大家都啧有烦言。原来学校的传统规矩，凡是学生或队上的官佐，都不准蓄发，学生一进校门，首先得把头发剪光。我们这般青年学生，哪有不蓄发的，有的蓄平顶，有的蓄西发，有的梳得油光光的，一剪成光顶，就突然变了个相。你看看我有点忸怩，我看看你有点好笑。

学生的生活待遇非常优裕，棉被、毯子、服装、鞋袜，甚至内衣内裤、洗脸用具，一切都由学校发给。另外每个月还有几元钱的津贴。伙食方面，有时面食，有时米饭，经常吃鱼吃肉，营养相当丰富。尤其是每天早餐，有馒头、稀饭、四盘小菜，还有一盘白糖，比之今天的小灶待遇，毫不逊色。

学校对于“内务”的训练，极为重视。毯子怎样折叠，鞋袜怎样放置，武器怎样陈列，毛巾怎样悬挂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每天非照规定那样做到不可。每到星期天有一次内

务大检查，检查完毕，才准放假外出。如果内务搞得不好，很可能罚没你一个外出假，所以大家对于内务整顿无不兢兢业业，不敢稍存怠忽。“紧急集合”的训练也经常举行，而且多在夜间，正当我们睡得正酣之际，来一个紧急集合号音，于是我们急忙起来，忙着穿衣着袜，携枪带弹，你碰我，我撞你，忙做一团。待到集合后一检查，有的忘记戴帽子，有的没有打绑腿，零零乱乱的情形是很好笑的。不过这是最初演习的情况，锻炼若干次以后，动作就比较沉着，处理也有顺序，那种慌张忙乱就不多见了。

一周总有三四次“野外演习”，地点多在小东门、大东门外，以及洪山附近一带荒山野地。那时，城墙还未拆除，这些地方尽是垒垒荒塚，白骨遍地，婴孩的尸体也常常可见，野狗成群地在那里觅食，真是一片萧索，满目荒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在上述地方创办了学校，兴建了工厂，建筑了大厦，开辟了马路，繁荣兴盛，真令人有隔世之感。

学校的内外卫兵都由学生轮流担任，我们最不愿意担任的是校门的卫兵，因为在校门执勤有风纪卫兵的性质，不仅

要检查进出人员的服装，还要注意礼节，“敬礼”“礼毕”喊个不停，怪麻烦的。同学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共青团员（那时称CY），但人数不多，且不公开，只是在某些行动或言论上可以分辨得出来。例如有一位同学废了姓，只有一个名，叫“纯赤”，这岂不是明显吗？

学校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世界革命伟人非常推崇和尊敬，礼堂、俱乐部、阅览室、图书馆等场所，均悬挂他们的肖像。这在现在看来不足为奇，但在大革命时代，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还未普遍深入，所以从是否悬挂几位伟人像可以窥见其革命的趋向。校内经常唱的除黄埔校歌之外就是《国际歌》。一有集会，大家合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以全校彻底革命的气氛是相当浓厚的，在外界看来，也都认为武汉分校是一座革命的赤色学校。

中国旧军队里本无女性，军队中之有女性恐自北伐军始。就一般学校来说，那时还是采取男女分校的制度。可是武汉分校却有女生大队，这是学校特异之处。她们不仅穿着和男生一模一样，其他起居作息、

出操上课、野外演习，无一不和男生相同。所不同的是女生军帽帽沿下露出一丛短发，还有跑起步来，女生总难免暴露出女儿态来。当时武汉群众，一看到分校的女学生，总是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女兵来了，女兵来了。”女生大队中有几位女同学很有才华，能说能写，干练活跃，校内校外，颇负声誉。记得其中有一位谢冰莹同学，湖南人，是女生中的佼佼者。

一提起代理校长邓演达，没有哪个学生，甚至没有哪个教职员不怕他的。这有几种原因：从他的外表看来，头发蓄得很长，老是蓬松着，是一种所谓西洋人的浪漫派头。他的眉毛、眼睛，生得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一发怒，两只眼睛中就射出迫人的光，令人不敢接近。他处事决断，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留丝毫情面和回旋余地。所以向他请示问题或陈述意见，没有敢多说半句话的。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是一颗螺丝钉，钉在哪里，就在哪里，绝对没有你们的自由。”当时我们对他的这种论调是有抵触的，大家不承认自己是螺丝钉。

平时，邓演达很少和学生见面，除非有大的集会，他才

参加。1927年的五一劳动节，学校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全体师生都参加，还请了俄国顾问、政界要人、党派领袖到校演讲。这一天，他首先讲了话。他讲演时的姿态也与众不同，总是双手捏着拳头，一再地向胸前鼓动，好像音乐指挥棍似的配合着自己激越的声浪，鼓动着，鼓动着。那时，正当初夏，酷日当空，天气已经很热，会场是在校内的大操场，教职员和学生列成队形，围绕着讲台，站立着听讲。这天开会的时间很长，演讲的人一位接着一位，从上午9时起至下午2时还未结束，学生们站立得过久，觉得又累、又热、又饿，有点坚持不下去的样子，队伍行列慢慢地显得不够整齐。这时，站在外围的少数学生，有自动离开队伍躲到墙边柳树底下歇凉的。忽地听到一声枪响，大家惊讶地向枪声响处看去，原来这些自由散漫躲到树荫下歇凉的学生已被邓代校长发觉，他很生气，所以用手枪威胁他们。这部分学生，吓得如同惊弓之鸟，纷纷窜入队伍中。

1926、1927年间，邓演达是南方革命阵营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不仅是武汉分校的代

校长，还兼任着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一会儿飞到广州，一会儿飞到武汉，那时以飞机作交通工具的，除邓演达外实不多见。他的政治观点是，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支持农民运动。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大举清共；7月，武汉政府也接着反共，于是他就离开分校，另组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进行反蒋革命活动，1931年11月被蒋介石杀害，葬于南京中山门外野鸡岗。

学校的日常校务负责人是教育长张治中。教育长之下，设有总队长、大队长、政治总教官、军事总教官，各科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等职。学生们经常接触的是本队队长、区队长，或在本队任课的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接触教育长的机会并不多。张治中有时在总理纪念周跟学生们见见面、讲讲话。他兼任着学兵团团长，在学兵团办公的时间似乎比在分校里多。分校方面，他似乎投入的精力不多。什么原因，学生们并不明白，只知道张教育长是保定军校1期的高材生，是黄埔本校原教育长，是蒋介石的左

右手。

上面提到过，五一劳动节学校举行庆祝大会，请了几位政治人物到校演讲，演讲者中有陈独秀、高语罕等。学生们对于陈独秀大都耳熟能详，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他。当时，一听到邓代校长的介绍，就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谁都知道，陈独秀做过北京大学教授，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在国民革命军未出师北伐前，他和汪精卫发表过联合宣言。学生们认为他既是学术名流，又是政党领袖，心目中不免存着几分偶像崇拜。可是听了他的演讲之后，看法就不同了。陈独秀个头不高，穿一件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柄折扇，讲着、扇着，身子不时转动着，语调有时低得只有他自己听得到。事后，我们大家评论道“百闻不如一见”，陈独秀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物。

在学生中威信较高的，首推政治教官恽代英。恽先生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学生有什么问题和谈时，他总是详尽开导，善言慰勉；学生犯了什么错，他总是好好指正，从无疾言厉色。因此，学生们乐意和他接近，他也很愿意接近学生。在他的房间里经常有男女学生的踪迹。他讲课很受学生欢迎，

因为他的语言清晰利落，立论精辟明确，并且富于修辞功夫，善于旁征博引，滔滔不绝，逐层剖析，条理分明，引人入胜。有时还带些诙谐语调，引得满堂欢笑，能使听者久坐忘倦。我们尤其爱听他的演讲。他的演讲庄重而诙谐，热情而生动，极富鼓动性，内容丰富多彩，波澜壮阔。他演讲时还有独具特色的小动作：讲一会儿，就用右手的两个指头，移动一下眼镜框，调整视线（高度近视）；讲一会儿，又用袖子管横扫一下鼻子。如果讲上两三个钟头，这些动作，不知要重复多少次。

当武汉提出“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时，恽先生曾以此为题对全校师生作过一次演讲。他对蒋介石反革命的本质，从中山舰事件讲起，一桩桩揭露无遗；对蒋介石的卑鄙无耻，阴险毒辣，更说得淋漓痛快，鞭辟入微；而对今后的革命前途，则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自从这次演讲之后，我们就没有见到过他，可能他已离开了学校。

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府，与武汉政府对抗，形成宁汉分裂局面。4月，武汉提出“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

号，同时举兵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同时出兵江西，因为那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态度暧昧，正在宁汉两面摇摆。

5月初，蒋介石指使驻防鄂西的夏斗寅、杨森两部，分由大江南北急速东进，意图侵袭武汉。当时武汉大军北上，兵力空虚，安危极为可虑。武汉一面迅速调集武胜关外北伐军回师应敌，一面将武汉分校全部学生及驻南湖的学兵团编为中央独立师，任命分校代理教育长侯连瀛为师长，入伍生总队长蔡腾蛟为第1团团长，学兵团团长为第2团团长。各大、中、区队长，分别任命为营、连、排长，同时补充弹药，部署迎战。当时武汉政治局势阴霾笼罩，密云不雨，混沌变幻，极难琢磨。分校已禁止学生外出，在校待命。一天傍晚，学校发出紧急集合命令，全部学生全副武装，调离两湖书院至城外卓刀泉、桂子山一带野营，并构筑工事。原来学校侦知唐生智有派兵包围分校解除学生武装的可能，所以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我们野营了两天，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同时叶挺的一个师人马，已由武胜关外开回武汉，情况有所改观，于是重返校内。

5月中旬，夏斗寅部进占蒲圻，万耀煌旅先头部队越过咸宁向武昌进犯。同时，监利、沔阳一带的杨森部队与夏斗寅呼应，也向着武汉方向移动。武汉遂命令叶挺师及中央独立师连夜出发，迎击杨森、夏斗寅。中央独立师之兵力部署，以第1团配属叶挺师沿粤汉线攻击前进，以第2团进驻金口一带布防。

当第一团出发时，已是夜间二时左右，部队通过武昌长街、阅马厂，景象已与平时不同。大小店铺已家家闭户，街上行人绝迹，仅有街灯明灭而已。队伍在小东门站上火车，坐的是低栏敞车，原本用来装载牲畜，这次却用来装载部队了。火车的行驶速度极慢，前进一段，停车一段，好像在等待前方消息，再做决定。叶挺的部队已先于我们出发，我们第一团是其预备队。

我们第1团第1营第3连的同学挤在一个车厢里，几乎连坐一坐的地方都没有。午夜过后，霜寒风冷，令人不时打寒颤，而四野的蛙声、虫声却喧成一片。拂晓，火车到达纸坊附近，已可听到与敌接触的炮声、机枪声。天刚蒙蒙亮，队伍就下火车增援上去。第1营

在铁道线右侧，第2营在铁道线左侧，第3营沿铁道线，各自疏散前进。行进了一段时间，敌人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上飞过，胆小的学生已吓得面色如土。我们散开加入战斗，向敌猛射。此时敌人的主力部队已被叶挺师击退，同我们相持的是敌人的后卫掩护兵力。晌午，敌人开始撤退，我们就跟踪追击，一直追过土地堂、贺胜桥才停止。当晚就在贺胜桥露营。次晨，我们越过贺胜桥向咸宁挺进。随后经过咸宁、汀泗桥、蒲圻，一路都没有遇到敌人。原来夏斗寅想保持实力，已率部向崇阳、通城方向撤退了。我们第1团到蒲圻后休息了几天，并在那里过了端午节。嗣后，渡江至新堤，再由新堤至沔阳县城。而原来在金口布防的中央独立师第2团，也已进占仙桃镇。杨森相当狡猾，一听到夏斗寅部在纸坊、贺胜桥被击败，就撤离了沔阳县境，所以我们始终没有遇到杨森部队。

6月初，中央独立师全部开回武汉。

（此文写于1964年11月）

作者简介：

金声，1904年8月4日出生，浙江嵊县人。

1925年夏至1926年秋，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部助理秘书，参加了北伐战争，随军由粤入闽。

1926年冬至1927年，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平息杨森、夏斗寅叛乱的纸坊战役、贺胜桥战役。

1928年至1929年春，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58团4营6连连副。

1929年夏至1930年，任陆军第11师31旅旅部副官。

1930年夏至1933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编辑局书记官。

1934年春，考入中央军校政治训练班学习，未毕业即调至中央军校张北分校任筹备委员。

1934年至1938年，先后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副官处主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特别总部书记长，期间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进修。高教班第4期毕业后，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军官队队长，并以参谋之职参加了中央军校教



/ 金声。

黄埔军校史发微

□ 曾庆榴

那是珠江中的一座小岛，不足9平方公里。浅山起伏，林木葱笼，浪拍堤岸；还有，炮台，船坞，炊烟袅袅的村落……

岛上早就出现过军校了，

水陆师学堂、鱼雷学堂、陆军小学、海军学校，等等，是近代军事教育的摇篮之一，堪称军校之岛。

孙中山说，这里适合练兵，办军校。

1924年诞生的黄埔军校，即创设于此。

这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海内外热血青年，纷纷“到黄埔去”！大批杰出的军事、政治干部，成长、输出于兹。

（接前页）

导总队在上海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后来的南京保卫战。

1939年至1940年，任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2总队第6大队大队长。

1940年秋至1944年，先后任浙江省余姚县司令部司令，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6支队第1总队总队长，坚持敌后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4年秋至1945年，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东南分部秘书，后调任青年军第1军军部编练科科长。

1945年冬，随黄维由青年军调至南京联勤总司令部任主任秘书。

1946年春，随桂永清调至

海军司令部任副官处处长，后调任办公厅主任、第一署署长。

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工作期间，由宦乡（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介绍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工作，为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做出了贡献。

1949年春，经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杨帆介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司令部，后被粟裕司令员派至刚成立的华东海军，协助张爱萍将军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做出了贡献。1949年6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副处长。9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后调华东海军司令部行政处任副处长。

1952年6月，任海军第三文化速成中学校长。1955年11月，转业到湖北省，先后任湖北省荆州地区水利工程处器材科科长、荆州地区水利局副局长。

曾任民革湖北省沙市市委员会主委，湖北省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声受到冲击，1969年5月14日病逝。

1979年4月，湖北省荆州市地委为金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原华东海军政治部主任康志强中将、原华东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少将、原外交部部长助理宦乡、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总摄影师薛伯青等发来唁电，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为金声题写了墓碑。

一座小岛，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建校至今，已经一百余年了。

国共合作的产物

称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这绝非虚语。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目标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中山说，创办黄埔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认真分析探讨，逐步认识到必须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

是故，创办军校，建立革命军，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共两党的共识。

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创办给予了援助。1923年5月，苏联决定向国民党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国民党创建军校。这年秋，鲍罗廷和首批苏联顾问到达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创工作。军校开学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有20多人，随后，包括加仑在内的数十名顾问，先后到达广州，他们深度介入军校的教



/ 戴季陶。

学、训练，并参与东征、北伐。1924年10月，苏联援助的第一批军械运至广州，其中枪械8000多支，子弹400多万发。1926年5月，又有2万多枪支运至广州；10月，苏联给国民党提供了24架飞机，157门野炮，128门迫击炮，290挺重机枪，73900多支步枪。

显然，假如没有苏联全方位的人、财、物援助，黄埔军校是很难创办起来的。

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第1期招生时，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毛泽东、何叔衡、恽代英等，致力于为黄埔军校引荐考生。毛泽东任职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主持该校在北方地区的招考工作。1925年和1926年，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通告，指示各地为黄埔军校选送考生。

第1期学生入校前已加入共产党的有30多人。中山舰事件时，黄埔军校有共产党员500多人，约占前4期学生总数（4900多人）的10%。当时，广东全省共产党员3700多人，黄埔军校党员约占全省党员13.5%。至大革命失败时，在校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达千人以上，目前能查到姓名者，有780多人（未含武汉等分校）。当时，全国共产党员不足6万人，黄埔军校党员按1000人计，约占全国党员的1.7%。

大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去”，是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践行国共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的举动。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成员近距离接触、密切合作共事之平台。这是国共合作的前沿地带，也是两党合作成效最易彰显于世的地带。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黄埔军校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成功办学之路，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优秀军事、政治干部。

戴季陶缘何辞职

不少历史名人都在黄埔军校留下了足迹。戴季陶就是其中一个。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黄埔军校第1期入学国文试题，据说是他拟定的。军校初创时，他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与黄埔军校缘分并不深。1924年6月16日军校举行开学典礼，6月19日他就辞职而去。如果从正式开学之日算起，他这个主任总共不过当了4天。个中情由，颇值得研究。

有文章说，戴季陶“讲话总是贩卖礼义廉耻、忠义孝节一套。由于学生哄他，不久就下台了”。按此，戴季陶是被学生“哄”走的。

又有文章说，戴季陶“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中山先生甚为不满。蒋介石与戴季陶关系甚密，即劝其辞职离粤去沪”。按此，戴季陶是被蒋介石“劝”走的。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9页）写道：“共产党干部挤戴传贤（戴季陶）去粤。”按此，戴季陶是被共产党“挤”走的。

那么，戴季陶到底是被学生“哄”走，被校长“劝”走，还是被共产党“挤”走的呢？

《黄埔潮》1925年第24期

所登《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任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为争执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张继、谢持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当时，张继、谢持致书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又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是“危害”国民党、有失党德之行为。此即国共关系史上有名的“六一八弹劾案”。张继、谢持告共产党之状，牵扯到戴季陶。戴季陶之辞职离粤，是他自己“愤然”出走的。

《黄埔潮》此文可信吗？有另外的史料佐证吗？让我们读一读《邵元冲日记》吧。邵元冲当时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黄埔军校教官。

邵元冲1924年6月18日日记写道：“十时顷季陶来，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异同，谓其中条件，多无所区别，故不宜有界限存于其间。其说甚辩，谈到十二时半始去。”

邵元冲6月19日日记写道：“七时半至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政府对农民之宣言，又讨论及共产党员之在本党内有党团之活动等举动，由监察委员会

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案，讨论良久，各方间有争论，建议待下次再加讨论，十二时后始散。抵寓已一时顷，知季陶于今日下午猝行，赴港归沪，殊为诧异，弃置一切职务及学校课程而不顾，其神经病之深，殊为可虞。此事实难解决，为之惘惘不已。”

邵元冲的日记说明，戴季陶6月19日下午已出走，其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张继、谢持6月18日“弹劾共产党案”有不同意见的缘故。

包惠僧撰《国民党改组前后》，对张继与戴季陶冲突有十分具体的描述：张骂戴是共产党的走狗，戴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张骂戴，“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起拳头要打戴。戴打张不过，当场大哭，于次日留了一个辞呈，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

黄埔1期生张隐韬（共产党员）的日记，也写到这件事。

其一：“张继、谢持为右派中之反对共产党及国民党之倾向此主义的尤甚者。戴季陶所以不能在广东立脚（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及本校的政治部主任）而去上海，就是这个缘故。虽然本校也去电报请他

回校，他是不肯的。其中有大不得之原因也。……因为他的宣传部的部员多是共产党，故引起右派之反对，而走去上海，先生之心，亦良苦哉。”（7月20日）

其二：“左派的戴季陶先生，前因右派的攻击而去沪，经本校及中央去电复来粤，在前些天来本校，吃了些校长的白眼羹，和学生也未得谈话，就回省城去了。”（8月18日）

包惠僧的文章和邵元冲、张隐韬的日记说明，戴季陶这时与共产党是同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他被张隐韬这些共产党员称为“左派”。戴季陶之黄埔弃职，不是被“哄走”“劝走”，更非被共产党“挤走”，而是因与张继、谢持有思想、政见之冲突，自己“愤然”出走的。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同样是戴季陶，当孙中山逝世后，很快就变声、换调，从“左派”变成了右派了。他抛出“戴季陶主义”，鼓吹要发挥国民党固有的“统一性”“独占性”“支配性”和“排他性”，以“纯洁”三民主义，“净化”国民党。说穿了，就是鼓吹排斥共产党。戴季陶的“主义”，为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武器。



/ 李之龙。



/ 贺衷寒。

至此，戴季陶从国共合作的支持者，变成了极端反对者。

当国民党已走上改组之路时，让戴季陶这样的“理论家”的“主义”主导了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历史悲哀。戴季陶的“主义”只是摧毁了国民党的革新之路，而“净化”不了国民党，其后果是灾难性的。1949年2月，国民党将败出中国大陆，戴季陶自戕于广州，这分明就是一条失败之路。

戴季陶当年之政治转向，牵动了黄埔军校的逆向转变。吾人览史，对此不可不知。

李之龙与贺衷寒

许多读者关注黄埔两“会”之争。两“会”一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即“青军会”；一为

孙文主义学会，简称“孙会”。左翼、右翼，崭然对垒。此乃宏大叙事，当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

然而就事论事，则与李之龙、贺衷寒二人的纠缠不无关联。

李之龙早年就读于烟台海军学校，很早加入共产党，1924年初已是中共汉口地委成员。因为懂外语，他与苏联顾问走得很近。在第1期学生中，李之龙是风头颇劲之人，开学不久，当选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执行委员。当选之后，居然摆出委员的架势，训斥他的同学张隐韬、赵枏（张、赵是共产党员）等，说：“我就有管你们的权力！”对此，张隐韬感到“极愤恨”，在他的日记中

写道，李之龙“乳毛未干，一步登天”，摆出臭架子吓人。可见，李之龙少年气盛，恃才傲物，许多同学都看不惯他的做派，对他啧有烦言。

贺衷寒也是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他早年在武汉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详细调查表”上，贺衷寒写道：“民十（1921年）代表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列席远东民族及少年共产党两会。”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曾任武昌共产党临时支部书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贺衷寒入读黄埔军校后，“希望站到共产党或青年团里”。

1925年1月，“青军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的代表是李之龙、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蒋先云任“青军会”常务委员，贺衷寒任秘书。在“青军会”的期刊《中国军人》创刊号上，贺衷寒还发表了《青年军人与军阀》，署名“衷寒”。

可见，直到第1期毕业、“青军会”成立时，贺衷寒与蒋先云这些共产党员，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他一度是“青军会”秘书，包惠僧说贺衷寒“希望站到共产党或青年团里”，并没有说错。

但是，贺衷寒碰了个钉子。原因是，往年参加远东会议时，

贺衷寒因“不服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的领导，回国后被开除团籍”。这应当是贺衷寒内心拂之不去的一块阴影。他在“详细调查表”填写了代表武汉青年团参加远东会议一事，但未说明回国后已被开除，藏着、掖着，希望蒙混过关。

问题就出在这里。贺衷寒参加远东会议，持的是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驻会总干事董必武签字的介绍信，恰好李之龙早年也是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1922年4月9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函青年团临时中央：“五五广州大会（指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推李之龙出席”（李之龙因故未出席）。故李之龙、贺衷寒二人，同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早就互相认识，彼此知根知底。贺衷寒被开除团籍一事，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李之龙。

包惠僧回忆录写道，贺衷寒“冒充青年团员，而被李之龙揭破”。

贺衷寒向左靠拢的希望，可能就这样破灭了。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布勃诺夫使团）报告广州工作，其中说，（孙文主义学会）“最主要的领导人

同我一起从广州来到这里，现住在北京等护照，要去俄国留学。原来这位同志曾八次提交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八次遭到拒绝”。鲍罗廷所说八次申请加入中共，八次遭拒绝的人，显然是指贺衷寒。

鲍罗廷说：“当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接受他人入党时，老实说，我并没有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这是个错误。如果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会对这个学会产生另一种影响。然而，他却被拒之门外。”

贺衷寒向左走不通，遂退出“青军会”，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充当了“孙会”的一员干将。

贺衷寒因不服从张国焘领导而被开除，其细节已无从考证。看来，“揭破”贺衷寒隐瞒的真相，理在李之龙，然而如何处置，则值得斟酌。1926年4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布自动解散，“通电”谓：“本会同志……简陋、疏忽、粗直”；并指名道姓，直说李之龙“粗浮”。可见，当事者已对此有所反思。“粗浮”者，既“粗”且“浮”，器小识短也，对有过错但仍可以团结、争取的人，不给出路与机会，而将他推向反面，推向反对对自己的一边，这当然是不

智之举。

后续是，中山舰事件前夕，充当了“孙会”头领的贺衷寒被调离广东，赴俄留学。此后，他是一路跟蒋介石走的。而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中遭人诬陷，被蒋介石逮捕。他宣布退出共产党，后又被反动派枪杀。在革命史上，李之龙是个悲剧角色。读史至此，亦令人扼腕而叹矣。



/ 桂永清。



/ 曹渊。

桂永清向曹渊忏悔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两党成员在黄埔军校近距离接触，同室而居，同窗共砚，在同一个操场训练，同一条战壕里作战。当然有意识形态分歧，有思想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但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很特殊，不应泛泛而论，简单划线，笼而统之一刀切。

我们就来读一读蒋先云和蔡光举的故事。

蒋先云是第1期第1队学生，蔡光举是第1期第3队学生。1925年2月，两人一同参加了第一次东征。2月14日，东征军发起淡水攻城之战。战斗中，任第1团第3营党代表的蔡光举中弹，被打穿了肚子。蒋先云在《从前敌归来》中写道：“我奉校长命去扶持他，他只说：‘先

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蔡光举旋牺牲。

蒋先云是毛泽东介绍加入共产党，也是经毛泽东介绍考入黄埔军校，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蔡光举1924年3月1日在上海第三区第四分部加入国民党。

以上，蔡光举在作战中负了重伤，蒋先云奉校长之命去救护他，是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同学不分畛域，在同一条战壕中并肩战斗的真实场景，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文字记载的场景。

曹渊和桂永清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很值得一读。

桂永清是黄埔第1期第2队学生。第一次东征时，桂永清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的连长。在兴宁，他“擅自没收敌人财物，寄归家中”，被校长判定

死刑（《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37页）。因为黄埔同学联名上书中央执行委员会，念其有战功，请从宽处置，免以死罪。桂永清遂被寄押于兴宁县监狱中。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该校军法处处长。周恩来于是致函兴宁县县长罗师扬：“望于其饮食居处较予优待，惟看管则仍须严紧毋懈。”（周恩来致罗师扬函，1925年4月15日）

曹渊，安徽寿县人，第1期第3队学生，共产党员。第一次东征时，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党代表、第8连连长；第二次东征时升任营长；北伐战争时，任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1926年9月5日，曹渊壮烈牺牲于北伐武昌攻城之役。曹渊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

曹渊说：“我是营长，当然我先扒（登）城！”带头攀登城墙，说白了，就是带头去送死。面对这样的危险，曹渊毫不犹豫，结果，曹渊壮烈牺牲于武昌城下。当时，桂永清在汕头，在报上读到曹渊英勇牺牲的消息。大受感动。他说：“这样的营长，这样的士兵，这样的血战，中国历代的战史上，几曾见过这样的死，这样的事？”

1926年9月30日，也就是曹渊牺牲25天后，桂永清在汕头出版的刊物《青白花》上，发表《同学曹渊之死》一文。桂永清写道：“我应该向他（曹渊）忏悔。”

对此，我们应作点解读。曹渊是共产党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桂永清是国民党员，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他们分属于两大截然对垒的政治阵营，思想意识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对此，桂永清虽未明说，但明了于心。他们是同一期的同学，一同参加两次东征，当然有来往，有交集。然而，曹渊事迹感动了他，让他一时抛开了思想分歧与派别之争。在孙文主义学会出版的刊物《青白花》上，桂永清写道：“所以，现在我深悔往日对于曹渊同志不能有真确的认识，而要请他‘在天之灵’容纳我的忏悔！”他并写



/ 安体诚。

道：“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堕地作雷鸣。”

可见，黄埔同学的关系，有其特别之处。他们爱国、革命的初衷是一致的；为了爱国、革命，他们浴血奋战于同一条战壕。血凝之谊，有的时候往往会超越意识形态、政治观点之畛域。孙文主义学会的桂永清，向共产党员曹渊“忏悔”，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数十年之后，在东征中犯过错误的桂永清，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任国民党军队海军总司令，台湾“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参谋总长，一级上将。想当年，犯错误的桂永清被校长定死罪时，他的“同学”联名上书营救他，联名的“同学”之中，很可能就有共产党员。而

被寄押于兴宁监狱时，周恩来又特别关照“于其饮食居处较予优待”（这一点桂永清可能不知道），事过境迁，清夜追怀，桂永清对此作何感想？吾人不得而知。但北伐时他被曹渊的事迹感动过，写文章向曹渊表示“忏悔”，他一定难于忘怀。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说：“多年来，两岸同学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在海峡两岸处于不相往来的年代里，黄埔同学间也一直保持着交往和联系；即使在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黄埔同学关系仍保持相对稳定。这种深厚的人文、历史渊源，对促进两岸之间的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

什么是黄埔情缘？林会长以上一段话，是很好的解读。

安体诚——阐释“黄埔精神”第一人

1926年9月23日，安体诚发表《什么是黄埔精神》一文，文中说，黄埔军校“在中国已形成一种势力，已成为中国革命工作上很有关系的一个组织了。这其中有它的特殊精神存在，这是本校和留意本校的人都能感到而且都承认的了。它的精神，有以名之，名之曰‘黄埔精神’！”

安体诚，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共产党员。目前所知，安体诚这篇刊登于《黄埔日刊》的文章，是“黄埔精神”四字在媒体的首次亮相。

安体诚是首先提出黄埔军校精神是“特殊精神”，并第一次将这种精神命名为“黄埔精神”的人。故“黄埔精神”之发明权，非安体诚莫属。这应无异议。

安体诚此文要点：一、“黄埔精神”是“信仰并真正实行中山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爱国、革命基础之上的精神。二、“黄埔精神”的培育，既受“历史与环境的支配”，又是“各分子人为的努力”的结果。三、弘扬“黄埔精神”，是黄埔军人的“本分和使命”！

安体诚对“黄埔精神”含义及其来由的阐述，极为精当。

“黄埔精神”是与黄埔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即革命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不仅基于历史、社会、政治层面的理解，也基于道德、人格、精神的追求。“黄埔精神”的形成，是黄埔军人的革命人生观经过校园熏陶（政治教育）与战场淬炼后的提升，质言之，是军人血性与尚武精神的提升。有人评论说，淡水之战（1925年2月14日）是“黄埔精神”初露锋芒；棉湖大捷（3月13

日）是“黄埔精神”之异彩绽放；惠州攻城之役（10月14日）是“黄埔精神”的发扬光大。“黄埔精神”一经形成，即成为全校教官、学生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对黄埔军人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对他们的战场表现能够起到支配、规范和激励作用的精神因素。坚守和发扬“黄埔精神”，可转化为物质力量，释放出军事能量。

安体诚此文发表后，10月黄埔军校举行第4期毕业典礼。炮兵大队第2队学生郭俊英代表毕业同学发表演说，呼吁黄埔同学拥护、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拥护农工利益，发扬“黄埔精神”！这位郭俊英，后名郭化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中将军衔。

1927年3月8日，是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周年之纪念日。这一天，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发表《本校开学周年纪念之意义》，提出要发扬“黄埔精神”。熊雄说：“‘黄埔精神’，不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的，并非空洞的东西，乃是全体同志深知时代的需要，明了主义政策，肯为革命而努力牺牲的表现。全体党员同志，务须看清自己的责任，加紧自己的工作，然后才能发扬‘黄埔精神’！”

此后，黄埔军校的道路虽

然出现曲折，但“黄埔精神”并未淡化。至南京办学时，张治中教育长说：“‘黄埔精神’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岁月匆匆，数十年过去了，早年阐释“黄埔精神”的安体诚教官、熊雄主任等，早已不在人世，然而“黄埔精神”这四个字，仍然十分鲜活，使用率十分高。长期以来，不少出自黄埔军校的人物，无论身在祖国大陆，或寓居港台海外，都在讲“黄埔精神”，不断在他们的文章、著述中，写着“黄埔精神”这四个字。海峡两岸传媒，也总是在这四个字上面，做着做不完的文章。这说明，在黄埔建校、建军中铸就的，以爱国爱民、精诚团结、勇敢无畏为主要特征的“黄埔精神”，是黄埔军校宝贵的精神遗产，仍有着当代价值。■

更正说明

本刊2025年第一期第24页左栏第三段“分赠第88师、第87师官兵”更正为“分赠第88师、第87师官兵”；右栏表二中“黄维 第67师副师长”更正为“黄维 第67师师长（接任李树森）”。在此向读者表示歉意！

我珍藏的黄埔军校《野外实施参考》

□ 单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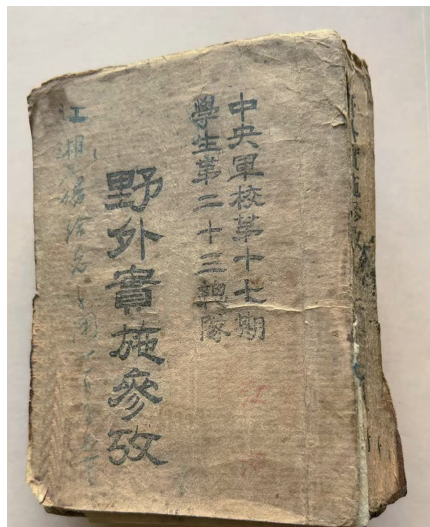
黄埔军校文物是民国历史的见证，它是黄埔校史研究的重要依据，通过对文物的深入研究，查阅相关黄埔史料，可以了解到各个期别总队的概况。在抗战中，分校林立，总队众多，毕业生十万余，各总队存世文物值得考证研究。

笔者收藏一册《野外实施参考》，铅印，64开，574页（可随身携带，俗称口袋书），封面印有竖列隶书：“中央军校第十七期学生第二十三总队。”查黄埔校史得知，该总队为第四

分校番号。封面内侧有毛笔书写：“三十一（1942）年，子仁置于黄埔军校笔记委员会，江湘”字样，并盖江湘名章。江湘，别号子仁，贵州威宁人，黄埔6期生。扉页为总队长陈家炳题词：“是则是做”（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原文为“君子是则是做”），意思是学生出校训练要效法《野外实施参考》，以此指挥战斗，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总队长陈家炳（1902—1980），海南文昌人，黄埔1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



/ 第17期学生第23总队总队长陈家炳。



/ 《野外实施参考》封面。



/ 《野外实施参考》题词。

军排、连、营、团长，高级参谋，副司令，中央军校 12 期学生总队附，13 期、15 期、17 期学生总队总队长等职，官阶少将，1980 年在台湾病故，终年 78 岁。

《野外实施参考》为战斗教练之用，目录内容分各个教练（1—12 课）、班教练（13—18 课）、排教练（19—30 课）、连教练（31—36 课）、营教练（37—39 课）及特种地形之战斗和对降落伞部队之战斗法，等等。每课目又分研究事项、着眼点、说明、实施指导、附记等。详实记录了本总队学生接受操场训练、野外演习之经过。本册还强调军事教育精神与言行，皆以实事求是之“实”字与“是”字为要旨，尤以一切小动作更须求其“实在”而严禁虚伪。日后作为指导者必须置自身于实况，以活泼生动之发问，与严格而实际之态度，为之指导，且将当时自己所发生之感想，以心传心，自能感动兵卒之热诚。

参谋总长何应钦讲话指出：“初级军官负直接教育士兵之责任，并直接指挥士兵实行战斗，又直接支配士兵服行战场上各种勤务，故对初级军官之‘养成教育’；第一、必须具备



/《野外实施参考》目录及内页。

士兵所应具备之战斗技能，以为教育士兵之模范。去冬，校阅军校时，发现学生中，对于据枪、瞄准、击发、刺枪、投手榴弹及目测距离、认识地物、步哨守则等课目，尚有不甚熟习者；此种缺点，亟应改正。第

二、对于小部队之各种战斗动作，及其他一切勤务，必须到实地上反复演练，使其非常纯熟，不宜空谈战略战术或偏重理论。今后对于军校学生教育，似宜采取‘能知道不如能做到’之原则。此外对于经理、卫生，

及如何从下层起，维持军队之健全等等补助课目，亦不能离开此项原则。过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教育学生，每每失于忽略小动作；因军校学生系初中或高中毕业，教育时遂以其程度为对象，以为彼可举一反三，不必详细琐碎，此乃极大错误。盖学校教育，即指示学生以教兵之方法，若忽视小动作，将来学生毕业后，对于脑筋简单之士兵，亦以同样方法教育训练，无怪其无良好成绩。故教育学生，必须将其认作头脑简单之士兵，不厌求详加以指示。又对于教育方法，亦须照本己所编小册所述之步骤切实实施，不可认其为高初中学生而简略之。”

《野外实施参考》虽未印出出版日期，但通过以下三个线索可做出推断。1. 书中有“抗战至今，已历五年”“蓝军步兵第一营有占领狮子山至基长之线”等语。2. 1942年江湘置书于黄埔军校笔记委员会。3. 1940年5月17期23总队成立，1942年10月毕业。据此推断出版时间应为1942年野外演习结束至10月毕业之际，印发毕业生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便于参考运用。

良 牧 李



南湖 九十 綸長

/ 入伍生1团团长李牧良。

军校生活回忆

有关17期23总队的军校学习生活情况，可以从学生的回忆中一窥端倪。

17期23总队学生黄健吾回忆：

我叫黄健吾，字元生，1923年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上黄镇的贫农之家。1936年，我去县城宜兴中学读书，平时住在学校。1937年冬，日军占领宜兴县城。我当时读初二，学校被迫停课，我就回到了家乡。1939年初，由于日军扫荡，我和家人终日东逃西躲，有家难归，心中充满了对日军的仇恨。

当时日军在杨巷有据点，四周村庄的男性青壮力都被拉去参加伪和平军或为日军做苦力，如果不答应或者逃跑就会被杀死。我不愿意屈服于日军，便萌生了参军抗日的想法，母亲最终同意了。1939年端午节前几天，我告别母亲和未婚妻（童养媳），和同学十多人离开家乡投奔抗日队伍。临行时，母亲交给我一个包裹，里面放了些干粮和少许钱，并一再叮嘱我在外注意安全，我一步一回头地和她们道别。抗战期间思乡心切，写信寄往家里，但当时通信极其困难，母亲究竟收到过几封我不知道，只记得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中，母亲十分惊喜。

经过数日步行，我们一行人到达安徽歙县，考入战干3团。同年秋从歙县琳村步行到江西瑞金西岗镇。经考核，我被编入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入伍生第1团第2营第5连第2排受训。三分校主任为吕济中将，副主任是唐冠英中将，入伍生1团团长李牧良，营长徐治寰，连长朱道南，排长张学诚。抗战时期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军校入伍生穿的是粗布军装、草鞋，吃的是杂粮糙米素菜，偶尔能吃上一次荤；晚上点桐油草芯灯看书。

1940年2月，本团奉调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离校时，团长李牧良少将在道口和每位入伍生握手告别，勉励学成杀敌报国。同学们穿着单衣草鞋，肩负十余公斤的枪支、行李，步行二月余，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五省。途中从广东曲江乘火车到湖南衡阳，经过乐昌车站附近时，遭日机轮番轰炸，死伤多人。4月到达独山县基长镇。

当时，日寇南占广州向西侵犯，第4分校奉令刚从广西宜山迁移贵州独山，学校根本没有校舍。于是我们入伍生自己设计建造，挖土整地，伐木运材，用了5个多月在基长镇建成一个总队部、3个大队部和10个中队部。每中队有宿舍、饭厅、炊事房、洗澡间、厕所、操场，以及单杠、双杠、木马等运动器械，总、大、中队部之间道路贯通。军训部长白崇禧陪同苏联军事顾问团参观时，看到同学们朝气蓬勃地在操场训练、野外勤务时，苏联顾问赞叹不已：“中央军校第四分校23总队如此美好的校舍，竟出自千余爱国青年之手，真是奇迹，令人敬佩！苏联红军能攻克世界上任何军事要塞，你们军校学生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



/ 韩汉英。

当时他们还送给四分校俄式机枪等教练器材和大量毛毯。

军校队职官有总队长（团）、大队长（营）、中队长（连）、区队长（排）；各科教官，包括射击、炮兵、战术、筑城教官，还有教日文的教官。因为与日军打仗，所以要学会简单的日语会话，比如你把日军俘虏了，不能跟他对话是不行的。教官有的是黄埔前期学长，战术教官一般都是保定军校出身。

1940年秋，17期23总队举行开学典礼，主任韩汉英中将，总队长陈家炳少将先后讲话，盛赞同学们经得起长途行军、自建校舍等严峻考验，希望我们努力学习，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我编在第3大队第10

中队第3区队第7班任轻机枪手，大队长胡皓魂上校，中队长黄所衡中校，区队长柯桂芳上尉。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我们学校每月会有几元零用钱，每周只有周日休息一天，大家会结伴去镇里逛逛。总理纪念周活动常以班为单位，由班长主持，向总理像鞠躬，背诵总理遗训，有时也根据战场形势谈体会。23总队组织过几次阅兵，由总队长主持，有一次校长蒋介石和白崇禧上将来学校视察时，也举行了阅兵。

1941年夏，黔南地区霍乱流行，不断死人，人心惶惶。同中队同乡同学鲍汉珍、陈荣灿先后染上霍乱，上吐下泻，十分危急。总队医务处缺药治疗。我和同队同乡同学黄骅、丁汉初、强栾生4人，用担架抬着他俩到距驻地40余里的独山县医院抢救，不幸的是他俩中途便停止了呼吸。想想他俩的父母送子参军时的情景，我们感到十分难过。

四分校17期共有第5、第8、第23、第24、第26等5个学生总队，以入伍时间前后，文化程度高低，经考试合格，先后毕业分发。23总队于1942年10月10日毕业。除少数同学留

校外，大部分被分配到全国各大战区。学校发给每位同学毕业证书、军官服装、皮鞋、武装带、佩剑、同学录和旅费各一份。各战区派员来校带领分派到该战区的同学，到了各战区后再分派到前线各军、师。我和10位同学被分派到驻江西省南城地区的陆军第40师。又经考试后，我被分派在师司令部参谋处，其他同学分派到各团任排长。我在军校学习期间，测绘成绩十分优秀，所以到部队后深得长官赏识与信任。有时我随师长陈士章少将、参谋长朱宇平上校到各团视察，行程中绘制“路上测图”，供他们熟悉地形地貌。参谋长还特派我到部队驻地，在营房墙上用当地黄红色泥土写上很多大字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还我河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以鼓舞军民斗志。

17期23总队学生夏恒启回忆：

我1923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一个水手家庭。“七七”事变以后，家乡沦陷，我刚念完初中，生活无着，便到一家广东人开的商铺当学徒。

1939年，沦陷区虽然被日军占领，但当地热血青年颇多，我的中学同学有一位年纪大很有主意，他筹划组织几十个青年偷渡出沦陷区，去上饶参加国民革命军进行抗战。当时我刚16岁，也可以说一腔热血，当即和他们一起冒险泅渡，从芜湖抵达皖南行署驻地屯溪（现黄山市）。一个月后，我考上了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入伍生第1团（团长李牧良，别号长纶，湖南邵阳人，黄埔5期），学生多为苏浙皖三江子弟。随后行军到达江西瑞金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先在会昌接受入伍训练6个月，每人发中正式步枪一支，子弹50发，被、服、用具等全套。其间，举行仪式全体加入国民党，时赣州公署专员蒋经国乘小汽车莅校代表中央党部监誓。1940年2月，本团奉调到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编为第17期第23总队，计学生1275人，驻基长镇。

基长镇位于独山县城东南部，为独山、三都、荔波三县的通衢要道，是一个重要集镇，共有面积172平方公里，驿道通行距县城22公里。本镇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区，四季分明，物产比较丰富，战乱年代是兵家争夺之地。在基长街上有客栈、饭



/ 杨应彬。

馆、商铺、邮局、卫生所，还有中医诊所“鹤龄堂”、独山县立第三小学等。一半人口为少数民族（以布依族、水族和苗族为主）。

当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不在老百姓家住，因为不能扰民，而是住在基长镇的自建营房，大门两边对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路，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星期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我们才到老百姓家里，借点柴火烧水洗澡。平时出操回来，只能洗冷水澡。军校生活虽然很苦，但也要忍受，不能当逃兵。

我们一天两餐都是粗粮，也吃不饱。因为独山是山区，运输不便，供给困难，要步行几十里路去县里背粮食，吃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又要去领。穿的衣服鞋子等用品都是军校发的，一年

一套棉军服，两套外衣、衬衣，冬天有棉大衣。军服衣领两边缀有圆形“军校”“学生”领章。我们穿布鞋、布袜子，布鞋穿不了多久就破了，就自己编草鞋。入伍训练合格后，分科进行军官教育，军衔是上士，学习更加紧张。学习典范令，先由排教练顺序到连、营教练，每日三操三讲，军风军纪更加严格。在教练学习中，命令如山，军纪似铁。总队长陈家炳身影经常出现在操场、讲堂上，监督教官与学生，是否教学合一。也有个别教官，指鹿为马，以白为黑，因而引发同学们不满而罢操罢课，以示抗议。

主任韩汉英中将在我脑海印象最深，他是保定军校6期步科毕业，每次全校举行总理纪念周我们都能见到他。记得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蒋介石莅校训话，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在军校的娱乐活动就是晚上打打篮球和排球。1942年双十节举行毕业典礼后，我被分发驻印第5军22师特务营2连3排任排长。回顾从1939年到1942年三年来的军校生活，令我终生难忘。

17期23总队学生杨应彬

(1921-2015)，广东大埔人，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原名誉会长。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党组织安排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抗战前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奉党组织派遣进第四战区张发奎部从事战地宣传、组织、统战、军事及中共地下工作。1940年5月，经秘书左洪涛（湖南邵东人，中共党员，从事地下工作）的推荐，由长官张发奎保送中央军校第四分校17期23总队学习。潜伏10年间，关键时刻截取了蒋介石给张发奎的密令，通过组织电告周恩来、叶剑英，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件”的阴谋，挽救了抗日东江纵队千余名骨干精英，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粤桂边纵队参谋长。以下是杨应彬的回忆：

正值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三密”政策，即“密捕、密审、密决（暗杀）”。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政训处有个秘密的军统特务组，负责监督主任韩汉英言行，及对校内共产党行使“三密”特权，并重

印《剿匪手本》为上方宝剑。

当时我在四分校17期23总队第3大队第10队，奉党的指示，专心学习军事，不宜其他。大队长胡皓魂（白云），湖北人，黄埔军校5期。虽然他是上校，但有点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我因外面同志来信说了“犯忌”的话，受到怀疑。第一位找我谈话的人便是他，态度还好，20多天中，找我谈了六七次，从未申斥呵责。最后因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来信营救，才没出问题。我毕业离校时，他对我说：“你跟向公（即张发奎），也好。”还送我一幅他写的文天祥《正气歌》的书法（他的魏碑隶书很有功底），以后没有通信。解放后，我10队同学高乃安（西樵人，罗卓英主政广东时，曾任罗的随从副官，我那时在行营，偶有见面）告我，上海解放前夕，胡皓魂任上海团管区（是个征兵机构）司令，仍是上校。高告诉他“杨应彬过去了”（意指离张投共了）。胡沉思后说“他也许是正确的”。以后也不知他之所终。我在上世纪80年代，在广东见到了第10队副队长湛业亿（增城新塘人），我曾推荐他任增城县政协委员。有一次我问湛，我在军校发生“来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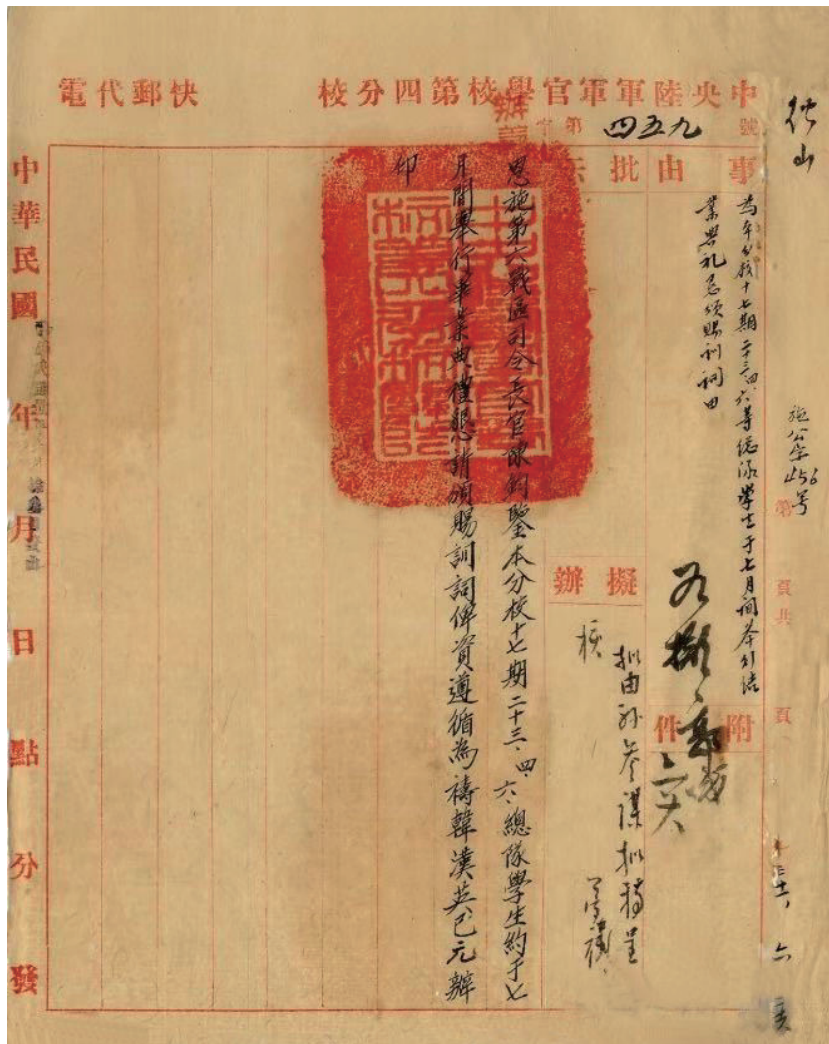
他知不知道？（当时我的问题只在大队、总队处理，队内不公开）他说“知道，问题得解决，很大原因是大队长爱才”。看来胡皓魂还是有“政治良心”的好人。

毕业题词与训词

黄埔军校每值学生毕业之际，盛行援前期循例印制同学录，除官长学生个人照片外，还要请校长蒋介石及党政要人题词，而且要在付梓之前快邮代电办妥，通常提前时间半年左右。快邮代电（简称“代电”）是一种旧时的公文形式，其内容力求简要如电报文稿，通过快邮寄递，主要用于军事及特别重要的公文传递。

四分校 17 期同学录筹委会为及早得到校长题词，请主任韩汉英于 1942 年 1 月 5 日呈文代电：“为第十七期廿三、四、六总队及炮兵第二队学生毕业请致词。”很快于 9 日受文代电：“分校第十七期廿三、四、六总队等学生毕业奉题颁：‘共作干城’四字请查收。”同时，还收到国民政府侍从室二处密函：“奉题‘共作干城’四字，嗣后有此类似事件由文官处仿此办理。”

1942 年 6 月 13 日，中央陆



/ 韩汉英恳请颁赐训词电文。

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快邮代电：“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钧鉴，本分校十七期二十三、四、六总队学生约于七月间举行毕业典礼，恳请颁赐训词，俾资遵循为祷！韩汉英，已（6 月）元（13 日），办印。”

7 月 7 日受文代电：独山中

央军校第四分校韩主任，已元代电敬悉；并转本校 17 期第 23、24、26 各总队同学均鉴。

陈诚训词：

今日为诸同学毕业之期，诚因前方军政羁身，不克参与盛典，特电颁训词如下：委座在

七七事变时，即曾昭示我们：“今天的战争不是一国与一国的战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从这个训示中，我们知道中国对倭抗战，不是平常的战争，而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对于这革命的战争，我们一定要用革命的战术，才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所谓革命的战术，并不是军事学上的一个固定名词。委座曾说过：“我们要拿一分力量，来抵抗敌人十分力量。我们要拿自己的人力，来抵抗敌人的机器。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准备，和这样的一种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革命的最高原则。诚以前曾经说过：“革命的战术，是被压迫的民族发明的，是劣势装备的国家创造的。”这种战术，并不是从书本上可以抄袭，或从那一国可以学到，而是要从我们血肉的经验中去体会得来的。战术的通用原则，乃在于以我之所长，攻敌之所短。同时，要能变我之所短，为我之所长。化敌之所长，为敌之所短。这样巧妙的运用，才能以拙制巧，持弱为强，争取胜利。我们根据过去五年抗战的经验，知道敌人的长处是精良的武器，和完整的装备，所以机动性大，攻击力强；而我们的长处，则在地广人多，根据上

述战术运用的原则，我们应该利用广土众民，以击溃敌人优势的兵力。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委座曾经说过：“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拿了一件武器，就是我们打击敌人的东西。”现在我们最多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人都有，人人都会使用的锄头。诚以前在武汉会战前曾提出一个口号：“用我们的锄头，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所谓革命战术的最高原则，就是根据这个口号，用我们的锄头，化敌之所长为其所短，使其一切优势的装备，都不能发挥它的威力。敌人的惯用战法就是占点成线，连线成面，利用其内线作战的优点，交通、通讯的便利，以少投兵力控制广大地区，这就是敌能忽其短而用其强的战法。我们的对策，就诚个人研究的结果，除实行委座所训示的革命战术外，再无其他种更好的方法，换句话说，除了用我们的锄头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阻塞敌人的行动，使它的大炮、战车、骑兵等都无法运用，而不能发挥其威力外，再也不易想出第二种办法；同时，我们要知道，这种阻塞战，并不是消极的防守，并且是积极向敌进攻，而分解敌人的唯一战法，此法实施后，必能断其线，破其面，而困其点，

使敌不能互相呼应，彼此支援，结果敌人若不逃去，必遭我活捉。此种革命的阻塞战术，无论是攻击或防御，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带，都可以应用的，但此种战术的成功，决非军队单独的力量所能胜任的，必须军民切实的合作。要达此目的，故军队方面首须做到不扰民、不干政的两件大事。诸同学均为国军之基本干部，关于这两点尤须特别注意。阻塞战是一种最新的革命战术，今后欲驱逐敌人，制胜敌人，一定要全国军民认真的去实施，严格的去执行，希望诸同学多加研究，共同的来完成这种伟大的工作，诚愿与诸同学共勉之！

参考资料

- 1.《黄埔军校分校史料汇编》，《黄埔》杂志社编印，2017年。
- 2.《家国记忆——百名抗战老兵口述史》，无锡市档案史志馆编著，2020年12月。
- 3.《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2019年。
- 4.《大埔文史 第二十三辑名人专辑》，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5年。
- 5.《军事教育会议记录》，军事委员会军训部，1941年7月。

“换上了戎装”

——黄埔诗人臧克家的抗战诗

□ 方西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
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
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臧克家《有的人》

笔者从未与臧克家前辈谋面。回想当年，笔者是爱好诗歌的文学青年，认识诗人臧克家，就是从这首诗开始的。那时，我被这诗句震撼——“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明白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为人民做有益的事，这样的人虽死犹生。

记得在中学时代，我对自己的前途有无限憧憬，为了不沦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的行尸走肉，就要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就要百折不挠、不畏艰难险阻……我也曾被俄国著名诗人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所倾倒。当年，我并不了解高尔基写诗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 臧克家。

然而，诗的激情点燃了我的青春活力：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作为黄埔二代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一员时，接触了多位抗战将领的

后人，在对黄埔军校历史进行的探索中，惊见诗人臧克家是黄埔6期生。

1923年，18岁的臧克家来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这是一所开明学校，也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传播的阵地。校长王祝晨先生思想进步，常延请名人到校演讲，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和心胸，杜威、周作人、杨晦等人都曾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演讲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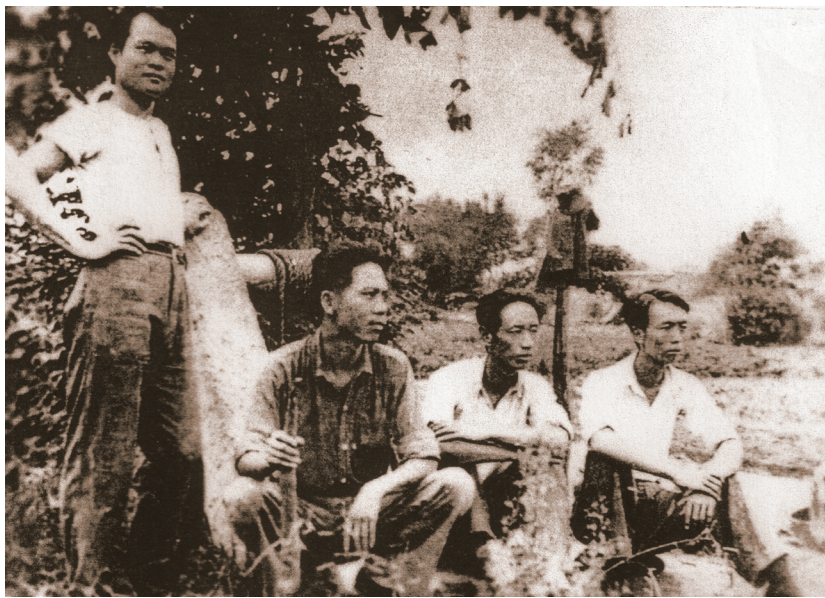
在学校里，臧克家如饥似渴地读书。他的国文成绩尤其突出，在全班数一数二，他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一次，他向《语丝》投稿，周作人复了信并发表了他的稿件，这是臧克家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接着，他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三篇稿子，又被采用。从此，臧克家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武汉立即成为新的革命中心，吸引着各地追求民主、自由、进步、革命的学生。同时，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备成立。臧克家和同学结伴到武汉，报考军校。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接受了军校先进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随中央独立师参加了讨伐杨森、夏斗寅的战斗。

臧克家从“换上了戎装”开始，就从一名学生、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爱国、革命的战士。

离开军校后，臧克家一度考入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9月开学），师从著名诗人、该校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在闻一多的悉心教导下，臧克家迅速成为国立青岛大学国文系出类拔萃的学生。为了鼓励臧克家多写诗，闻一多还将臧克家的《洋车夫》《失眠》《难民》等诗作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给了臧克家很大的鼓舞。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诗集《烙印》，但因名不见经传，各大书店都不愿拿钱出版。闻一多得知后，不仅慷慨资助20块大洋，还亲自写了序言予以推荐。《烙印》出版后，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茅盾、老舍、王统照、朱自清等纷纷为《烙印》撰文评赞。由于臧克家的作品关注乡村和农民的生活，因此被誉为“1933年文坛上最优秀的农民诗人”。



/ 1940年5月，臧克家（左三）与姚雪垠（左二）、碧野（左一）、田涛（左四）摄于老河口。

臧克家对恩师闻一多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写下《擂鼓的诗人》《我的先生闻一多》《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等诗文，表达自己深深的敬仰和感激之情。即使到望百高龄时，他仍念念不忘闻一多，说：“没有闻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拉开了徐州会战的帷幕。33岁的臧克家，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抗日战场。在《换上了戎装》一诗中，他热忱地袒露了心迹：

脱掉长衫，
换上了戎装，

我的生命，
另变了一个模样。

穿上同样的戎装，
手握一支枪，
在“一九二七”的大潮中，
做过猛烈的激荡。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被握在平凡的掌心，
生活的钝刀
锯断了我十个年头的青春。

鱼龙困在涸辙中，
你可以想，
他是怎样渴望
壮阔的涛浪
把它带到
浩瀚的大洋！

我不能再不动，
四面一片时代的呼声！
敌人的炮火
粉碎了我们的河山，
也粉碎了我们身上的铐镣，
叫起了我们那四万万五千万。

我没有拜伦的彩笔，
我没有裴多菲的喉咙，
为了民族解放的战争，
我却有着同样的热情。

我甘心掷上这条身子，
掷上一切，
去赢最后胜利的
那一份光荣。

这首诗看似平淡，其中蕴藏的激情却如惊涛拍岸。当“敌人的炮火，粉碎了我们的河山……”，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爱国民众“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万众一心保卫家园。此时此刻的臧克家“换上了戎装”，“甘心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行胜于言，他，就是在国难当头时，知识分子的表率。“换上了戎装”就是“战士”！

在《我们要抗战》一诗中，臧克家高声呐喊：

诗人们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臧克家不仅是诗人，他还深入战地采访，进行纪实文学创作。1938年，中国的津浦北线正展开空前的血战。臧克家不顾生命安危，冒着敌机轰炸，三进台儿庄战场，报道中国军人在台儿庄用血肉之躯与侵略者搏杀的实况，留下了长篇战地纪实报道《津浦北线血战记》，记录了中国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幕。

臧克家在《津浦北线血战记》的最后，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红血洗过的战场

台儿庄，
红血洗过的战场，
一万条健儿
在这里作了国殇。

他们的尸身
是金石的标符：
台儿庄，
是中华民族的土地！

在这里，
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
用血写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
事实泄尽了敌人的底，
在这里，
我们杀退寇兵，
在残破的北城头插上了国旗！

祝捷的欢呼
使全国疯狂，
胜利的荣光
一万丈长！
运河载起国魂远走，
直到它驻足以北的地方。

台儿庄一片灰烬，
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争长，
东风吹罢，
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

臧克家在抗战诗集《从军行》自序中写道：

我这样愿望着：把自己的身子永远放在前方，叫眼睛，叫这颗心，被一些真切的血肉的真实，牵动着。

他用他的“眼睛”“这颗心”，记下了中国军民为民族独立而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壮烈画卷。

若问古今兴废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办学地洛阳

□ 刘伯欣 刘增强

洛阳，是河南省辖地级市，居天下之中、河洛之间，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夏商周之前，灿若星辰的古文明散落华夏大地，因洛阳得天时地利，这些文明便逐渐向河洛地区汇集，故有司马迁“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夏至五代间1800余年，共有105位帝王在

此指点江山，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大多在河洛地区上演。若算上古代神话传说，三皇五帝遗事多与河洛有关，洛阳的历史将更加久远，故而洛阳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成为华夏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文化遗存最多的古老都城。“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是司

马光对洛阳的高度赞誉，“只看”二字份量千钧！

宋元以降，政治中心他移，洛阳看似退居大剧幕后，但依旧演绎着动人的篇章。尤其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洛，定洛阳为行都，黄埔军校也随之在洛阳建校，在历史的长河中，沉寂已久的洛阳又引起世



人瞩目。

气壮山河之黄埔篇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1928年，黄埔军校本校迁至南京，蒋介石为加强中央集权，把握军权，于1932年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收、调训中央军下级军官1000多人，取得良好效果。第1期军官训练班成功举办后，蒋介石决定扩大招生规模，由于南京校舍难以容纳，在河南洛阳创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1932年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定洛阳为战时首都——行都。1932年10月，蒋介石和教育长张治中委派少将高级教官章履和率众到洛阳筹建分校。1933年8月18日，洛阳分校正式开办，主要是施行本校学员的“转地”教育，即专为调训国民党军队中行伍军官而设。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紧逼中原，洛阳分校迁至陕西汉中，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

军官训练班入学考试是非常严格的。部队保送名单需注明军职，详细表一份、自传一份、四寸免冠照片两张。体格检查包括色盲、痔疮、关节障



/ 洛阳分校。



/ 洛阳分校旧址现状。

碍、体重、身高等项目，检查十分严格。学科考试试题为典范令，涉及范围很广；术科考试是士兵指挥，包括班排的编组、队形变换、方向变换、口令词以及指挥者的位置、仪态等，笔试之前还要进行口试。总之，从体格检查到术科考试，层层筛选，一丝不苟，甚至每场考试还要查验照片，以防代考。

洛阳分校发榜别出心裁，考上的考生名字不上榜，落选的

却榜上有名，榜上一旦有名，那就是落榜生，所以考生在看榜时都捏着一把汗，唯恐榜上有名。曾经有一个由天津某部队举荐来的副营长没考上，他的太太埋怨了几句，他一气之下掏出手枪自杀了。由此可见，参加黄埔军校考试之难和录取之严超乎想象，并无传闻所言“只要推荐就能上黄埔”的现象。

洛阳分校作为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是从全国105个师级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第3期暨军士教导总队第1期开学典礼合影。

／ 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第3期暨军士教导总队第1期开学典礼合影。

单位招生而来的。军官训练班第1期在南京本校受训，故洛阳分校从第2期开始，先后办了4期，即第2期至第5期（1933年8月—1937年11月），共培训学员9000余人。从学员分布统计表来看，囊括了全军各师、各省保安处、军委会、军政部、侍从室等各军政部门。

洛阳分校校址是原来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营房，曾驻扎过3个步兵团和一个师部，因居洛阳老城以西，故被称为“西工兵营”。房屋均为古式建筑，飞檐拱廊，红柱朱门，青砖瓦顶。在此基础上扩建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均按照南京本校进行建设，其教育设备和生活用具也均仿照南京本校予以配置。经过一番改造修葺和建设，历时余年，将此处改建成了一座环境优美、能容纳数千名学生的大校舍。抗战时期，分校召开

的全国抗战最高军事将领会议人员均下榻于校务委员会大院。宽敞美观的四维堂内有会议大厅、宴会大厅、影剧大厅。1937年8月2日至8日，蒋介石在会议大厅礼堂主持召开全国抗战最高军事会议，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次重要大会，朱德总司令从延安飞到洛阳参加，意义非凡。

洛阳分校培养出的黄埔将士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共产党员毕业于此，如中共冀东八路军14总队总队长高桥是洛阳分校第4期学员，曾任冀中13团1营营长、11团参谋长，1943年与日寇作战，为开辟承平宁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1944年牺牲。洛阳分校还有许多学员在抗战中冲锋陷阵、英勇牺牲，如上海淞沪会战牺牲的钟铭、晏国级等。他们气壮山河的壮举将

永载史册！

岁月流逝，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的史实已鲜有人提及，分校遗址也逐渐不为人知。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备洛阳分校遗址修建相关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又一个继承黄埔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厚重历史之旅游篇

洛阳旅游资源丰富，原因有二：一是洛阳乃十三朝古都，历史厚重，文物遗存众多；二是洛阳地理位置优越，山河拱卫，自然环境奇绝。洛阳拥有五大遗址、5家5A景区、30多家4A景区，在全国极为罕见。旅游人数以每年15%递增，旅游业已成为洛阳的支柱产业。



/ 洛阳夜景。

洛阳大遗址保护区有5个，分别是偃师商城遗址、二里头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这些遗址沿洛河由东向西密集分布，是洛阳独有的城市标签，在全国独一无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其中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市偃师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至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它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

里头文化堪称“最早的中国”。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等，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已建成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游客了解远古中国的好去处。

隋唐洛阳城遗址是隋唐两代的都城遗址，位于洛阳市区洛河两岸。遗址东北至白马寺镇唐寺门，东南至李楼乡城角村，西北至邙山镇苗湾，西南至王城大道与古城路交叉口，面积约47平方公里，已有1400多年历史。遗址由宫城、皇城、里坊区和郭城组成，将宫城的应天门、皇城的端门、天津桥、

天街和郭城的定鼎门串连起来，就构成了隋唐洛阳城的城市中轴线。为保护利用好隋唐洛阳城历史文化遗产，洛阳市坚持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的有机结合，积极推进隋唐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紫微宫遗址内实施了明堂天堂遗址、九洲池遗址和应天门遗址的整体保护展示工程。特别是明堂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成明堂天堂景区后，既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和文化品位，也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已成为展示古都洛阳文化魅力的新地标和城市名片。如今，隋唐洛阳城已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五家5A景区包括龙门石



/ 龙门石窟。

窟、白云山、老君山、龙潭大峡谷和鸡冠洞。其中，洛阳龙门石窟是我国石刻艺术的瑰宝之一，它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洞窟内雕刻众多佛教石像，墙壁绘着多彩画卷，历经千年未褪色。其中，通高 17.14 米的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一座造像。梵语“卢舍那”即光明普照、光辉普遍之意。卢舍那大佛以神秘微笑著称，被游客誉为“东方蒙娜丽莎”“世界最美雕像”。老君山是道教圣地，被誉为君山奇景，是栾川八大景观之首。龙潭大峡谷位于新安县北部，全长 12 公里，深度达到 300—500 米，最窄处仅 1—3 米。大峡谷各段形态不同，有隘谷、嶂谷、峡谷、宽

谷等类型，奇峰壁立千仞，碧水清澈见底，令人心旷神怡，留恋忘返。

著名的 4A 景区白马寺是中国佛教发源地，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 68 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乃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及欧美国家的“释源”和“祖庭”，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寺院。白马寺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寺”，其中典藏文物主要有中华古佛、元代十八罗汉夹纈像等。1961 年，白马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 年，白马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2001 年 1 月，白马寺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首批 4A 级景区。

此外，洛阳还有重渡沟、天池山、神灵寨、花果山、木

扎岭、青要山等众多景点，好比镶嵌在河洛大地的璀璨明珠。伯夷叔齐墓、白居易故园、二程故里、邵雍安乐窝、司马光独乐园、范仲淹墓园、吕蒙正寒窑等名人故地，可供游人发思古之幽情。

洛阳牡丹甲天下。闻名天下的牡丹花会已成功举办 30 余届，洛阳以花为媒，广交天下，客商投资力度不断提升，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独具特色之美食篇

洛阳饮食深受时代和地域因素影响。作为十三朝古都，帝王皇家美食不断流落民间，地处中原，饮食习惯兼有四方特点，故而既有高端宫廷菜肴，也有南北东西之普通食味。

洛阳水席是河南洛阳一带特色传统名宴，属于豫菜系，



/ 洛阳牡丹。



/ 牡丹燕菜。

始于唐代，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2018 年 9 月 10 日，由中国烹饪协会和河南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活动中，洛阳水席被评为历史最久远“中国菜”名宴。水席的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美味可口。水席也叫“三八桌”，全席共设 24 道菜，包括 8 个冷盘、4 个大件、8 个中件、4 个压桌菜，冷热、荤素、甜咸、酸辣兼而有之。上菜顺序极为考究，先上 8 个冷盘作为下酒菜，每碟是荤素双拼，一共 16 样。待客人酒过三巡再上热菜，首先上 4 大件热菜，每上一道跟上两道中件（也叫陪衬菜或调味菜），美其名曰“带子上朝”“携子带孙”。然后上 4 道压桌菜，最后一道鸡蛋汤，又称送客汤，以示全席已经

上满。热菜上桌必以汤水佐味，鸡鸭鱼肉、鲜货、菌类、时蔬无不入馔，丝、片、条、块、丁，煎、炒、烹、炸、烧，变化无穷。一席下来，耗费不少时光，既是一场视觉盛宴，又是一场美食享受，满满的仪式感，让你领略洛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洛阳水席的首菜是燕菜，用萝卜丝经九蒸九晒而成，佐以豆皮木耳高汤，味道酸辣。1973 年，周恩来总理在洛阳友谊宾馆招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因燕菜酷似牡丹花，即起名为牡丹燕菜，一直沿用至今。

洛阳是名副其实的“汤都”，洛阳人喝汤的习惯历史悠久，汤水可以补水驱寒。一日三餐都可以用汤来解决。代表性汤品如羊肉汤、牛肉汤、驴肉汤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具

有滋补养生的功效。有人估计洛阳有大小汤馆 8000 家左右，其中牛羊肉汤馆最多。汤馆很少有倒闭的，且大都生意不错。洛阳老汤客有三大特点，喝头碗汤、在店外蹲着喝、能喝甜肉汤。洛阳的汤都是大骨头熬制，分肉汤和杂碎汤两种，加上香菜葱花，配以肉油熬制的辣椒，加上饼丝、烧饼，一碗下肚，神清气爽，好不快哉！且所有汤都可以无限续添汤水。

浆面条也是洛阳一绝，绿豆做浆，熬制后下面条，配上芹菜段、大绿豆，酸辣开胃。还有一种地方特色食品——偃师银条。银条是一种罕见食材，只有偃师几个村子可种植，其他地方难以成活，其颜色雪白，状如银丝，故而得名，凉拌佐餐下酒，清爽可口，是不可多得之美味。其他小吃有锅贴、水煎包、炒凉粉、新安烫面饺、洛宁粉蒸肉、故县肉盒等，各有千秋，美味无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洛阳美食养育了洛阳人。随着社会开放交流，四方融合，洛阳美食一定能味入千家万户、香飘五洲四海！

浓墨重彩之腾飞篇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利用外援确定 156 个大型重点工程项目，河南省分得 10 项，其中 6 个选址在洛阳涧西，有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轴承厂、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耐火材料厂等，这为洛阳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功能强大、型号齐全，为我国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他厂矿也为我国军工、航天、工农业等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工业体制改革，管理模式变化，这些老厂经历了阵痛，一度陷入低谷。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老厂顺应潮流，断臂求生，终于凤凰涅槃，走出了一条再创辉煌的新路。如今，这些老厂又恢复了活力，许多产品走向了世界。洛阳的工农业生产又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洛阳栾川县的钼储量亚洲第一，栾川钼业经过几十年快



/ 世界客属第 33 届恳亲大会开幕式现场。

速发展，成为了钼业界的龙头、洛阳的支柱产业。

作为河南副中心城市，洛阳地区生产总值多年稳居全省第二，城镇化率已达 67%，城区面积扩大，环境优美，各种生活设施齐备，人们安居乐业。建设地铁，在非省会城市中是少有的。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洛阳已建成地铁一、二号线，三号线正在规划立项中，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洛阳是客家南迁的始发地。2024 年 10 月 24—26 日，世界客属第 33 届恳亲大会在洛阳隆重举行。本届世客会主题为“客家祖根地，河洛共辉煌”，举办了火炬传递、学术交流、经贸洽谈等活动。参会嘉宾有

3500 多人，其中境外客家社团有 98 个代表团 1553 人，覆盖了六大洲 50 个国家和地区；境内社团有 83 个代表团 1163 人，分别来自 19 个省（市、自治区）45 个地市。客家人历经 1000 多年的磨难，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他们相聚在老家，叶落归根，反哺故土，洛阳有幸，得其时哉！

唐代诗人王湾有诗云：“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改革大潮涌动，航船破浪前行。回首往事，洛阳有过兴盛和落寞；展望未来，洛阳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黄埔精神激励下，实现新的辉煌！

厚重洛阳、大美河南诚挚欢迎四海宾朋！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十三)

□ 熊子杰

第二十三章 台湾基隆战役与淡水大捷的古迹巡礼

基隆战役古迹

二沙湾炮台，始建于1841年，是基隆唯一的一级古迹。此炮台为传统中国式炮台，原为鸦片战争时台湾兵备道姚瑩为抵御英军侵略台湾修建。今天此处的建筑为中法战争后刘铭传重建。城楼上的牌匾“海门天险”无落款，应是台湾兵备道姚瑩所题，而城门额“北门锁钥”题字，落款处有“合肥刘铭传题”字样。二沙湾炮台分东、北两个炮台，分守外海及内海口门，建于较高的临海山头。

东炮台区后方山坡处有三座古墓，为当时清兵的坟墓。墓碑上的字迹斑驳难辨，但依稀可见“河南”“光绪”等字，然而光绪年间驻防台湾的清兵主力，以从大陆调派来的湘军为主，湘军以“湖南勇”“粤勇”为主，甚少有河南籍，是否也如



/ 二沙湾炮台。



/ 狮球岭炮台。

同阳明山“河南勇”一样，将闽南语的“湖南”误称为“河南”？

狮球岭炮台，建于1884年，

位于台湾基隆市中山高速公路大业隧道上。在炮台东西两侧的山丘上，另建两座炮台作为



/ 白米瓮炮台。



/ 红淡山的湘军古墓。

辅翼，最西方的是“狮球岭西炮台”，在东南方有一座“狮球岭东炮台”，西南方的是“八堵炮台”，三座炮台连成一气。中法战争时，这座炮台被称为“鹰巢炮台”，除能扼守基隆港口，还可作为台北盆地的屏障。狮球岭炮台在中法战争、乙未战争中，皆发挥了御敌功能。

白米瓮炮台，位于基隆港西侧的太白社区山麓，海拔约70米。传说白米瓮炮台始建于荷据时代，300多年前荷兰人曾在此地设堡垒，附近的区域又被称为“荷兰城”。清朝光绪年间也曾在这附近修筑炮台，今日的建筑物则是日据时代修建的。白米瓮炮台能守护基隆，

亦可阻挡敌军进入台北盆地。1840年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甚至1895年乙未战争，姚莹、刘璈、刘铭传等无不在此兴建炮台与要塞，以加强基隆港的防务。

大武仑炮台，位于基隆市安乐区大武仑山内，海拔231米，作用是控制基隆与淡水间的交通要道。一方面是防御淡水经金山进入基隆这条陆路；另一方面，炮台制高点可俯视玛鍊溪跟大武仑澳方面海域，兼陆防、海防双重任务。1884年中法战争时，刘铭传派兵驻扎大武仑附近设防，以阻敌军入侵。今日炮台是日据时期的西式炮台。

杠子寮炮台，位于基隆市信义区杠子寮山上，基隆港东侧，原为中法战争时所建，今日的炮台是日据时期建造的新式炮台。

社寮岛（和平岛）炮台，原名社寮东炮台，主要是与社寮西炮台区分。社寮东炮台位于和平岛渔港后方的山上，社寮东炮台历史悠久，荷兰时期、西班牙时期、明郑时期、清末时期、日据时期等都在此设炮台或堡垒，经历过荷西战争、清法战争、抗日战争等。社寮岛炮台始建于1626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社寮岛炮台率先击中来犯法舰，但也被法舰击毁。1886年，刘铭传再度建造社寮炮台。



/ 月眉山炮台遗址。



/ 基隆法国公墓。

1901年日据时期改建。

四脚亭炮台，旧称“深澳堡垒”或“深澳坑炮台”，位于基隆市与瑞芳的交界处，约在光绪年间建造。四脚亭炮台主要是为了防御基隆的右后翼基隆港湾。四脚亭炮台是基隆唯一的内陆型炮台，也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内陆型炮台。

红淡山炮台，1884年由清军和红淡山修建，中法战争中被法军摧毁。1884年中法战争时，红淡山曾是清军主要防线，中法战争的主战场。1885年1月10日，法军攻打红淡山，被湘军曹志忠部击退。3月4日，第二次月眉山大战，中法两军在月眉山、红淡山等一带激战，最后清军死伤惨重，败退至基隆河南岸。后人为了纪念牺牲的清军，在现今的观景塔后方建了一座清军“湖南古墓”，以

缅怀先人。

月眉山（桌山）炮台，位于月眉山基石边，是1884年到1885年之间由清军兴建的临时性炮台。中法战争中，法军自1884年8月5日开始进攻及占领基隆港后，多次在月眉山与清军曹志忠部激战，清军搭建炮台死守月眉山，阻挡法军向台北推进。战后炮台失去功能，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淹没在荒烟蔓草中。

法国公墓，位于基隆二沙湾中正路上，1885年，为纪念中法战争法军阵亡者而建。墓园中共有4座古墓，是园内最重要的文物。中法战争期间，法军占领基隆，安葬战死的法军官兵于二沙湾海滩。今日的法军公墓园内有两座纪念碑，一是1902年所立之“佛国陆海军人战死者纪念碑”，“佛国”是当时

日本人对法国的译名。另一座是1954年立的纪念碑。

民族英雄墓，位于基隆市中正路海门公园内。1884年中法战争后，阵亡的清兵原葬于二沙湾附近山麓，因都市建设需将墓地迁移，基隆士绅池清祥将清兵骨骸集于一冢安置于今日海门公园内。墓碑正面刻“清国人墓”，背刻“勋在邦家”。1957年基隆市政府再次重建墓冢，更名为“民族英雄墓”。

中法战争阵亡战士纪念碑，位于基隆仙洞岩附近太白街的慈恩祠，又称爱国将军庙，同时供奉着刘铭传和法国的孤拔，供后人追思凭吊。1884年法军进攻基隆，清兵奋勇抵抗，阻挡法军向台北推进，清军伤亡惨重，后人为纪念牺牲之先民烈士，于今太白街附近立一石碑，上刻“清国人之墓”。后市



/ 阵亡战士纪念碑（中法战争）。



/ 万善堂旁的湘军古墓碑。

长陈正雄在修建慈恩祠时，在庙中另立一石碑，刻有“中法战争阵亡战士纪念碑”，正下方供奉“清国公”刘铭传将军。

淡水（沪尾）大捷古迹

淡水湖南勇古墓群，位于台北县淡水镇中正东路与竿蓼一街交叉口淡水公墓的前方小丘，是一个古墓群，也有一些私人墓，占地面积约 218.22 坪，新北市政府已规划为湖南勇纪念公园。淡水共有 6 座湖南勇古墓，全为孙开华部擢胜左营湘勇，其姓名如下：故勇李有章，湖南善化县人；故勇袁致和，湖南善化县人；故勇张月升，湖南善化县人；故勇胡芳之，湖南善化县人；故勇

严洪胜，湖南善化县人；故勇李佑佳，湖南永定县人。1876 年，孙开华率擢胜营湘勇初次赴台驻防；1879 年，第二次率擢胜营湘勇来台驻防基隆与淡水；1880 年，孙开华奉命回湖南招募湘勇，编组擢胜中、左两营，三度来台驻防基隆、沪尾两地。今日淡水的这 6 座湖南勇古墓，就是孙开华擢胜营左营部属。1884 年 2 月，孙开华第四度率湘军擢胜营三营抵淡水与法军作战，大败法军，皇上恩赏“骑都尉”世职，并赏白玉翎管等物，慈禧太后还赏给有功将士白银一万两。虽然这些古墓已残破，但这些古墓提供了清末台湾在开山抚番、建设台湾、抵御外族侵略等方

面的重要史料。沪尾湖南勇古墓说明台湾先民皆来自大陆各省，为保卫台湾客死他乡、埋骨异域，古墓群虽不具建筑特色，但墓碑碑文却反映出湘军在保护台湾土地及人民方面所做的贡献。笔者期望这些湘勇后裔，能与笔者联系，将先人的墓迁往未来筹设的台湾湘军纪念馆中，以慰这些为台湾牺牲的湘籍先烈。

沪尾万善堂（旁有地源宫），位于淡水新民街一段 80 号对面，安奉许多战歿清军英灵，现还保存着两块完整的湘勇墓碑。1979 年，淡水高尔夫球场在扩建时，破坏了许多清军的坟墓，清出了千人冢及 200 多座古坟，其中有 31 座为清军坟

墓，有的墓里埋着数百位清军遗骸，其中可确认身份的有29人；许多墓碑碑文都显示立碑时间为光绪年间，也就是中法战争沪尾战役时期。这些挖出的无主骨骸最后都移奉于万善堂。这些湘勇来台为保卫台湾客死异乡，淡水高尔夫球场开辟新球道时，未将这些清军遗骸及墓碑妥善安置，如此对待为台湾牺牲生命的先人实在令人痛心，所幸当时球场副经理黄德利有善心，认为应妥善对待这些保卫台湾而牺牲的湘军英灵，商请球场杆弟谢富田先生负责筹建万善堂以安置湘军骨骸。现存的两个湘军墓碑还是黄德利及谢富田当时抢救下来的，否则连这两个湖南勇古墓都没有了。

沪尾炮台，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尚未完工即为法舰所毁。现有的沪尾炮台是中法战后刘铭传在原炮台西南侧重建，于1899年竣工。现在的炮台室内有完整的中法沪尾战争的攻防路线立体模型。

苏府王爷庙，位于淡水油车口附近海边，是1853年建造的，是台湾第一座苏府王爷庙。相传中法血战时，苏府王爷显灵助阵，击退法军。当时中法战争沪尾之役，孙开华将军在



/ “威灵赫濯”匾额。

此处斩怯战的士兵，把首级悬挂示众。战后淡水炮台守军会定期来庙祭拜，提督章高元于1885年献“威灵赫濯”匾额，今仍悬于庙内。

台南古迹

二鯤鯓炮台，又称亿载金城，位于台南市。1874年牡丹社事件时，沈葆楨奏请建造仿西洋式炮台一座，于1876年完工。刘璈于中法战争之前修护了炮台。中法战争时，法国舰队侵扰安平外海，被刘璈以亿载金城的大炮驱离。

澎湖古迹

孤拔墓与法军千人冢纪念碑，是为中法战争中战死的法国将士所建。法军占领澎湖时

军中爆发传染病，数百名法军病死，法将孤拔也于1885年6月11日病死在澎湖，遗体原安葬于马公市民生路中正小学旁。1885年8月，法国政府将其遗体迁葬法国，并为其举行国葬典礼。仅有他的遗物与法军主计长戴尔、中尉若罕合葬于马祖马公市。1954年，戴尔及若罕的遗骨迁往基隆法国公墓。现址还保存孤拔的衣冠冢，而千人冢纪念碑位于蛇头山。

风柜尾荷兰城堡，位于澎湖马公蛇头山，1622年由荷兰人建造，是台湾最早的西式城堡。1884年初中法战争前，兵备道刘璈紧急整修此炮台及西屿炮台。法军攻打淡水失利后，将舰队调往攻打澎湖，此炮台发挥功效阻挡法军登陆。